

博古和毛澤東

——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秦福銓 著



大風出版社



博古和毛澤東

——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

編 者：秦福銓

編 輯：楊 宏 李玉娥

美術設計：廖 煉

出 版：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

電話：(852) 2550 8911 傳真：(852) 2550 8711

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7302-0-6

出版日期：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定 價：港幣 88 元

香港總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浦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新加坡總發行：商務印書館（新）有限公司

211 Henderson Road #05-4, Henderson Ind. Park, Singapore 159552

Tel: (65) 62783535 Fax: (65) 62786300

© 大風出版社 2009

Strong Wind Press 20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我父親秦邦禮（又名楊廉安、楊琳）是博古（秦邦憲）的胞弟，生前任國務院對外經委副主任、黨組書記，無錫人。14歲到錢莊當學徒。1924年在秦起同志領導的無錫錢業職工會任執行委員。1927年隨嚴樸同志（嚴慰冰的父親）在無錫搞農民「秋收起義」。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尋找黨組織，在商店當店員。1930年博古、劉群先從蘇聯回到上海，推薦我父親給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1931年經嚴樸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商人的公開身份，經營商店、出租房屋、掩護黨的重要機關和作聯絡站，從事黨的地下活動。1931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原中央機關部分人員撤離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兼中央特科科長的陳雲同志派我父親前往汕頭設點，迎送過往的中央和軍委領導人，同時為蘇區採購急需物資。周恩來、張聞天、陳廣等都是經我父親中轉護送前往蘇區。1933年博古、陳雲去蘇區也是由此中轉。

1935遵義會議後，中央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6月陳雲和嚴樸回到上海，找到我父親，利用聯絡站作立足點恢復中共上海組織的秘密活動。8月下旬，陳雲、嚴樸、我父親共乘同一艘船前往海參威，又乘火車住在一個包廂裡到莫斯科，在20多天的旅途中，從陳雲、嚴樸的談話中瞭解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到莫斯科後，三人同在列寧學院學習。陳雲進了中共代表團，為正式代表；嚴樸兼任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我父親也被吸收為黨史研究室成員，接觸到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來往的一些文件，還



博古

親眼看到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中央軍委召開的幾次會議，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1937年夏，陳雲派我父親提前回上海，準備迎接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回國，但隨著戰爭的發展，蘇聯決定派飛機直接經迪化送代表團回延安。於是陳雲命我父親結束在滬的商業活動，資金轉交武漢辦事處回延安工作。由於戰亂商鋪一時售不出去，接陳雲電催父親只好隻身先回延安，

1938年春再度赴上海，結束業務，經武漢回陝北。碰巧遇到了張國燾事件，受李克農指派參與看管張國燾一宿，瞭解到一些內情。

1938年陳雲派我父親去香港協助廖承志、潘漢年工作，任務是：轉運保衛中國同盟轉來的募捐款和物資；做好秘密財政工作，親自將組織上交給帶往香港的黃金和外幣（如美金、英鎊等），兌換成法幣或銀元以華僑捐款的形式匯回；利用商業活動掩護物資採購，按組織下達的採購清單，購買根據地急需的物資，與華僑捐贈的物資一起運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當時博古在長江局工作，住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我父親每次押運物資去武漢並取回黃金就住在辦事處。兄弟二人才能有機會長談。博古在這些談話中，講到了在蘇區的工作、遵義會議及周恩來的談話。

正是由於父親這種獨特的經歷，使他知道不少與博古有關的事情，而其中有很多事實與我們建國後公開宣傳的多有出入，他悶在心裡不好給別人講，就給我講講。也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後來就有意識地做些記錄。

1948年我從香港到達哈爾濱，陳雲同志安排我去東北老航校工作（參軍搞航空）。我在哈爾濱住了幾天。在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看望病中的嚴樸同志，聽嚴伯伯講了30年代在「江西蘇區」發生的一些事情，特別是「寧都會議」、「九月軍委會議」和「六屆五中全會」等，使我印象深刻。

1953年我到上海出差，順便去看望肖伯伯（潘漢年），他留我在他家住了幾天。晚上我問起他「遵義會議」的事情，他感慨地說：「是我去莫斯科彙報的，已經過去18年了。六中全會饒漱石批評我是自由主義，可是人不能不說話，只要不是危及黨和國家利益的話，我看也不必自我約束得那麼緊。就比如你提的問題已保密18年了，寫書寫文章的也不少了，但不真實，我今天就告訴你真相，因為這是你伯父一生最關鍵的事，你有權利知道」。於是她詳細地告訴了我關於遵義會議及湘江之役的情況，以及他所謂的「小故事」，即周恩來與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

當然，告訴我真實故事最多的，並把我已經知道的事連貫起來的是我父親。1955年得知潘伯伯被收審後，父親心情很沉重，只說了一句話：「又是一個項英」。1959年廬山會議後，父親十分感慨地說：「這頂帽子懸在彭總頭上已經30年了」。60年代初，當父親得知毛澤東提出柯慶施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憂心重重地說：「一個康生就夠『熱鬧』啦，又來一個，中國共產黨厄運將至，我們也是在劫難逃啦。你不是老想問一些事情嗎，你把問題集中一下，過幾天我有空了告訴你」。

1964年父親心臟病犯了，住醫院期間斷斷續續給我連續寫了兩封長信，提綱式地告訴了一些沒有說完的故事，可惜這些信在「文革」開始後，怕被紅衛兵抄走，藏在什麼地方也覺得不妥，最後只得忍痛燒了。但是，我很理解父親，他多次給我講述過去的「往事」，就是希望我把這些真實的歷史記下來，傳下去。將來有一天能公佈於世，而不致於永遠

成為秘密。

我的這篇《往事記憶》，就是想把我一生中聽到的父輩們講的一些「歷史故事」，而其中有些故事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黨史中沒有明確闡明的，或者被「遺忘」的，或者被誤記的，在此作為「補遺」，供讀者參考。

「年難留，時易損」。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20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代在前進，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歷史，再不應該被掩埋、被遺忘、被虛構了，應該去塵土、露真容、還歷史以真實。

本書中的內容，正如上面回顧的，是我幾十年間從各個知情人士聽來的，有些是相對完整的，有些是零散的，我做了整理、連貫使其完整，並查閱了大量黨史資料，核對日期。特別要指出的，有關遵義會議後，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周恩來和博古的那次重要談話，我認為對研究中共黨史有很重要的價值。這次談話的內容來源於我父親和潘漢年兩條線索，現在我把他寫出來，雖然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話都是周恩來的原話，但儘量做到傳達出當事人的原意。

由於歷史原因，中共在蘇區和長征時期的文獻大多損失了。使得這段歷史的研究很難找到實證。所幸共產國際的文獻在莫斯科和北京都保存完好，一旦這些文獻開放，相信本書很多內容會得到證實。

我相信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首先要真實。



秦福銓

2000年2月26日



目錄

前 言

I

第一章 臨時中央

1

六屆四中全會	4
臨時政治局	5
寧都會議	9
博古和陳雲的一次談話	13
六屆五中全會	16

第二章 博古在中央蘇區

21

反「羅明路線」的來龍去脈	23
批判鄧、毛、謝、古	30
共產國際反右傾運動	33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35
博古抓教育工作	39
八一建軍節	44
博古和毛澤東的關係	46
博古的錯誤	49

第三章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	53
第四次反「圍剿」後的形勢估計	55
九月軍事會議	57
黎川失守	60
十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62
福建事件	65
前敵會議	69
四人會議	73
筠門嶺失守	75
廣昌保衛戰	78
六路分兵拒敵	81
第四章 中央蘇區戰略大轉移	83
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大轉移	85
說服毛澤東同意大轉移	91
大轉移的準備工作	92
中央在蘇區的最後一次會議	94
毛澤東要留在蘇區	96
毛、張給大轉移留下兩頂「轎子」	97
長征開始，突破三道封鎖線	99

湘江之戰	101
第五章 遵義會議前後	107
遵義之前的三次會議	110
遵義會議	114
博古的困惑	122
周恩來、博古一次重要談話	124
第六章 博古和潘漢年	133
王明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聯絡員	135
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	140
潘漢年、張浩受命回國	142
博古與潘漢年臨別前的一次談話	150
第七章 季黃冤案和西路軍	157
寧都起義後的季黃冤案	159
決定西路軍命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164
李特、黃超遇害	168
李先念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	170

附 錄

177

一、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博古	179
二、秦邦憲（博古）簡介	184
三、劉群先簡介	187
四、張越霞簡介	189
五、秦邦禮（楊琳）簡介	191
六、潘漢年簡介	193
七、嚴樸簡介	195
八、有關「故事」來源的說明	197

後 記 / 李海淵

207

第一章

六屆四中全會

臨時政治局

寧都會議

博古和陳雲的一次談話

六屆五中全會

關於「臨時中央」的「臨時」二字，博古有不同看法，他在延安整風時寫的〈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中提到「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兩字在上海時未聽見的，過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說過」。不過中共黨史歷來都使用「臨時中央」或「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提法。這個問題如果查證一下共產國際當時的批准文件，應該不難搞清楚，可惜我們沒有條件核實，所以仍然沿用延安整風以後的習慣提法。

1931年9月，博古臨危受命，挑起了臨時政治局負責人的擔子。臨時政治局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最初的一年裡，臨時政治局僅僅是共產國際和蘇區中央局之間的「傳聲筒」。1932年10月寧都會議的召開，共產國際的一紙電文明確臨時政治局為臨時中央，從而使博古實際上成了中央最高領導。

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在後來的黨史上經常是避而不提的，通常只提「四中全會」和「六中全會」。其實，如果說「臨時政治局」由周恩來和王明指定，獲國際承認是合法的，只是「手續不完備」，那麼，「五中全會」及其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既獲國際承認，又「手續完備」，應該是正式的中央領導機構，而不應再稱為「臨時」。而且這一屆中央政治局一直到1945年「七大」才改選。「五中全會」的存在是客觀的，不應從黨史中抹去。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四中全會時毛為政治局後補委員），這為遵義會議上毛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做了鋪墊。



1938年博古與毛澤東在延安合影

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9日，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共九人：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郁、任弼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10日，向忠發主持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會議剛結束，羅章龍就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及部分機關黨組代表、省市黨委代表共17人。會議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召開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要求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矛頭直指周恩來同志，認定四

中全會犯了「右傾調和主義」的路線錯誤，主要責任者周恩來，曲解國際路線，對立一路線錯誤搞調和主義，明確提出要驅逐周出中央委員會。接著又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使情況越演越烈。中央忍無可忍，終於在1月2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了《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①

隨後被開除中央委員會的有 史文彬、唐宏經、韓連會、沈先定。接著，中央機關黨組織開除了張金保（女）、徐蘭芝（女）、徐畏一的黨籍。各省、市、區也紛紛效法，開除了李震瀛、吳雨銘、張金刃、蔡博真、錢靜安、魯鐵成等人的黨籍。罪名是「托陳改組派」。開始時，凡參加「中央非常委員會」的人，一律開除，後來凡被戴上「托陳改組派」帽子的人，也都開除。對這股「開除風」，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郁和徐錫根站出來說話，批評向忠發是極左思潮，搞「左傾擴大化」，對犯錯誤的同志統統「開除」，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對此，在1月30日至1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周恩來的提議，免去陳郁、徐錫根政治局委員職務，送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同一會議，還決定撤消犯有貪污罪行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溫裕成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由博古接任團中央書記。

至此，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減為七人，政治局候補委員減為五人。

臨時政治局

1927年「八七」會議號召農民起義後，中國革命的重

① 二王都保留了黨籍。

心開始由城市轉到農村。一年光景，全國出現了大大小小由佔山為王，到成立蘇維埃政權的蘇區，不下幾十個。其中以湘贛閩、鄂豫皖、湘鄂西三大蘇區面積較大，尤以湘贛閩（江西蘇區）為最。各蘇區的工農革命軍在戰爭的錘煉下，也不斷發展壯大，估計當時全國紅軍總兵力約在 25 萬人左右。但是不足之處是兵力分散，尤其是組織不統一，即使是在一個大蘇區中，幾個紅軍部隊也互不隸屬，各有山頭，而且軍隊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亦日趨嚴重。對此，周恩來同志及時提出以三個蘇區為基礎，成立「方面軍」，由中央軍委統一領導。接著在 1930 年 9 月 29 日，六屆三中全會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出中央必須緊緊掌握方面軍的指揮權，因此必須「就近領導」，成立蘇區中央局和蘇區中央軍委。10 月 3 日在六屆三中全會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江西蘇區為中央蘇區，設立蘇區中央局。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二人組成蘇區中央局。任命周恩來為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但不久情況有了變化，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要來上海，解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問題，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周恩來暫時不能離滬，於是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又做了變動，決定先派項英去江西，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蘇區中央局成員也調整為：項英、周恩來、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及當地二人組成。

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 1 月 30 日到 31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任命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主席；通過了成立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和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任命張國燾為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任命夏羲為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這次會議名正言順地把二大蘇區的領導權和一大方面軍的指揮權，統一到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周恩來手中。

這次會議還因為原江蘇省委書記王克全被開除黨籍，決

定由王明接任江蘇省委書記。4月10日，張國壽離滬赴鄂豫皖蘇區。4月28日，顧順章被捕叛變。6月20日，向忠發被捕叛變。在此之前，任弼時為調查「富田事件」已去了中央蘇區。羅登賢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5月中旬已經赴東北（後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關向應、毛澤東仍在江西。5月，劉少奇也去了中央蘇區。至此，6月下旬，在上海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只剩下周恩來、盧福坦和王明三人了。於是周恩來和蘇聯顧問商議後，決定增補王明為常委，報共產國際備案。7月1日，王明到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江蘇省委書記由陳雲接任。周恩來準備赴中央蘇區。

8月上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由王明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吸收中央機關部門負責人參加，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不折不扣地把國際決議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去，「集中火力反對右傾」。這個決議給後來中央開展工作套上了一個「緊箍圈」（在延安時，陳雲批評這個「決議」，給新成立的政治局帶上了「胎記」）。

正當周恩來同志準備赴蘇區之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東北淪陷，全國一片抗日呼聲，群情激昂。共產國際來電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負責同志去莫斯科，接替因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後，空缺近一年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以便直接面商中國革命面臨的問題。於是周恩來和王明一起找蘇聯顧問（即共產國際駐中共的特派代表）曼弗里德·斯特恩研究，周提出由王明帶中央代表團去蘇聯，自己必需去中央蘇區主持工作，領導中央紅軍，至於中央的日常工作，可由中央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組成一個臨時政治局來處理。這個意見被蘇聯顧問採納。當天晚上在一個小酒店，周恩來同王明、博古、盧福坦四人，共同研究了組成政治局的人選，由博古（團中央書記）、張聞天（中央宣傳部長兼農民部

長）、康生（中央組織部長）、盧福坦（中央職工部長）、陳雲（江蘇省委書記）、李竹聲（上海市委書記）共六人組成。^②

9月24日，共產國際復電批准成立新的政治局和人員組成，指定博古為總負責人。^③

1931年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5日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行前對博古做了兩點指示——是做好白區和蘇區的協調工作，未經國際同意暫時不搞城市武裝起義，鬥爭的重點轉向蘇區；二是做好國際同蘇區之間的橋樑工作，及時將國際的指示、要求、文件轉發到蘇區，各省、市請示報告按「八月決議」精神處理，疑難問題告中央蘇區。

不久，康生也去了莫斯科，張聞天、盧福坦去了中央蘇區。中央機關和上海市委、江蘇省委在白色恐怖下都採取分散辦公，李竹聲也隱避到郊區，很少來中央。結果只剩下博古、陳雲二人堅守著這個臨時政治局。更難堪的是這個實質上的「留守政治局」沒有權威，蘇區領導根本沒有把它視為上級，只視它為機關業務的總管，是蘇區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一個聯絡機構，是六屆四中全會政治局留在上海的一個代辦機構。三大蘇區發生的重大事情，都由蘇區中央局決斷，不報告上海的臨時政治局，有時也只是「抄報」。臨時政治局成了國際同蘇區中央局之間的「傳聲筒」。更困難的是臨時政治局在財政上主要依靠收款員到蘇區（主要是中央

② 根據現在新的考證，臨時政治局九人組成，另有劉少奇、黃平、王雲程。

③ 盧福坦是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由於在羅章龍反四中全會的舉動中表現中立，成為雙方爭取的對象。在向忠發叛變後，盧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中央不能無書記，要求儘快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增補委員、選出書記。這些表現使周認定盧想乘機抬高自己，爭當書記，所以堅決不讓盧負責。

蘇區），從土地稅和沒收土豪劣紳的浮財中，提取款項。由於中央蘇區在紅一方面軍前委的支持下，自作主張改變了稅制，以及由蘇區到上海來往必經之路的閩西武夷山東側山路，多有土匪出沒，中央提款員兩次被劫，使得中央一度財政十分拮据，對白區的財政支援幾乎陷於停頓，連機關的日常開支都捉襟見肘。直到「寧都會議」之後，情況才逐漸有了好轉。

寧都會議

1932年6月，蔣介石調集50萬兵力，發動了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由於鄂豫皖蘇區經過土改、擴紅，發展很快，有紅軍三萬餘人，地方武裝近五萬人，革命聲勢不亞於江西中央蘇區。因此蔣介石把這次「圍剿」，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重點是鄂豫皖蘇區，計劃用半年時間「消滅」鄂豫皖紅軍。對湘贛閩蘇區則「圍而不攻」，等鄂豫皖戰事結束，再集中兵力「圍剿」江西紅軍。

面對這個形勢，蘇聯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提出要中央蘇區紅軍主動出擊，打破包圍圈，攻擊重點城市，逼迫蔣介石抽兵回援，以減輕鄂豫皖紅軍的壓力，挫敗蔣介石分階段各個擊破的陰謀。臨時政治局立即將這個戰略方案，電告蘇區中央局，轉告中央紅軍主帥毛澤東同志。但毛不同意這個方案，認為這不是「圍魏救趙」，只是「以湯止沸」。因為蔣介石的「圍剿」歷來都是以各省的兵力為主，輔以戰區的中央部隊，目前包圍江西蘇區的仍然是湘贛閩三省的地方部隊，僅憑我們現在的兵力想打敗這些地方部隊，攻佔江西的大城市，那也是不可能的，眼下只能抓住機會消滅他一部分有生力量，對調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作用不大，至於鄂豫皖的戰事，只能由四方面軍自己想辦法，在運動中抓住戰機，

戰勝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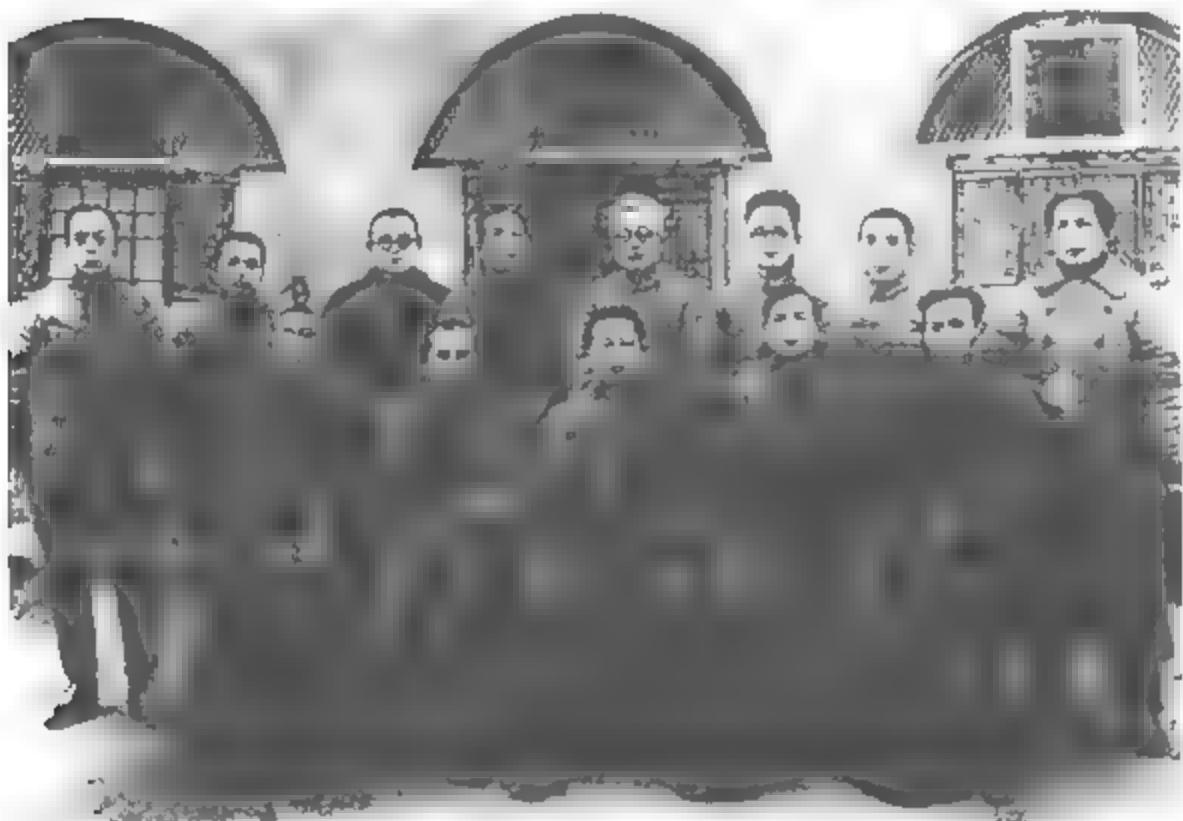
兩種觀點截然不同。在蘇區中央局內部，周恩來支持毛澤東的觀點，項英、任弼時等則支持臨時政治局的意見，形成兩派。這兩種意見都彙集到蘇聯顧問處，雙方在電報上耗費時日。

8月，鄂豫皖戰線吃緊。臨時政治局堅決要求一方面軍出兵「止沸」。於是，一方面軍在8月17日攻克樂安，20日又攻克宜黃，22日乘勝佔領南豐，一週內連克三城，俘敵五千、繳槍八千餘支，震動了撫州、南昌守敵。但蔣介石對三個小縣城不為所動，反而加緊了對鄂豫皖紅軍的攻勢，緊縮包圍圈。而紅一方面軍對接下來攻大城市，感到力不從心，只好撤出三個小城市，退至大王山東南側的古岡、黃坡一帶休整，等待時機。對此蘇聯顧問斯特恩很不滿意。

9月10日，鄂豫皖紅軍被逼向西轉移，途中張國燦、陳昌浩、徐向前聯名向臨時政治局請求：「……請中央蘇區及其他各蘇區紅軍及工農群眾急起策應我軍……」。博古接到電報後，立即報告蘇聯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當即決定：由政治局馬上下達給一方面軍「行動方針」的緊急命令，強令一方面軍出兵，進逼撫州，威脅南昌。這時，各地也紛起響應，殺向白軍。可是江西紅軍主帥毛澤東，卻認為臨時政治局拉大旗作虎皮，冒中央之名下「緊急命令」，企圖壓服一方面軍，所以根本不理睬「緊急命令」，仍然拒不出兵。理由是，條件成熟的我們已經打了，攻擊大城市條件不成熟，不能硬拼，只能做好準備，等候時機。

10月15日，周恩來以蘇區中央局名義，發電報要求鄂豫皖中央分局，指揮四方面軍堅持在運動中集中兵力，機動地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擊消滅其一面，各個擊破敵人。但這時四方面軍已無力支撐下去，在10月7日越過平漢鐵路向西突圍，二萬餘人經鄂北、豫西，冒著風雪越過大巴山，行軍

二千里，在12月10日到達陝南西鄉地區，全軍只剩下一萬四千四百人，其中女同志僅剩十來人。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會議合影

前排左起項英、朱德、王明（陳紹禹）、陳雲、劉少奇。
後排左起康生、彭德懷、洛甫（張聞天）、張國壽、林伯渠、
博古（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林伯渠不是政治局委員
作為黨內元老參加。凱豐（何克全）與會，但未參加合影。

對這次「戰略決策和軍事路線上的爭執」，蘇聯顧問詳細地報告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10月初，書記處來電：「……驚悉在反『圍剿』鬥爭中，中央紅軍領導頑固地拒不執行中央命令，對此，蘇區中央局應做出負責任的交待……，蘇區中央局乃中央的派出機構，應向中央政治局負責……」。此電文首次明確了臨時政治局和中央是一體的，在黨內處於最高領導地位，否定了以前認為「臨時政治局是代理機構，中央在蘇區」的錯覺。

10月3日，中央將此電文，全文轉發蘇區中央局及各分

局，要求蘇區中央局立即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1932年10月8日，會議在寧都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項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朱德、王稼祥、毛澤東。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來電，根據中央的《行動方針》緊急命令，就中央紅軍反「圍剿」作戰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參加會議的八人中，除周恩來外，支持中央觀點的四人，不支持的二人，所以周恩來的態度格外重要，是影響會議結果的關鍵。一方面周是支持毛澤東不出兵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周對毛的山大王作風，傲視一切，一人說了算的表現也不滿意，深感有毛在一方面軍任總政委，自己就很難在組織上真正駕馭這支部隊。尤其是每次開最高軍事會議，研究部隊的軍事行動，都得看毛的眼色，否則毛就「各說各話，海闊天空，搞得你不知伊於胡底」。甚至毛一走了之。因此周很想借「國際電文」和這次會議來教育一下毛。於是他在會上主動檢查了自己只顧局部利益，不看全局利益的右傾保守思想等，並批評毛澤東說：「前方同志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把會議引向批判毛澤東。會議最後集中批評了毛澤東的組織觀念差，主觀武斷，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錯誤，並批准他請假回後方養病，會後離開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回到政府工作。

寧都會議傷害了兩個同志，一個是毛澤東，會議剝奪了他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另一個是周恩來，雖然他兼任了一方面軍總政委，但在蘇區中央局內的威信大大下降，所以會議後他一直滯留在前方，不願意回瑞金。

但寧都會議使中央政治局獲得了它在黨內應有的地位，並為中央政治局進中央蘇區創造了條件，也為博古在1934年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總書記，奠定了基礎。也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說的：「寧都會議開始了

王明～博古教條主義在中央蘇區的全面統治」。這句話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寧都會議之前，中央蘇區不受臨時中央的「全面統治」。

博古和陳雲的一次談話

1931年，秦邦禮（又名楊廉安、楊琳）在陳雲、嚴樸領導下，在上海開設了六家小商店，作為黨的地下交通站。有傢具木器店、糖廠、南貨、米店、文具煙紙（向忠發叛變後，周恩來和鄧穎超曾在文具煙紙店小閣樓上暫住過一段日子），較大的一家是在汕頭開設的「上海中法藥房汕頭分店」，這是上海往中央蘇區必經的交通站。陳廣、章漢夫、張聞天等，都在此住過。

1933年1月，博古、陳雲帶著一個警衛員，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1月3日到達汕頭，住進中法藥房。當晚在父親的辦公室裡有一段對話，父親也在場聽到了這段對話，深深地感受到伯父肩上的擔子沉重，20多年後，腦子裡還印象很深。

陳雲：前一段時間，蘇區有一些人不服中央的領導，說這個政治局未經「全委」選舉，委員都是王明指定的，博古連「中委」都不是，一步跨進了政治局，成了總負責人，這不符合黨的組織手續……。對這種不買賬的態度，你要有個思想準備。

博古：新政治局的誕生，是時世造成的，委員的產生有些先天不足。說是王明指定的，那是主觀推測，張冠李戴，當時王明還沒有那麼大的權力。現在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再來議論是已無價值，因為它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是合乎審批手續的合法機構。肩負著領導全黨的責任，共產國際在來電中已明確指出它是中央政治局。這不是我們想要就要來

的，是統一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的需要。至於我們自己既要挺起胸膛做事，又得卑以自救，誠懇待人，要主動找「老」聯繫，甘當小學生，請教治黨治國大事。

陳雲：寧都會議後，周恩來一直滯留在前方，不回中央局。前委也不當家了，現在中央蘇區是政出多門，黨政軍各自為政，沒有了「總管」，長此下去會出亂子。

博古：關鍵還在周恩來，要使蘇區中央局直起腰來，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寧都會議後對他的傷害比較大，國際對他有信任危機，斯特恩對他很不滿意，我們再不主動親近他，會使他很容易滑向「山頭」那邊。到了蘇區，第一個就是要找他彙報工作，同他談心，交換意見，消除寧都會議的隔閡，和為貴嘛。

陳雲：寧都會議後，毛澤東一直潛居在廟裡，團結他是個難題。

博古：是難。除非他改變對共產國際的態度，貫徹執行中央《八月決議》，否則很難談得攏。毛澤東，他自傲有功，認為中央蘇區這塊土地是他打下來的，在這裡只有他才有資格說了算，連蘇聯顧問的話也聽不進去。曼弗里德·斯特恩代表著共產國際，他的意見理應尊重。寧都會議後，紅一方面軍擁護會議決定，加重了對他的打擊，只能潛蹤休養了。希望他能靜思悔悟，吸取教訓，糾正錯誤。

陳雲：蘇區中還有一種怪現象，有些盲目追隨「山頭」的人，認毛澤東為領袖，說話辦事都得聽從領袖指示，連寫報告都先寫領袖毛澤東說什麼，然後才談事情。這些人的腦子裡根本沒有黨的集體領導概念，只知「領袖」指示。甚至還有人污衊說，中央被米夫手下的十八個半篡奪了領導權。政治局是小人得志……。對這種盲目崇拜個人的思維方式，誹謗中央，嚴重破壞黨的威信的流言蜚語，一定得肅清。

博古：肅清「個人崇拜」思想，是一件曠日持久的事

情，需要耐心教育。提高每個共產黨員的唯物主義觀念，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是一種封建迷信行為。將來有時間我

一定要翻譯一些馬列原著，供大家閱讀。眼下最重要的是各級黨組織，一定要充分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決策程序，杜絕書記一人說了算的現象。牢記個人服從組織，地方服從中央，軍隊服從軍委，中央服從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現在共產國際是信任我們的，它不想看到中國共產黨又要換領導人，我們離開上海時，曼弗里德·斯特恩一再叮囑到蘇區後，要加強政治局的領導作用，真正把中國革命的大樑挑起來，不能再發生軍隊不聽命令的事情，而且還答應派一個軍事顧問來支持我們的工作。說明國際很重視我們進蘇區工作。

陳雲：據瞭解，項英在中央蘇區老百姓和軍隊中威望很高，他為人正直、辦事公正，急老百姓所急，關心部隊生活，在蘇區有口皆碑，得到他的支持會幫助我們順利開展工作。

博古：項英是個好同志，在長江局任書記時反映就不錯。他對毛澤東的一些做法，一直持批評態度。比如對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周金堂）之死，對富田兵變的處理，對肅反擴大化和包庇縱容李韶九等，以及鼓動個人崇拜的做法，他都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的觀點。但在蘇區中央局主要領導的調和態度下，他的觀點沒有得到支持。周恩來同志曾經對我說過，在蘇區一切要以戰爭為重。所以，我們既要考慮戰爭的大前提，團結為重，也要考慮黨的利益、群眾的利益，對嚴重違法違紀的事和人，要講鬥爭，求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團結。

陳雲：還有一件事必須立即辦，就是財稅問題。現在蘇區的土地稅一直收不上來，地方和軍隊截留佔用現象十分嚴重，尤其是在游擊區和一個邊貿特區（中心縣委區），在方面軍「前委」秘書長的支持下，更是有恃無恐。到蘇區後要

立即和中央局商議，必要時應採取強制手段，貫徹財稅收支兩條線政策。

博古：我贊同。



1937年在延安鳳凰山毛澤東住處，
博古、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合影。

六屆五中全會

1933年1月19日，博古等一行人安全到達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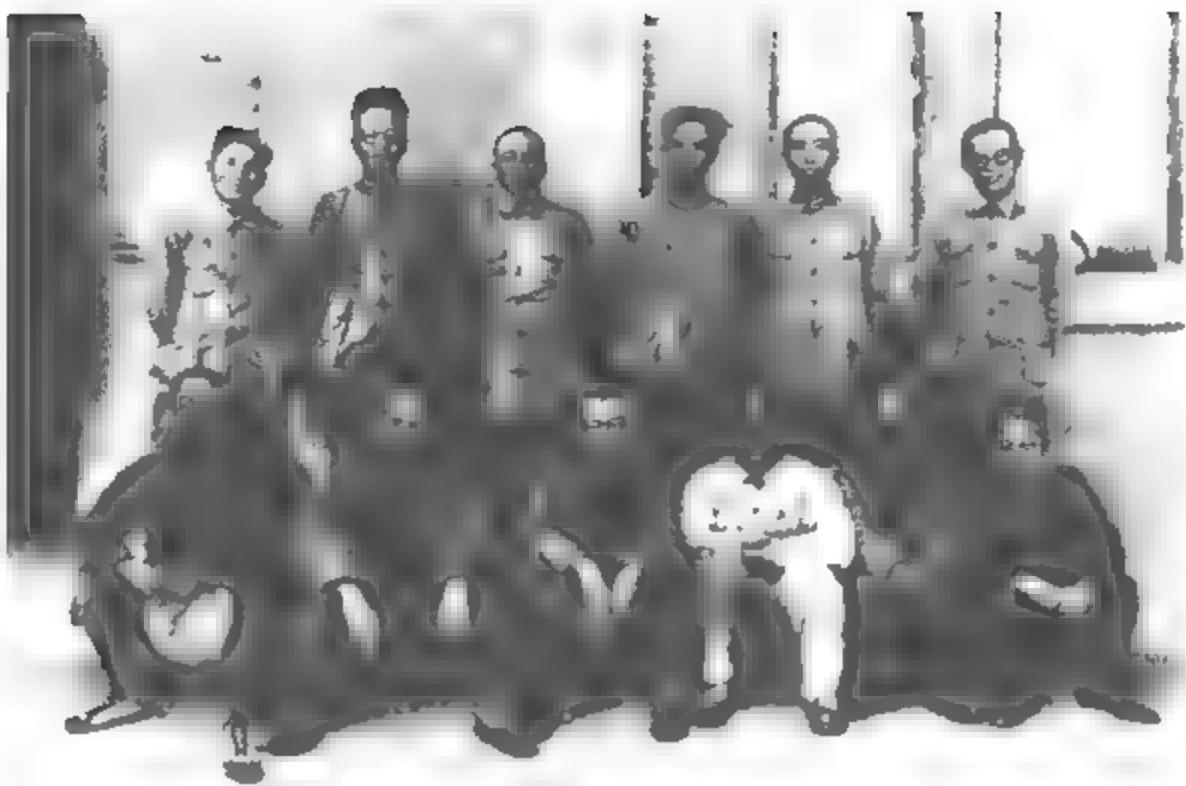
1933年4月初，博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博古、張聞天、陳雲、盧福坦、周恩來、項英、任弼時、關向應、毛澤東、劉少奇、顧作霖、鄧

發、朱德、王稼祥。會議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蘇區中央局工作總結（提綱）〉，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合二為一，成立了政治局「核心組」，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三人組成，博古為總負責人。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了一百萬大軍，一千五百門大炮，五百架飛機，兵分四路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面對這個形勢，中共中央軍委（負責在中央政治局確定軍事路線，行動方針之後，做出戰略決策，調動部隊和作戰指揮）主席周恩來，在前方（建寧）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即九月軍事會議），中央核心組成員博古、張聞天列席了會議。會上幾種意見爭論激烈。周恩來見博古沉思不語，自己也難下最後決心，只好休會，無果而終。會議只通過了兩項人事安排，一項增補博古為中央軍委委員，一項任命項英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中革軍委負責籌集糧草、徵兵擴紅、財務開支、軍械裝備、軍地聯絡等。因為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紅軍總司令，身在前方，所以中革軍委日常事務交由項英負責。

會後，朱德返回總司令部所在地泰寧。博古、李德留在廣昌，領導部隊構築防禦工事。只有周恩來獨自一人，悶悶不樂地回到瑞金。他反復思考，覺得必需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才能解決面臨的問題。首先，在軍事指揮上自己急需一個幫手，一個支持自己下決心的支點。他想起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想起了毛澤東，他要把毛解脫出來，先要從政治地位上下手，恢復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其次，在臨時政治局成立前，一些進入蘇區的四中全會的政治局委員，被寧都會議的「國際電文」一下子全晾到了一邊，只有召開五中全會，才能把他們再召回來，自己說話也才有份量。第三，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央軍委獨木難撐，李德靠不住，必須發揮中央政治局的集體智慧，讓毛澤東對軍事決策有發言權。



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

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
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隨即，周恩來給博古打電話，建議召開「五中全會」。他認為面對當前的戰爭形勢，中央必須自善其身，成立有力的領導全國鬥爭的中央政治局。經博古同意後，周起草了一份電告共產國際的「召開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的報告：「……為適應戰爭需要，團結全黨同志，群策群力，用集體智慧戰勝敵人，決定在得到國際批准後，召開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

1934年1月15~18日，在瑞金，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會議改選了政治局，當選的政治局委員有12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紹禹、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壽、毛澤東、顧作霖。政治局候補委員五人：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何克全。並選舉成立了書記處（政治局常委），由四人組成：博古、周恩

來、張聞天、項英。同時推選博古為總書記。

書記處分工 周恩來留守中央，項英負責南線兼任贛南軍區政委，張聞天負責東線並巡視福建和閩贛省，同時兼顧中央政府的工作，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北線由博古、朱德和李德負責，成立紅軍前敵指揮部，西線由任弼時負責。這個分工實際上是同意了李德的「防守反擊」的戰略。

六屆五中全會閉幕了，留下了一個尾巴，在推選「總書記」的意見上，周恩來不主張現在設立「總書記」，留待「七大」去產生，目前仍維持國際同意的「總負責人」稱號。但項英、張聞天不同意，極力主張現在就應正名，明確黨的領導核心，以利號召全黨，以便開展工作。最後周恩來保留個人意見，書記處通過了「總書記」稱號。共產國際隨後批准了「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的選舉結果，完成了法定的組織手續。



瑞金革命紀念館館內陳列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展板

後來，特別是遵義會議後，周恩來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承認「總書記」這個稱號。為了適應路線鬥爭的需要，許多當事人也有意迴避「六屆五中全會」，甚至在黨史文獻中都避而不提這次會議。^④

④ 1943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風會歷時半年，到1944年2月24日，中央書記處開會統一了對五個問題的認識：

一、王明、博古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

二、臨時中央與五中全會因為有「國際」承認，應該是合法，但必須指出合法手續不完備；

三、學習路線時，對於歷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對結論必需力求寬大，目前是應該強調團結，以便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四、在學習路線時，須指出「六大」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六大」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五、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不採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是做得對的，也應該承認它。

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書記處會議精神，並做了解釋。

第二章

反「羅明路線」的來龍去脈
批判鄧、毛、謝、古
共產國際反右傾運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博古抓教育工作
八一建軍節
博古和毛澤東的關係
博古的錯誤



博古作爲黨的最高領導人前後三年多，在上海 15 個月，在蘇區 22 個月。博古的主要錯誤有兩個：政治路線上教條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軍事路線上依賴瑪唐軍事顧問李德。除參與反「圍剿」軍事鬥爭外，他還做了很多工作：加強黨中央的領導，理順黨政軍關係；推進土地改革，進行查田運動；抓教育、創建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反對個人迷信，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維護中央財政管理制度，撤換「鄧、毛、謝、吉」；確定「八一」爲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擴大紅軍隊伍；推動婦女解放，提高婦女地位。所有這些工作有成功，有失敗，有正確，有錯誤，應給予公正、客觀的評價，不能像官方的黨史那樣，以「左傾機會主義統治」一頂帽子，全盤否定。

反「羅明路線」的來龍去脈

博古和陳雲進入中央蘇區，首先來到福建省的上杭。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劃定的福建省，其實只是原來的閩粵贛特區，夾在武夷山東南端與玳瑁山西南端之間的，沿汀江兩岸的幾個小縣城，省會是長汀。上杭、永定、岩前三個縣在省的南端，是進入中央蘇區的必經之路，三個縣中上杭較大些。前來迎接的是省委組織部長、臨時代理書記羅明，他的彙報是博古進入蘇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沒想到羅明一開口就是領袖毛主席指示……，左一個領袖毛澤東，右一個領袖毛主席……，而對黨中央的指示文件 無所知。

在共產國際中能尊稱「領袖」，或者「導師」的人，只有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理論做出重大貢獻的列寧，才享有此殊榮。連斯大林也只尊稱「同志」。怎麼到了中國，一個還稱不上有多大貢獻，且屢犯錯誤的人，怎麼能以「領袖」自居，而且樂於別人這樣吹捧奉承他。一個組織部長竟然缺乏組織觀念和黨性，有意搞封建迷信，搞封建殘餘的個人崇拜。而蘇區中央局竟熟視無睹，沒有人出來制止這種封建迷信的「變種」，聽任其發展和泛濫。這對黨組織是嚴重的腐蝕，必須制止。而宣揚個人崇拜的羅明還在滔滔不絕地吹捧毛澤東是「神」，這樣的彙報，博古實在是聽不進去了……。^①

接著在群眾中又聽到以省委特派員身份在杭永岩地區領導地方部隊開展游擊戰的羅明與傅伯翠領導的地方保安隊常常發生磨擦，羅公開說傅伯翠是「社民黨」，是「叛徒」。搞得當地民眾都對紅軍沒有好感，對肅反擴大化是有口皆罵，對毛澤東也沒人崇拜，所以幾乎沒人願意參加紅軍，對擴紅冷淡。事情為什麼會發展成這麼嚴重的軍氏對立呢，原來根子在毛澤東發動的「肅反」上。

傅伯翠在閩西很有名氣，早在日本求學時，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回國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上杭區委組織部長，後領導上杭農民武裝起義，任閩西紅七軍十九師五十五團團長，之後又任閩西地方部隊組成的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黨代表，兼上杭縣赤衛總隊總隊長。肅反擴大化中，被污陷為「社民黨」，開除黨籍。羅炳輝十一軍的一個連奉命來抓捕他，被上杭群眾知道後，幾千人把他的住處保護起來，雙方對持不下，十二軍的連隊只好撤走。此後傅伯翠在上杭地區組織地方保安總隊，自任總隊長，實行自治，抗擊進犯的白軍，保一方平安。羅明到上杭後，傅不服

① 項英曾多次反對在幹部中流行這種稱呼，但收效甚微。

管，雙方都不能超過實際控制線，所以時有磨擦。

從上杭到瑞金，一路上既聽到一些幹部對毛澤東的吹捧，更聽到一些幹部對黨中央領導的污衊，稱中央領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親米派」，換言之就是「莫斯科回來的臭知識分子」，是抱著「米夫」的大腿爬上中央領導位子的……等等。這即瞧不起中央領導，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污衊，必須肅清這種惡習。

到瑞金後，竟然感覺不到黨的領導，蘇區中央局形同虛設。黨、政、軍系統各自為政，且職責不明。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長期在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與指揮作戰，把中央局書記的職責分解到下面各部門，形成政出多門的現象。同時周恩來又把軍委機關放在蘇區中央局內，而中革軍委主席是朱德，同時兼任紅軍總司令，他也把軍委機關掛靠在總司令部。於是紅軍總司令部遷到哪裡，它也跟著搬到哪裡。兩個蘇區最高的軍事機構，一個放棄不管，一個帶著到處走，這種不正常現象卻得到毛澤東的鼎力支持。作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卻不在政府上班，躲在瑞金以東一、三十里遠的東華山古廟裡小病大養，還專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項英的差錯，真是不工作的整工作的。這種怪現象，必須徹底糾正。也正是因為黨的領導被削弱，「個人崇拜風」才得以囂張。

凡此種種，根本問題是蘇區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核心領導層。於是傅古和周恩來商量後，決定把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合併，為此召開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傅古、張聞天、陳雲、劉少奇，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鄧發、王稼祥。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選傅古為總負責人。中共中央局下設組織部部長任弼時、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秘書處秘書長嚴重，黨報委員會由張聞天兼書記。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推選傅古、周恩來、張聞天三人組成，

博古負總責。經過這次組織處理後，蘇區黨、政、軍有了統一領導，中革軍委機關也遷回瑞金，增補項英為中革軍委副主席。朱德在前方時，這個職務由項英代理。

但是光有組織完善還不夠，這個組織還必需在實際鬥爭中經受考驗，才能樹立起黨中央的威望。這時羅明問題發生了……。

1933年1月賀子珍在長汀福音醫院分娩，毛澤東借着看望妻子之名，住進了福音醫院附設的「老古井休養所」，召見了中共福建省臨時代理省委書記羅明。由於毛澤東已經和正規部隊脫離關係，他找羅明想用地方武裝來驗證他提煉出來的游擊戰「十六字訣」的戰術。他問羅明 現在前方有無戰事？羅說：邊界很安靜，十九路軍在杭永岩地區無大兵力，也無進攻意圖。毛說 我們的目的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相安無事對敵人有利。我們要開展游擊戰，本著「敵駐我擾」的原則，集結兵力，攻其一點，打了就跑，不怕山高路遠，再奔襲另一個點，這樣一個鄉、一個鎮、一個縣城，消滅它一個排、一個連、一個營的有生力量，既牽制和打擊了十九路軍，也使廣東陳濟棠的部隊不敢輕舉妄動。我們也補充了給養，壯大了隊伍，肥了自己嘛。

羅明聽了毛澤東的啟發後，茅塞頓開。第二天便召開省委會議，傳達了「領袖指示」。參加會議的有張鼎承、劉曉、李明光、郭謫人、李堅貞等，一致表示擁護「領袖指示」，並決定由羅明任省委特派員前去上杭、永定、龍岩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會後羅明就到長汀、新泉、上杭、永定等縣，分別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向當地幹部傳達了「領袖指示」和省委決定，並在杭、永、岩成立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把三個縣的地方武裝集結在一起，編成一個游擊縱隊，向敵人實施「點擊戰術」。所謂點擊戰術就是：打、搶、跑。他集中兵力突襲敵人一個點或一個小縣城，然後對被攻佔的地方或城市，實行所謂的「堅壁清野」，把

錢、糧、油、鹽、布匹、藥材、煤油、香煙等物件統統洗劫一空，活像一群「山大王」，然後迅速撤出，又去進攻另個小縣城。這樣打一處，搶一處，再去一處的游擊戰，老百姓能不恨嗎？當敵人集結兵力追殺過來，羅明放棄邊界，置當地百姓於不顧，「誘敵深入」，等敵人的隊伍越拉越長之後，他去襲擊敵人的側翼或尾部。這樣的拉鋸戰使當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博古不反對游擊戰術，他一向認為「農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曾多次強調「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道路，「才是蘇維埃的道路」。在總結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時說：「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游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游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游擊隊伍，那我們的勝利一定比現在大的多」。因此博古提出要組織「新的游擊區與蘇維埃根據地」，「廣泛開展游擊戰爭」。1933年9月，在給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獻辭中，明確指出：「為爭取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完全勝利，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是我們戰爭動員中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保證主力紅軍在決戰中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但是博古明確反對羅明這種「掠奪式的游擊戰爭」，因為這不是共產黨人主張的游擊戰爭。博古的意見是：在開展地方武裝攻佔小城市的問題上，應本著「熟一個，搞一個」的原則進行。對被佔領城市只准收繳武器、彈藥，不准侵佔私人財物和商貿，要讓居民安心生活，歡迎紅軍隊伍，只有這樣才能擴大根據地，紅軍才有兵源。而且只有出於戰略上的需要，才可以放棄已經解放了的城市。

為了糾正羅明這種被邊界兩邊人民都罵是「赤匪」的「見啥拿啥」的游擊戰，挽回黨在杭永岩地區的形象，貫徹黨中央對攻佔城市「不擾民、不擾商、稅款繳國庫」的原則，中央決定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由張聞天、任

弼時、王稼祥二人負責，張聞天任組長。

當他們一行到達長汀時，就收到羅明在新泉向省委寫的《對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報告提出：

一、堅持杭、永、岩地區的游擊戰，廣泛發動群眾，實行堅壁清野，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以打擊深入根據地的敵人；

二、迅速造成新的紅軍主力，加強擴大獨立師第七師、第八師，並與獨立第九師一起，向閩西北發展，消滅連城、寧化一帶的團匪，以鞏固蘇區的後方；

三、地方武裝應著重打擊團匪，對敵人正規軍則採取游擊戰和運動戰，從打小仗中來鍛煉。不估量地方武裝的力量，一味要求硬打強敵是錯誤的。

四、要注意邊區、新區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千篇一律地分配擴紅人數，土地稅款收入也不能完全集中到國庫，應有地方的機動費用；……

從這份《報告》看，杭永岩地區已經淪陷，敵人已經「深入根據地」，而羅明在辦完「堅壁清野」之後，要求老百姓「積極開展游擊戰爭」來自救。其次，羅明擔心的是盤據在連城（長汀東面）和寧化（長汀北面）的敵人，可能趁機出動攻打長汀，這樣領袖毛澤東的戰術測試就會全盤失敗了，所以他要求省委「迅速……加強和擴大」所管轄的地方部隊，「向閩西北發展」，「去消滅連城、寧化一帶的團匪（即地主武裝）……鞏固蘇區的後方」。報告中最要緊的一點是，不要把稅款交國庫。

民眾有二個問題要羅明說清楚：

一、杭永岩邊區領土大片損失，誰應負責？是誰批准在杭永岩成立「前敵委員會」的，為什麼不報告中央軍委。這種在邊界兩邊消耗老百姓生命和財物為目的的戰爭，是什麼戰術？

二、是誰決定在邊界兩邊搞「堅壁清野，見啥拿啥，拿了就跑，叫老百姓怎麼生活？

、國家的稅款，你羅明竟敢明目張膽地截留，是誰在主使？

在批判會上，群情激昂，喊口號，批判時說重話等，都是在情理之中的，這不是中央佈置的，是羅明的所作所為啟發的，尤其是杭永岩地區身受這場飛來災難的民眾，怎能不讓他們吐出苦水呢！

無獨有偶，羅明還在1933年1月30日，在上杭向省委寫了一份《關於杭永岩情況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這個報告是針對中央1月25日發佈的財稅通令而寫的。報告的中心意思是 截留財稅有理。他在報告中說：現在「群眾情緒低落，擴紅比較困難，群眾大都願意參加游擊隊，^② 不願意參加主力紅軍」^③ ……，我們「必須改變那種空洞的政治說教，^④ 不能簡單地認為群眾情緒低落是由於政治動員不夠，或者是說黨的領導不夠……」等等，「這種看法都不是目前問題的中心」，「中心的問題是如何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在勝利的鬥爭中切實保護群眾利益，調動群眾的鬥爭情緒和勝利信心」……。那麼什麼是「正確的戰略戰術」，能「切實保護群眾利益」呢？羅明一語道破，那就是「把土地稅交給地方武裝處理，或減、或免、或由地方機動」……。反正不交國庫。

為了說明「政治說教」無用，報告中還強調：「如果我們不懂得這一點……，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者請列寧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殘的地方，^⑤ 去對群眾大演講三天二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

② 指傅伯翠領導的保安總隊。

③ 指省軍區領導的獨立師——實為地方武裝。

④ 宣傳教育。

⑤ 指被敵軍佔領過的村鎮。

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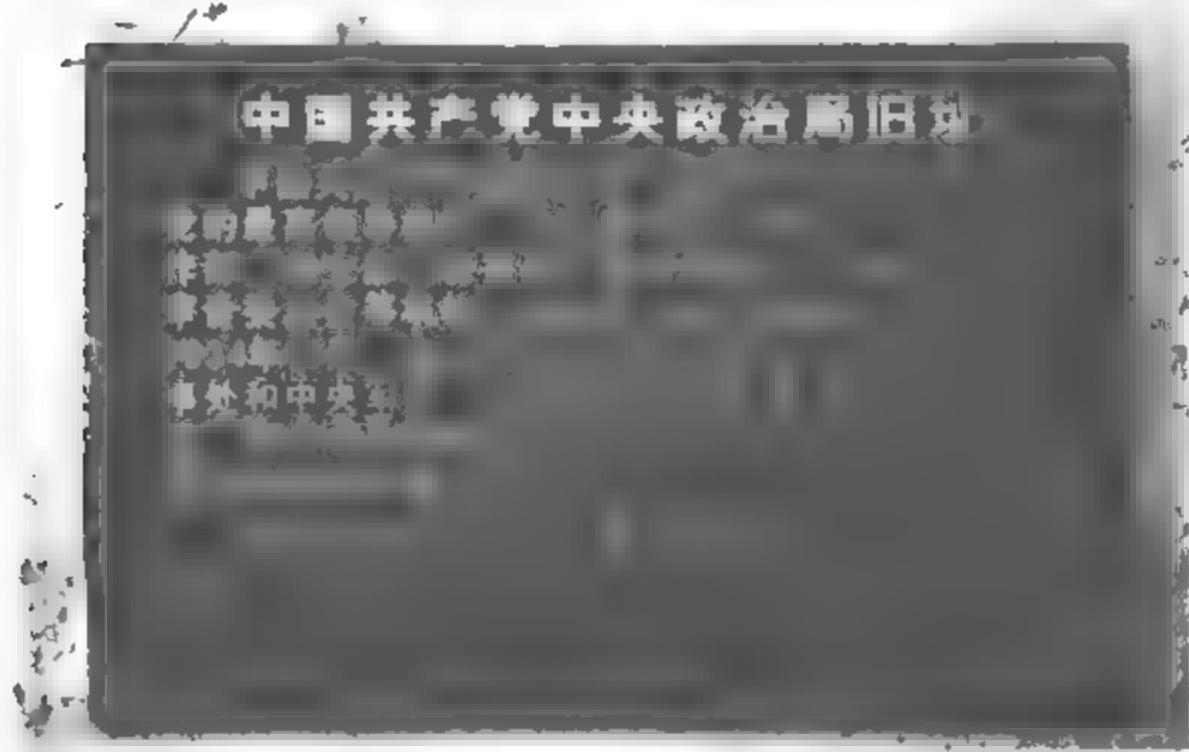
話說得多麼狂妄，把政治工作貶得一錢不值。在受到敵人摧殘的地方，群眾生活困難是事實，但不能否定群眾對敵人的仇恨心，這個時候正需要政治鼓動，把群眾的愛國愛家抗敵的情緒調動起來，把解決群眾生活困難結合起來，生產自救，這才是正確的道路。中央 再說 不是不讓地方用錢，而是用錢得先做預算，經批准後可以留下。一個國家家用錢的地方很多，除了蘇區，白區開展革命活動也要用錢，因此用錢必須計劃使用，量入為出。而以羅明為代表奉行「羅明路線」的人，總是認為「銀子是我收來的，繳不繳由我」，「政治說教我不聽」的態度。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

施拉姆著的《毛澤東》一書，第 163 頁上有這樣一段話 虽然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公開地譴責羅明，但他還是按照上級的旨意譴責了一切與「羅明主義」有關的異端，並說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完全是由於中央委員會的「出擊」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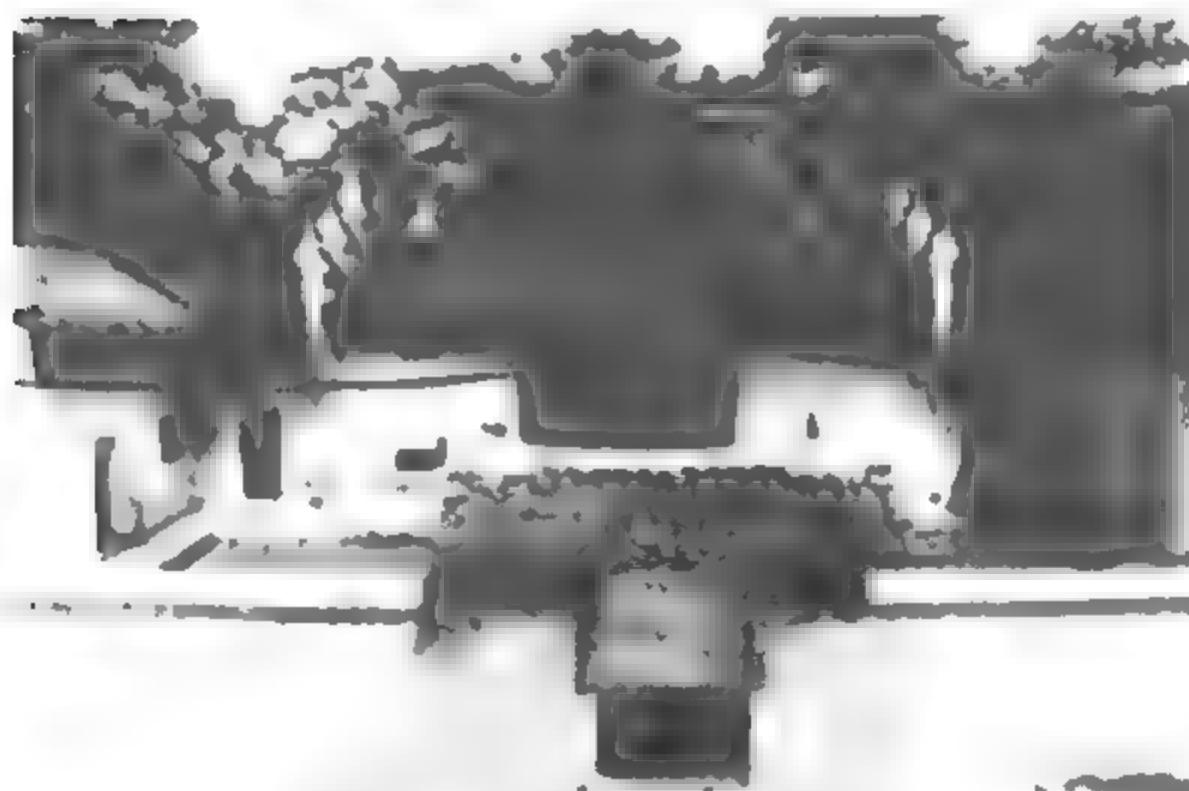
批判鄧、毛、謝、古

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江西省，共轄 17 個縣，在吉安市周邊的三個縣是永豐、吉安、泰和，這裡即是赤白對立的地區，但也是商貿往來頻繁的地區。除了吉安市，贛南還有一個大城市是贛州，周邊有興國、贛縣、雩都三個縣，情況和永、吉、泰地區相似，也是商貿往來頻繁的地方。再一個是贛南和粵北交界的地段，即會昌、尋烏、安遠這三個縣，既是蘇區的邊陲，也是商貿興旺的地面。毛澤東看中了這個特殊地區是蘇區的「錢口袋」。於是宣佈這二地區設「中心縣委」，直接歸前委秘書長古柏領導，並明確指示這三個地區的土地稅繳中央一成，自留七成，商業稅全自留。

毛澤東任命了三個中心縣委書記，永吉泰是毛澤覃；興贛雩是謝唯俊；會尋安是鄧小平。



江西瑞金沙洲壩下肖村中共中央政治局辦公舊址的說明牌



瑞金下肖中共中央所在地舊址

開展革命活動要錢，養活一支軍隊要錢，各級機關工作人員要發工資，……等等，各方面都需要經費，錢從哪裡來？1931年前共產國際的支援是一個重要來源。1931年後，由於東北形勢的變化，共產國際的支援重點放在了東北。黨中央的財政主要靠蘇區的稅收和戰爭中收繳的浮財。由於各個蘇區的情況不同，收入的差距很大，所以中央的財政主要依靠中央蘇區的土地稅、商業稅。至於鄂豫皖蘇區則相對要少些，湘鄂西的上繳則更少，其他如贛東北、甘陝川邊等蘇區就幾乎無上繳。但作為中央則必須全面考慮，對收入少的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鬥爭，都按需給予一些接濟。這就要求蘇區必須按中央要求上繳稅款，上繳的方式是採取收支兩條線，即收多少報多少，自己需要用多少，報項目，錢數，經中央批准後再留下。

中央蘇區竟然在黨中央一再強調「土地稅款收入必須完全集中到國庫」、「商貿稅收應向中央報數字……，蘇區需要開支費用時，應向中央闡明理由，經中央批准後向國庫支取……」的明確要求下，公然截留稅款，反對「收支兩條線」的財政管理體制。毛澤東還指示古柏，要「留足地方和軍隊，再交國庫」。謝公閑說：「錢是地方和軍隊收來的，理應有權使用，動輒請示報告，那是對蘇區和軍隊不信任」。事情越鬧越僵，以至中央蘇區一度拒不向中央繳款，連花不出去的黃金也不繳，弄得中央財政十分拮据，延誤了向其他蘇區和根據地的物資供應，以及影響了白區的一些革命活動。所以博古、陳雲到達蘇區後，立即和周恩來交換了意見，發佈了財稅通令。

接著，張聞天等到一個「中心縣委」地區做了實地調查，認為「這是江西的羅明路線」，責成鄧、毛、謝、古四人做深刻檢查，接受群眾批判。中央根據張聞天的報告，下令撤消了「中心縣委」，並對鄧、毛、謝、古四人做了組織處理。鄧小平調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兼《紅星報》主編。

毛澤覃調獨立五師任師長；謝唯俊調中央組織部任巡視員，占柏則戴上「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的帽子，受到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下放到糧食部做糧食徵集工作。同時，經周恩來指示，對羅明也做了組織處理，調中共中央局黨校任教務主任。

共產國際反右傾運動

1927年秋，蘇聯出現了糧食收購危機，圍繞著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解決危機的辦法，蘇共黨內出現了嚴重的爭論和分歧。斯大林認為造成糧食危機的原因是小農經濟的束縛和富農的破壞，是富農分子在新經濟政策下對蘇維埃的一次嚴重進攻。解決的出路，首先是實行農業集體化，必須向富農開展進攻。布哈林貝認為出現糧食收購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計劃工作和領導工作的失誤，在於新經濟政策沒有很好地貫徹落實，以及工業發展速度過快等造成的。解決的辦法是徹底肅清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殘餘，繼續貫徹新經濟政策，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並注意國民經濟中的綜合平衡，適當壓縮工業投資，使工農業能夠協調發展。

這場爭論涉及到了蘇聯的建國方針，爭論持續到1928年夏天。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委的聯席會議上，發表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的講話，強調了右傾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主要表現是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決竅，如要求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寬容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問題推到後面去等等。這都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號召全黨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11月14日，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斯大林再次強調右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吹響了全黨開展「反右」的號角。

1929年1月3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召開緊急聯席會議，討論布哈林問題。斯大林做了《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發言，指責黨內形成了以布哈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布哈林在會上為自己辯護，雙方爭辯十分激烈，聯席會議暫時休會。

1929年4月，再次召開中央聯席會議，會上斯大林發表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宣佈黨內存在一條布哈林集團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辭職、誣衆、暗中破壞等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是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布哈林在發言中針鋒相對地反駁說，正是斯大林自己推行了一條違背新經濟政策的路線，使國家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聯席會議最後以舉手表決通過了解除布哈林《真理報》主編職務，解除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職務。會後被劃入「布哈林集團」的人，全都被隔離審查。

在無情的批鬥下，1929年11月底，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人違心地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自我批評聲明〉，承認錯誤。接著在全蘇聯各地全面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凡是和當地黨的主要領導意見不一致的，統統被當地黨委和監委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場鬥爭持續了近五年時間，直到1934年才宣告結束。

由於布哈林曾經擔任過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1933年1月斯大林指示共產國際也要「清除布哈林右傾思想的影響」，於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及下屬機構開始「消毒」，隨之又通過共產國際波及到各支部，各支部所在國也先後開展了「反右傾運動」。

博古接到共產國際《關於開展反右傾鬥爭的決議》的電傳文件時，已經是1933年7月中旬了。當時中央蘇區正在進行「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於是博古提議二者合二，不再另行開展「反右傾」鬥爭。理由有二：一是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已經開始，戰爭壓倒一切，不能再內外一條戰

線上同時打仗，是即便有「右傾分子」，也已經在一年多的「肅反擴大化」中，被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光了，所以無需再補這課了。博古的意見獲得中央局完全同意。所以也沒有向川陝邊和湘鄂川邊兩大蘇區通報這件事，從而避免了又一場「人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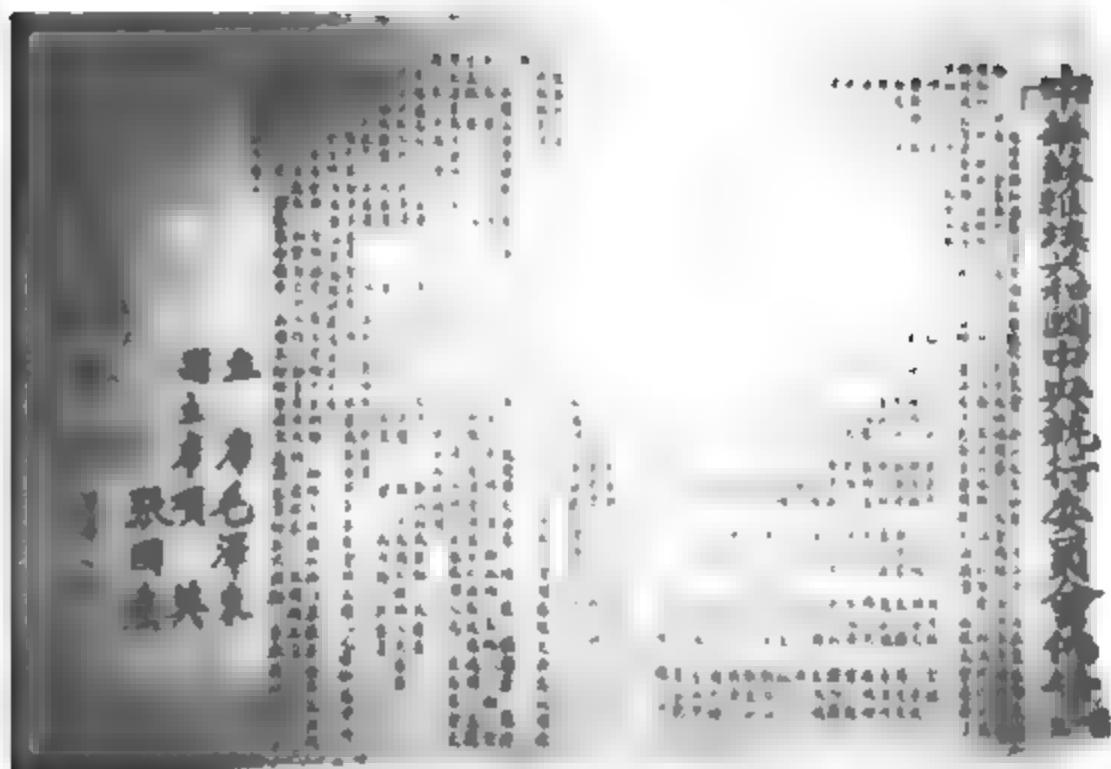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早在 1930 年初，中共中央就醞釀成立全國性的政權。5 月曾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大會準備委員會。當時主持中央的李立三曾設想把中央政府設立在武漢或長沙等中心城市。

1931 年 5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臨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籌備工作改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進行。6 月 1 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佈 8 月 1 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後改到 11 月 7 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舉行。

1931 年 9 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主持中央工作。10 月，蘇區中央局致電希望要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博古主持召開會議，研究人選問題，由於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有一定威望，經討論後，於 10 月下旬致電蘇區中央局，確定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燦、項英。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召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項英致開幕詞，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 610 人。



「二蘇大」執委會佈告

大會主席團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制定並通過了《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並陸續通過了《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府》等法令。根據憲法，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處理日常政務並發佈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會議選出毛澤東、項英、張國壽、周恩來等 63 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大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會議 20 日閉幕，毛澤東致閉幕詞。

11月25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 15 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

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壽為副主席。

雖然「蘇維埃」的名稱，以及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都是搬用蘇聯的經驗，有「教條」的嫌疑，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憲法大綱」明確宣佈「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這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在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和紅軍的統一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就在中央政府成立不到一個月後，發生了寧都起義，二十六路軍在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仲岳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將一支很有戰鬥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編為紅第五軍團，引起很大震動。

1934年1月22日至2月3日，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



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
1934年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此召開。

代表大會，大會在瑞金沙洲壩中央政府大廳舉行，參加大會正式代表 693 人，另有 1500 人旁聽。

大會選舉秦邦憲、陳紹禹、毛澤東、項英等 175 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月 3 日，中執委第一次會議上，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等 17 人為中執委員會主席團，下設 11 個人民委員會為中央行政機關。繼續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出任人員委員會主席。

中華軍委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來、王稼祥。

這次會議召開表明中國的紅色政權的建設日趨完善，為日後的建國積累了人才和經驗。

1935 年 11 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丁寺灣。11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對外用中共西北局和蘇維埃西北辦事處的名義。任命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成立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成立西北軍委後方辦事處，周恩來為主任。

博古在會議上提出西北辦事處各部部長名單。



1934 年 2 月「中華蘇維埃第二蘇大」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合影。

11月10日，張聞天、博古率中央機關到達陝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瓦窯堡，受到陝北人民的熱烈歡迎。同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宣佈蘇維埃西北辦事處正式成立，公佈辦事處負責人名單。

財政部長林伯渠，糧食部長鄧發，土地部長王觀闡，國民經濟部長崔田民（後改由毛澤民擔任），教育部長徐特立，司法部長謝覺哉，內務部長蔡樹藩，勞動部長鄧振聰，工農檢查局長羅梓銘，西北政治保衛局長王首道，後因工作需要又成立了外交部，部長由秦邦憲兼任。

1937年9月6日，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改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区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此自動終結。

博古抓教育工作

博古在中央蘇區投入精力較多的是抓教育。

博古剛到中央蘇區時，只有一所中央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其前身是毛澤東秋收起義的隊伍在三灣縮編時，為了處理分離出來的多餘軍官而成立的軍官教導隊。後又改成「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紅四軍成立後又定名為「紅四軍軍官教導隊」。1931年5月擴編為「中央紅軍軍事政治學校」（簡稱紅軍學校）。這所學校主要培養和造就下級軍官和地方武裝的指揮員，教員全是從一方面軍中抽調的營連幹部，質量不高。

博古覺得應該像莫斯科那樣，設立一所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幹部和營團以上的中層軍事政治幹部的軍事大學。他找到周恩來和劉伯承、葉劍英商量，大家都贊成。毛澤東還提議由何長工籌建。何提出可以在紅軍學校的基礎上擴建成大學，辦成一所高（軍師級）、中（營團級）、基（連排級）

三層教育的綜合軍政大學。中央採納了何的意見，定名為紅軍大學。校址選在瑞金城東約15里遠的大埠鄉山溝裡。這裡群山環抱，蒼松翠竹，是個讀書習武的好地方。

1933年11月7日，紅軍大學開學，由劉伯承任校長兼政委，鄧萍任教育長，楊至誠任校務主任，何長工任政治部主任。

紅軍大學設三個專業科：指揮科、政治科、參謀科，培養目標是營團以上軍事政治幹部；另設高級班、深造師、軍級以上高級軍事幹部，同時還設有二個基礎預科班，挑選軍隊中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連排幹部來培訓，為晉昇中層幹部打基礎。為了辦好紅軍大學，培養好紅軍各級軍事政治幹部，中央局領導都曾在這個學校講過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毛澤東、葉劍英、鄧小平、李伯釗、肖勁光等都來講課，課前精心準備，講課時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淺出，他們的講課都深受學員歡迎。劉伯承為這所大學更是嘔心瀝血，傾注了全部精力和智慧。在經費上，中央局在最困難的時候，陳雲也盡力保證軍校的開支，使師生安心合力辦好這所軍事大學。

在籌建紅軍大學的同時，博古也看到了中央蘇區缺乏一所提高文化知識的大學，光有一所軍校是不夠的。於是在中央局會議上提出，除了軍隊要開展辦「識字班」，各縣鄉要辦中心小學，以提高士兵和適齡兒童、青少年的文化水平。普及社會教育外，在瑞金還要辦一所像莫斯科中山大學那樣的有多門專業學科的綜合性大學。

他委託好友潘漢年來籌建，校名為蘇維埃大學。

1933年6月，中央人委委員會在主席項英的主持下，通過了在瑞金創辦「蘇維埃大學」的決定。決定指出：「因為革命戰爭的迅猛發展，環繞著革命戰爭的每個重大工作，如查田運動、經濟建設、工人鬥爭、文化建設、財政工作、肅反工作、道路建設、新蘇區的發展，以及目前的選舉運

動，都需要大批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幾萬人繼續供給到各個工作的戰線上去。中央政府各部都在辦訓練班。為著集中領導，統一教授與學習的方便起見，決定開辦「蘇維埃大學」。蘇維埃大學的校址，選在瑞金沙洲壩中央政府附近的黃土崗上，蓋了五棟竹木結構的大草房。



1933年5月31日為紀念五四運動，在瑞金召開體育運動會。
這是部分主席團和裁判員的照片，博古是總裁判員。

項英向博古建議，由毛澤東來擔任蘇維埃大學的校長。理由是一、毛澤東曾在北大工作過一段時間，熟悉學校的管理工作；二、毛曾在廣州辦過農民講習所，熟悉講學；三、有蘇維埃主席的身份，對提高大學的社會地位有重要作用。同時由於項英是中央政府的首腦，政府工作比較忙，難以再兼任蘇維埃大學的校長。

1933年8月20日，中央局組織部任命毛澤東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沙可夫任副校長，由毛澤東、沙可夫、林伯渠、梁柏臺、潘漢年五人組成蘇維埃大學委員會。8月21日，蘇維埃大學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首屆招收1500名學生，分普通班與特別工作班。普通班是預科，招收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學員，進行文化補習，修業期限不定，特別工作班是大學本課，設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工農檢察、教育、內務、勞動、司法等八個專業，1934年春，又增設了外交、糧食兩個專業，共計十個專業。由於處於戰爭時期，吸取當年黃埔軍校的經驗，蘇維埃大學和紅軍大學，這兩所高等學府的學制都是半年一期。

1933年9月，蘇維埃大學正式開學。使用的教材由軍隊和政府各部門，抽調有專業知識的人，分門組成集體編寫班子，寫成初稿，討論通過後成為教材。整個學習過程貫徹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階級鬥爭服務，教育與生產相結合的方針，以及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講課與討論相結合的方法，使學習收到很大的實效。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的領導，及各部門領導都先後到校講課。學校除設正教員教課外，還設副教員輔導學員學習。入校學生還自己選舉產生「學生公社」，幫助學校對學生進行民主管理。

博古的好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師，1930年10月回上海後，在1931年初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長，後調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去鄂豫皖後任鄂豫皖省委書記的沈澤民，於1933年11月20日，因病在黃安縣天台山蘆化沖逝世（他也是被毛澤東稱之為「十八個半」的人物之一）。接到張國燾、陳昌浩的喪電後，伯父悲痛欲絕。張聞天提議將蘇維埃大學改名為「沈澤民蘇維埃大學」，以誌紀念，中央局批准了這個校名。

由於毛澤東「養病」，無暇兼顧蘇維埃大學校長的工

作，於是 1934 年，中央局的一次會議上，同意蘇維埃大學更名為「沈澤民蘇維埃大學」的同時，免去了毛澤東校長之職，任命 1934 年 2 月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的原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瞿秋白接任校長，徐特立任副校長。中央核心組分工張聞天兼管教育。

1934 年 4 月 1 日第一期開學。在開學典禮上，張聞天講話，他說 沈澤民蘇維埃大學是在國內戰爭的環境中開學的，每個學生同志都應瞭解到自己的任務是學習領導革命戰爭。沈蘇大學的學習中心任務和紅軍大學稍有不同，紅軍大學學習的是領導廣大的紅軍戰士和敵人進行武裝戰鬥，而沈蘇大學的學生卻應當學習領導廣大的工農勞苦群眾，進行一切戰爭動員工作，來幫助戰爭……。張聞天的講話，明確了沈澤民蘇維埃大學的辦學宗旨、任務和方向。

早在 1933 年的春天，博古到蘇區不久，就召集張聞天（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任弼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楊尚昆（1931 年從莫斯科回國後在上海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現任中共中央局宣傳幹事，《紅色中華》、《鬥爭》編輯）、董必武（1932 年 10 月從莫斯科回國後，1933 年春來到瑞金，尚未正式安排工作）開會，一起研究如何提高黨員素質問題和要不要在中央蘇區恢復工會工作。

大家同意博古的提議辦一個黨校，但不同意在蘇區搞工會，理由是城市人口少，沒有什麼產業工人，一般工人佔的比例也太小。蘇區主要是農業和農民，正在進行土改，所以不必要在蘇區搞工會了。但是由於「全總執行局」這個機構不能撤，可以在蘇區兼管黨校的工作。於是大家一致意見，由中央局與全總執行局聯合創辦一所規模較大的黨校性質的幹部大學。

大學定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校址設在瑞金的金洋溪，蓋了四間大草房，簡稱「蘇區中央黨校」。校長任弼時兼，專職副校長董必武、楊尚昆（兼職）。1933 年 3 月

14日（馬克思逝世50週年紀念日）開學。^⑥

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學的學員，畢業後同沈澤民蘇維埃大學的學員一樣，分配到地方紅色政權或軍隊中去工作，成為黨和蘇維埃政府及軍隊的骨幹。

八一建軍節

1933年6月26日，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局討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提的「關於『八一』定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建議」。會上有人提議應以秋收起義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理由是南昌起義是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沒有打共產黨的旗號，而且起義失敗了。但是周恩來、朱德等多數同志支持「八一節」，認為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的第一槍，而且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成為紅四軍的主力。會議同意並做出《中央局關於『八一』國際反戰爭鬥爭日及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決定》。

同年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決定「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的命令，指出：

1927年8月1日發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這一暴動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開始，是英勇的工農紅軍的來源。

7月11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央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召開了第46次會議，決議「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

⑥ 後任弼時調湘贛省任省委書記，校長由董必武繼任。

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規定「於今年『八一』紅軍節授予戰旗於紅軍的各團，同時授獎章於領導南昌暴動的負責同志及有特殊功勳的指揮員和戰鬥員」，「制定紅軍家屬優待證」。此後，每逢「八一」建軍節，都要開展擁軍擁屬的活動。

1933年8月1日，在瑞金舉行隆重的閱兵式和紀念活動。

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此紀念日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博古很重視擴大紅軍的工作，早在臨時中央在上海的時候，他就提出：「組織與擴大新的基礎上的革命軍隊，儘量地提高紅軍的政治和技術水平，提高自覺的軍事紀律，籍以抵抗敵人的進攻，……達到工農民主專政在全國的勝利，這應該是我們在這個時期中的基本的政策」。

進入中央蘇區後，博古又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講話，反復強調擴大紅軍的重要性，把建立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作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一項基本任務。

1934年8月1日，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成立六週年時，他再強調「紅軍成了蘇維埃政權可靠的強有力的武裝支柱，成了解放全國民眾的『主力部隊』」。

在強調革命軍隊在武裝鬥爭中的重要性的同時，博古還多次強調農民在武裝鬥爭中的作用，強調「武裝鬥爭要發動農民來進行」。博古指出：「要想擴大紅軍，開展武裝鬥爭，就必須發動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只有解決了農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們成為蘇維埃政權激進的贊助者與支柱，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可靠的盟友與後備軍」。

在博古、項英和周恩來的重視和關注下，加上中央蘇

區根據地的土改工作查田運動的勝利，解決了農民的土地要求後，很多鄉都超額完成招兵任務，擴紅工作進展順利，到了1934年9月底，中央紅軍的總人數增加了一倍，達到八萬餘人。

博古和毛澤東的關係

博古在1933年1月赴蘇區之前，對毛澤東並無接觸，沒有什麼感性認識。一方面他知道毛澤東是紅色根據地的創始人，會打仗，而且是莫斯科共產國際唯一宣傳的中共領導人，「朱毛」紅軍赫赫有名。另一方面他也聽說毛曾多次被撤職，在紅四軍黨代會、贛南黨代會兩次落選。「富田事變」後，蘇區多次有人去上海中央控告毛澤東獨斷專行、排除異己。特別是「寧都會議」因毛澤東抗拒共產國際指示而被剝奪軍內黨內的領導權，去做政府工作。所以博古對毛澤東的直接瞭解並不多，只覺得他是個經常犯錯誤，獨斷專行，喜歡「抗上」的人。

博古到蘇區後，聽到見到更多關於毛澤東的事情，例如他聽任別人吹捧自己為領袖，在軍中沒有職務，但只對軍事有興趣，身為政府主席，卻不去上班，在古廟小病大養；看不起從蘇聯回來的幹部，挖苦他們是「一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對自己從不作自我批評；講話喜歡引用古文典籍，高深莫測。而博古本人講民主作風，堅持集體領導，重視組織原則，不善權謀，對人坦率，不喜歡拐彎抹角，與毛的作風不大對路。加之，當時毛澤東已是40歲的中年人，博古還是24歲的青年小夥子，所以他對毛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沒有更多地向毛請教，少有和毛長談的機會，但也沒有直接衝突。博古為了提高黨中央的權威，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而是得到中央局多數同志

的支持。但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反對我的」，而後成為博古的一大罪狀。



博古與毛澤東在「七大」親切交談

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蘇區中央局請求臨時中央派一個工人出身的同志來主持，博古支持由毛澤東任中央政府主席。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託病沒有出席，博古支持將毛澤東從政局後補委員昇為政治局委員。查田運動他考慮到毛澤東瞭解農村，瞭解實際，責成毛澤東負責領導查田運動。這都證明博古雖然對毛有一些看法，但對他本人並無成見，分歧僅在於不同的政策主張，一切以革命大局為重。

毛澤東自秋收起義開創紅色根據地，幾經挫折，幾起幾落，也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特別是「寧都會議」上剝奪了他在軍內黨內的領導權。以往幾次「下臺」都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很快被請回來，而這次持續近一年時間，給了他極大的教訓。這段期間他開始有所調整。他認識到共產國際作為領導的權威地位，不再硬頂硬抗。他收斂了對中央所謂

「留蘇派」的蔑視、挖苦，開始耐心地做溝通、分化工作，拉近和王稼祥、張聞天的關係。對分配給自己的查田運動，開始是拖著不辦，後來也積極地投入了。

長征前毛澤東寫信給博古要求留在蘇區，博古和周恩來都不同意，經周恩來勸說，毛才改變主意。很快，毛澤東、張聞天要求把中直機關和軍委機關組成一個縱隊（所謂二頂「轎子」），周恩來說「老毛有打仗經驗」，勸博古接受了這個要求。不論毛、張提出這個要求有什麼動機，至少做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路上能在一起行軍，便於進行「小組織活動」。人稱「中央縱隊小三人團」，而博古聽見反映也不往心裡去。

遵義會議後，博古主動讓權，為自己給革命造成損失十分痛心。他不鬧情緒，積極工作，希望彌補損失於萬一。在會理會議及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博古都堅定支持毛澤東，他相信毛澤東能領導紅軍走向勝利。為此，毛澤東說：博古是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到達陝北成立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時，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1934年博古沒有殺我，叫我當蘇維埃政府主席，五中全會又提名我當政治局委員，禮尚往來麼，這次成立蘇維埃政府，理應由博古任主席。

西安事變，派出博古率中共代表團赴西安和先到達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共同妥善處理。之後博古多次受中央委派在南京、武漢、重慶負責和國民黨的統戰工作，黨的組織工作。回到延安又負責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等重要工作。當然一方面當時是用人之時，但也可看出毛澤東看重博古外交、文化方面的才能。在毛澤東領導下這是博古發揮才幹，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期。1936年9月他曾對潘漢年說：從這些跡象看，毛澤東今後不會太為難我。

博古沒有想到幾年之後延安整風，毛澤東對他老賬新帳一起算，他成了頭號被批判對象，被批得一無是處，甚至提到他是「篡黨」，「混入黨內」。博古不得不為真理起見寫

了十點聲明，以維護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尊嚴。

後來官方黨史提到博古時，只有一個評價：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博古英年早逝，成為「四八」烈士之一，毛澤東提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文革期間，有一次談起黨內歷史上的領導人，周恩來提到「還有博古」，毛澤東說：他已死了，以後就不要提他了。

博古和毛澤東都已作古，他們的恩恩怨怨也早成歷史，歷史應該會記住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的貢獻，而他們的功過也只能任由後人評說了。

博古的錯誤

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一年，主要錯誤是兩條：政治路線上教條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軍事路線上依賴偏信軍事顧問李德。

政治路線上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 在形勢的分析上接受了共產國際對「九一八」事變的分析。認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進攻蘇聯的序幕，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從而模糊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正目的是要滅亡中國，霸佔中國的資源，奴役中國的人民。因此這個口號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對動員廣大群眾抗日救國缺乏應有的力量。

2 在階級關係上，接受了斯大林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左傾」看法，不承認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從而使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實行「左」的關門主義。1932年1月，臨時中央通過了《中央關於爭取

革命在 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說：「在目前形勢下，國民黨的破產已經是鐵 一般的事實」，一切屬於中間勢力的在野派，「他們一致的作用是幫助國民黨維持它的統治，來使群眾不去反對與推翻國民黨統治，而向國民黨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機迅速成熟的時候，這些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這無疑是使中國共產黨自己孤立了自己。

3. 在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上，博古的覺醒比周恩來、毛澤東、張國壽等都晚。到 1932 年還恪守共產國際提出的「城市中心論」，積極推行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和奪取中心城市的「進攻路線」，認為農村暴動和建立農村根據地，只能作為城市起義的配合力量。把「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作為黨在目前的總任務。直到 1933 年進入中央蘇區後，隨著實踐範圍的擴大和日益深入實際鬥爭中，才使博古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有了新認識，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做出了符合中國革命需要的新政策，使紅軍得到了發展，農村工作得到了支持。

軍事路線上的錯誤表現在五個地方

1. 錯誤地分析形勢。反四次「圍剿」後，主要軍事領導人都認為下一次「圍剿」最少也要半年後，所以把一方面軍主力分為兩部，組成東方軍出擊閩贛新根據地。不料蔣介石三個月後即發動百萬人的進攻，紅軍急忙收防，喪失了「以逸待勞」的先機。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

2. 失去抓住「福建事變」的良機。博古本來贊同與福建政府聯合，得知共產國際不同意，又放棄了正確的主張。

3. 面對優勢敵人步步為營的進攻，沒有採納彭德懷、毛澤東跳出去外線作戰的建議，而支持李德「集中對集中，碉堡對碉堡」的內線陣地戰和「短線出擊」的戰術。死打硬

⑦ 細節可參看以後各章。

拼，傷亡慘重。

4. 廣昌失守，敵人六路向蘇區腹地進犯，博古支持周恩來提出的「全線抵禦，分兵把口」。這時為贏得大轉移的時間，已無更多良策了。

5. 戰略大轉移決策是正確的，準備也還充分。但博古又接受毛澤東、張聞天的要求，把機關人員編為兩個縱隊（兩頂轎子），結果由於這兩頂轎子的拖累，在湘江之戰大敗。被批評為「大搬家」，「避戰」。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張聞天把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總結為「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博古不會打仗，他其實沒有什麼自己的軍事路線。博古剛到蘇區時恰逢第四次反「圍剿」，他放任讓周恩來、朱德指揮，打了大勝仗。第五次反「圍剿」，李德到達蘇區，博古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偏聽偏信，並縱容他掌握軍權，導至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在遵義會議上他們矛頭對著李德，一定要把李德拉下臺。博古是後臺，自然難辭其責。

其實，博古最大的錯誤和失敗就在於自己不會打仗，又沒有虛心請教國內有經驗的同志，反而偏信一個剛到蘇區的「洋」顧問，把他視為共產國際代表，結果未能打破第五次反「圍剿」，丟失了中央蘇區。直到黎平會議才改變對李德的支持，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正如周恩來對博古說的「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博古後來主動下臺，並做了深刻檢討，他一生都為他的錯誤感到慚愧和痛心。」

比較而言，他在政治路線的錯誤還是屬於第二位的。博古在位時共產國際的紀律約束，對蘇聯的高度崇拜及封閉的戰爭環境都影響他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和對形勢的判斷，這當然只是客觀原因，他對「九一八」之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

遲遲沒有認識，固執的堅持「關門主義」左傾政策。說明他主觀思想方法也有問題，難怪延安整風時毛澤東要狠批他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他對此也做了深刻檢查。

「左傾」，「教條」在中共歷史上曾多次反復發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

建國後到文化大革命，我們是「左」的不能再「左」了。改革開放 30 年了，有誰又能保證在中國大地上不會再出現「左傾」呢，所以有必要全面地總結其產生原因。借路線錯誤而全盤否定博古的工作有欠公允。

第三章

第四次反「圍剿」後的形勢估計

九月軍事會議

黎川失守

十月中旬軍委擴大會議

福建事件

前敵會議

四人會議

筠門嶺失守

廣昌保衛戰

六路分兵拒敵

第五次反「圍剿」，是從1933年9月開始，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跳出包圍圈，進行戰略大轉移為止，歷時13個月。

廣昌戰役是從1934年4月10日到4月28日，廣昌失守為止，歷時18天。

這場會議上對「廣昌戰役」在時間上，有二個概念。一個是「18天」的概念，於是堅強對堅強，和敵人拼消耗的陣地戰，是錯誤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丟失了廣昌。使中央蘇區失去了「北大門」，從而失去了整個中央蘇區。毛澤東和張聞天持這種概念。

另一個是「230天」的概念，從1933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1934年4月28日，廣昌失守，共230天。博古持這種概念。就是說「廣昌失守」，不僅僅是由於採用李德提出的「堅強對堅強，集中對集中」的防守戰術失敗而造成的，它還是在廣昌戰役前的一些失誤和失敗，積累起來的必然結果。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央召開過多次軍事會議討論反「圍剿」的戰略戰術，瞭解這些會議及其他重大事件的情況，有助於全面瞭解第五次反「圍剿」的全過程。

第四次反「圍剿」後的形勢估計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當時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朱德等，都認為敵人幾十萬大軍要發動一次新的「圍剿」，在交通不便的江西省，補給工作需要一段時

間。第三次「圍剿」到第四次「圍剿」，間隔時間是一年零四個月，因此估計蔣介石要發動第五次「圍剿」，最快也得在1933年底，或1934年春天。所以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裡，紅軍應該出去開闢一些新的根據地，同時也給自己搞些「補給」。這種認識在高中層軍隊幹部裡也很普遍。這時候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也有同感，來電稱：「蔣介石與閩粵敵人有矛盾，而在中央根據地北部應採取守勢，不易出擊，所以要求一方面軍主力分成兩部分作戰」。於是決定把一方面軍主力分為二路，一、五軍團留在原地，監視北路敵人，而以二軍團為主，加上駐閩贛省的紅七軍團，和駐福建省的十四師，組成東方軍，向閩中出擊。計劃經清流、寧化地區，折向北，攻佔將樂、邵武，然後進贛東北資溪、金溪。再返回，經硝石、黎川，與在泰寧的方面軍總部會合。但進軍至將樂、順昌一線時，與國民黨駐閩的十九路軍區壽年、毛維壽部膠著，久攻不下。

1933年9月，也就是博古到達中央蘇區五個多月，李德到中央蘇區才十幾天。蔣介石調集一百萬大軍，一千五百門大炮，五百架飛機，兵分四路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東路是蔣鼎文，南路是陳濟堂，西路是何鍵，北路是顧祝同。蔣介石聘請了一位軍事顧問，是曾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的退休一級上將馮·塞克特，是有名的堡壘戰術專家。他給蔣介石出主意實施堡壘戰。所謂「堡壘戰」，就是「穩紮穩打、廣築碉堡、步步為營、四面圍困、逐步收緊」20個字。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戰略，企圖對蘇區構成一個滴水不漏的大包圍圈，斷絕中央蘇區的物資來源，造成民心恐慌，部隊沒有給養，並且不斷收縮包圍圈，迫使紅軍最後決戰，以期達到消滅紅軍，摧毀中央蘇區根據地的目的。敵人有句宣傳口號，叫囂「抽乾塘裡水，活捉塘裡魚」。

正是由於對形勢的分析錯誤，沒料到蔣介石在9月份就

發動「圍剿」，而這時候紅軍主力的一半仍在閩中，蔣介石的主攻方向又放在北線，使得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

開始時，兵力分佈就處在十分不利的位置。急忙調兵回防北線，又使得部隊在戰前沒有得到充分休息，不能做到「以逸待勞」。

這是第五次反「圍剿」前的形勢估計錯誤，對反「圍剿」造成了「先天不足」的影響。

九月軍事會議

面對蔣介石四面圍攻的嚴峻形勢，中央軍委（負責確定軍事路線、行動方針，做出戰略決策，調動部隊和作戰指揮）主席周恩來，9月22日在建寧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軍委顧問（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又名華夫或李德），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中央紅軍副總司令兼紅軍二軍團長彭德懷，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紅一軍團長林彪，紅一軍黨政委聶榮臻，代理中革軍委副主席項英，中央軍委武裝動員部部長滕代遠。中央核心組成員博古、張聞天列席了會議。會議集中討論了第五次反「圍剿」怎麼打，在戰略上做出決策。

會上兩種意見爭論激烈。一種意見以彭德懷為代表，主張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從敵人北路和東路的結合部黎川突圍，跳出包圍圈，到贛東北同方志敏的紅十軍會合，在閩浙贛三省交界的武夷山一帶潛伏，等待時機，一可以威脅江浙、安徽和南京；二可以伺機出擊，從背後攻金溪，金溪是顧祝同左翼羅卓英的補給站，如果偷襲成功，則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也就告吹。守衛金溪的是湯恩伯部一個師，吃掉這個師，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就元氣大傷。只是主力撤離後，留在蘇區的七、九軍團和政府部門的地方部隊，擔子太

重，要吃大苦、耐大勞，和敵人周旋會有大的犧牲。當年毛澤東留下紅軍守井岡山時的困難情景，仍歷歷在目，所以首先要做好留守部隊的思想工作，還要安排好退路。

另一種意見，是以剛到蘇區不久，但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馮·塞克特的戰略戰術有充分瞭解的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為代表，主張「防守反擊」，深挖溝、築碉堡，以防為主，輔之以「短促突擊」，對準敵人進攻的薄弱環節，集中兵力發起突然襲擊，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挫敗「圍剿」。雖然李德對馮·塞克特的戰略做了深入剖析，指出了它的弱點，讓人信服。可是這種「防守反擊」的戰術，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作後盾，這是明顯的拼消耗，紅軍是拼不起的，所以這是下策。

在會議即將結束前，毛澤東送來了急件，已不在軍事領導崗位上的毛澤東提出了他的意見，總的精神是牽著敵人的鼻子跑，「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主力紅軍一、三、五軍團，從興國突圍，攻萬安，因為顧祝同的部隊裝備好，火力猛，難以攻克，而萬安守敵是湘軍一個師，相對而言比較弱，可以拿下。然後進寧岡，與紅六軍團會合，越過羅霄山中段進湖南，攻茶陵、攸縣，跨過粵漢鐵路，進衡山西麓的白果一帶潛伏。如果蔣介石仍圍著蘇區不追，我們就攻永峰（今雙峰市）、攻寶慶，敲山震虎，蔣介石「圍剿」的目的，就是想消滅紅軍主力，發現紅軍主力不在了，必定撤圍來追，我們就沿陽明山南下，取善祥，攻冷水鋪，從毛俊進南嶺，回到贛南。這一圈把敵人拖得人疲馬乏，士氣低落，無心再戰，蔣介石只得鳴金收兵。

這時李德拿出了軍委參謀部的「敵情報告」，何鍵在興國到萬安，萬安到寧岡，以及茶陵和攸縣之間，共修築了二道防線，碉堡林立，動用了六個師和二個獨立團，總兵力二萬餘人，因此過羅霄山中段，成功的可能性極小。同時顧祝同的右翼，劉興的四個師又一個旅，配置於吉水、永豐、

樂安、宜黃一線，戰鬥一打響，如不能速戰速決，劉興包抄過來，我軍無退路，弄得不好會全軍覆沒，所以這個意見行不通。至於打金溪，「敵情報告」明確提到羅卓英、湯恩伯的六個師，在主攻方向的黎川、邵式有四個師，在金溪、資溪各一個師，還有一點必需注意到，在金溪和資溪成三角形的黃獅，羅卓英還放著二個預備旅，這三點總兵達二萬餘人，所以不可輕敵，攻金溪的成功率很小，很難解蘇區之圍。

三個意見都非良策，但有一點是一致意見，即黎川是中央蘇區連通贛東北的咽喉，絕不能丟失，必須立即把原駐防黎川的紅七軍團，從東方軍中撤回，加上駐守硝石的獨立師，共二萬餘人，另閩贛省（省會黎川）約有二、三百人的地方武裝，城裡還有一個百餘人的教導隊，全部動員起來，保衛黎川。

會議通過了兩項人事安排，一項增補博古為中央軍委委員，一項任命項英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中革軍委負責籌集糧草、徵兵擴紅、財務開支、軍械裝備、軍地聯絡等事項）。因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紅軍總司令，身在前方，所以軍委日常工作交由項英負責。

會議再沒有新的意見，周恩來見博古沉思不語，自己對二個方案也難下最後決心，只好休會，會議無果而終。

會後，諸將返回駐地，朱德回總司令部所在地泰寧。博古、李德前往廣昌，指導部隊構築防禦工事。周恩來獨自一人回到瑞金，他深感自己在軍事指揮上急需一個幫手，一個支持自己下決心的人，但這人不是李德，而是毛澤東。他決心要想辦法把毛澤東解脫出來。

這次會議給第五次反「圍剿」的前景蒙上了陰影，參加會議的中央軍委委員們也都心事重重，會議沒有得出明確的退敵策略。

黎川失守

9月初，有跡象表明敵人在黎川以北的撫河、硝石一帶集結。朱德命令肖勁光（閩贛軍區司令員兼紅七軍團政委）立即回黎川掌握敵情，調動部隊。肖在前線即與毛澤東通了電話，毛認為應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一帶，同時東方軍隨即回師，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帶著毛澤東的意見，9月21日肖勁光路經泰寧，在方面軍總部見到朱德和周恩來，肖向朱和周講了毛澤東的戰略方案。朱、周認為毛澤東的方案是建立在「誘敵深入」基礎上的，現在蔣介石已經吸取了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聽取了德國軍事顧問馮·塞克特的意見，採取「步步為營」的戰略，不大可能再貿然深入。李德說：「馮·塞克特是1919年4月鎮壓慕尼黑工人起義的刽子手，為了保衛成立了20天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我和他對壘了20天。所以我對他的戰略戰術有一定瞭解。我敢斷定他是不會中計的。因此『誘敵深入』落空的可能性極大，這樣我們反而賠了黎川」。

肖勁光聽了朱、周、李的看法，又建議：「黎川可能再成為敵人首先要攻擊的目標，不如把黎川作為誘餌，留少量部隊守城，把主力部隊集結在黎川北面和東面的硝石、光澤、資溪一帶，從側面打擊進攻黎川的敵軍，不要單純死守黎川」。

周恩來原則上同意這個方案，但明確告訴肖勁光在紅七軍團沒有趕回來前，現有的部隊獨立師和軍區教導隊、地方武裝，都應收縮回來，防守黎川。

9月24日周恩來致電博古，並電告東方軍：「北線敵情已日益嚴重，必須迅速結束在東方的戰鬥，否則將會失去剪除敵左翼良機，坐視其搶先集中撫河」（即撫州，也稱臨川）。25日，他再次發電：「東方軍必須最大限度集結兵

力，以最大機動求得勝利的結束東方戰鬥，不為堅城所擊，不為強敵所滯，以便能在運動中殲敵一部，趕早北上」。

此時前線，十九路軍正在和我軍接觸，戰事處於休戰狀態，彭德懷接周恩來電令後，立即下令紅七軍團火速返回黎川。

1933年9月24日紅七軍團在將樂集結，夜裡出發，趕到黎川最快得四天半路程，也就是說29日上午能趕到。

可惜的是肖勁光回到黎川後，沒有按周恩來、朱德的囑咐去做，而是認為敵人不可能來得這麼快。肖勁光沒有立即加強城防，也沒有把獨立師收縮回來，一心只等紅七軍團趕回來，把部隊潛伏在光澤、資溪一線等敵軍來進攻黎川時，打一個漂亮的伏擊戰。

9月26日，閩贛省委、省蘇維埃接毛澤東電話，奉命撤出黎川城，省委書記顧作霖、省蘇維埃主席邵式平，對肖勁光提出忠告，要肖立即把獨立師收縮回黎川。肖回答說：戰爭的勝負在於殺傷敵人的有生力量，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我自有安排，讓敵人在黎川付出沉重代價。

9月28日下午，國民黨陳誠用兩個師包圍硝石，圍而不攻，用兩個師向黎川發動猛攻，動用了上百門大炮，幾十架飛機，一陣猛炸之後，肖勁光率70餘人的教導隊和地方武裝百餘人，棄城而逃。使敵人輕而易舉地搶先佔領了黎川。29日黎明，紅七軍團先頭部隊趕到，在城外與敵人接火，而陳誠的另兩個師已於29日晚攻佔了硝石（獨立師奉命撤出），接著反包圍過來，於是紅七軍團只得撤圍，退回廣昌。

如果肖勁光能夠遵照周恩來、朱德的指示，把獨立師收縮回來，堅守十四、五個小時，紅七軍團就能趕到，情況可能大不一樣。

由於黎川失守，隔斷了中央蘇區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聯繫，也使廣昌失去了屏障，使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開始，就陷入不利的作戰境地。

十月中旬軍委擴大會議

黎平失守後，軍心不穩。這時東路包圍蘇區的國民黨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舉旗反蔣，成立了福建革命政府，派人和紅軍構和，聯手反蔣，面對這兩個情況如何應對？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與中央負責人博古聯繫後，決定1933年10月15日在瑞金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俗稱十月軍事會議），這是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的第一次軍事決策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曾參加9月軍事會議的全體軍委委員和上次因故沒有到的軍委委員閩贛軍區兼福建軍區司令員葉劍英，此外還有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七軍團政委肖勁光、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以及蘇區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江西省主席曾山、福建省主席張鼎承、閩贛省主席邵式平，毛澤東辦公室主任李卓然。

由於東路包圍蘇區的部隊是由二部分組成，主力是蔣介石嫡系蔣鼐文部共六個師，它緊靠北路左翼羅卓英部隊，沿伸到建陽、建甌、南平，司令部設在浙江的慶元。另一部分是福建地方政府的部隊，也即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負責從將樂、順昌、二明、永安、龍岩到永定包圍蘇區。一北一南，現在福建政府舉旗反蔣，要求抗日，蔣介石就組織「討伐軍」來鎮壓，以蔣鼐文部為主力，從羅卓英部抽二個師為輔，共八個師（十萬人）向福州進擊。

據報：「討伐軍」主力蔣鼐文部已在慶元一帶集結，將由浙入閩；羅卓英部從資溪抽一個師，從硝石抽一個師，將由資溪、光澤入閩。

會上出現二種意見，第一種以朱德為代表，主張「擾敵後方、攻敵側翼」。命贛東北的劉疇西（紅十軍軍長）、曾洪易（閩浙贛獨立師師長）、尋淮州（七軍團軍團長）三人抽兵截敵人的運輸供給，開展游擊戰擾亂其後方，再以紅七

軍團截擊由資溪、光澤入閩的敵行動部隊，以一、五軍團俱擊由浙入閩的敵主力部隊。

第二種意見，以毛澤東、彭德懷為代表，主張「打黎川」。趁陳誠的一個師抽調去「討伐」，「閩變」之際，此時不收復黎川，更等何時？收復黎川，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借此良機，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轉入外線，留七軍團守黎川，主力部隊可以乘勢佔資溪，攻金溪，或東進，打「討伐軍」的後屁股，支持十九路軍。

第三種意見，以林彪、李德為代表，主張「趁機擴充蘇區地盤，圍魏救趙，支援十九路軍」。他們認為，蔣介石的「討伐軍」有八萬人，十九路軍有五萬多人，「虎相爭，勝負一時難見分曉」，蔣介石至少得用半年時間才能平息「閩變」，如果兩敗俱傷，則第五次「圍剿」也難以為繼了。所以，我們必須趁「東線無戰事」之機，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軟肋，這個軟肋是贛軍。我們去「打永豐」，然後和在安福、永新的紅六軍團會師，再西出湘東，東圍吉安，使湘東、贛西、贛東、閩西、粵北連成一片，使蔣介石「圍蘇伐閩」兩頭顧不過來，十九路軍之危也就解了。

對這三種意見，項英認為，玉階兄的意見還動大，但效果不大，蔣軍不會因遭到騷擾和側擊而停止前進。潤之和德懷的意見關鍵在於收復黎川，打通與贛東北的通道。華夫和林彪的意見，在跳不出去的情況下，也不失是個辦法，可以作為潤之、德懷意見的補充。軍委委員博古同意項英的看法。於是軍委主席周恩來做出決定，收復黎川，再攻永豐。

1933年11月15日，朱德總司令根據軍事會議的決定，下令紅二軍團和紅七軍團（共五個師）收復黎川。肖勁光率領紅七軍團，配合主力紅一軍團在滸灣與敵激戰，但因敵人利用堡壘群、迫擊炮、輕重機槍，拼死堅守和不斷小股出擊，且有飛機配合，紅軍傷亡大。21日敵人兩個獨立旅上

來增援，22日我軍撤出戰鬥。

未能收復黎川，去贛東北的希望落空，於是前敵指揮部請示朱德、周恩來後，決定按會議決議，攻永豐。



1937年在延安，右起：博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

1933年12月13日，由一、二軍團組成的「西方軍」出發去進攻永豐，12月22日戰鬥打響，敵人利用交叉碉堡群頑抗，加上壕溝和鐵絲網封鎖，飛機輪番掃射，直到1934年元月5日仍無進展，而敵人增援部隊已全線壓上，總部決定停止進攻，部隊撤圍。

紅軍許嵩戰鬥無功而返，去贛東北進行外線作戰已不可能，失望、憤恨籠罩著一方面軍總部。周恩來下令撤銷當初放棄黎川、棄城而逃的肖勁光職務，調到前指駐地建寧審查。11月23日晚，方面軍政治部在建寧召開黨的幹部大會，批判肖勁光的右傾逃跑主義，接著方面軍政治刊物《鐵拳》，發表了王稼祥的《反對肖勁光本位主義》的文章，針對肖勁光死抱著毛澤東的意見不放，提出了肖勁光是「紅軍

中的羅明路線的最典型代表」。1934年1月6日上午，中央局在瑞金組成了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對肖勁光提出公訴，審判結果，開除肖勁光黨籍、軍籍，判處五年徒刑。

入轉移前夕肖勁光被解除監禁，到紅軍大學當教員，並隨校行動。遵義會議後，為阻擊敵人追擊，經羅炳輝批准，肖勁光率一連人堅守婁山關，將敵人阻擊在關前，整整守了一夜，打了一個漂亮的「阻擊戰」。第二天晚上，周恩來宣佈恢復肖勁光黨籍、軍籍。之後不久，周任命肖勁光擔任紅三軍團參謀長。

福建事件

1933年夏，曾在松滬抗戰中，領導十九路軍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兼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圍困紅軍，任贛粵閩邊區「圍剿」軍第四路軍司令。蔣光鼐對蔣介石「不打日本，專打紅軍」的投降政策極為不滿，對十九路軍在松滬的抗日行動，不但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嘉獎，反而受貶，深感不平。1933年9月，在原領導李濟深、陳銘樞的鼓動下，^① 在軍長蔡廷鍇的支持下，

^① 十九路軍的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部的第十師，後被蔣介石昇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抗擊日寇，寫下了歷史上有名的「一二八松滬抗戰」，但反受蔣介石的訓斥，總指揮陳銘樞被迫離職回國，由蔣光鼐繼任總指揮兼京滬衛戍司令。之後，部隊又被調往福建「剿共」，蔣光鼐被任命為「贛粵閩邊區圍剿軍」第四路軍司令，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後又任福建省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但十九路軍將士對蔣介石出賣上海「松滬抗戰」的投降政策，十分不滿。1933年日本佔領山海關、熱河，更加激起全體官兵的義憤，向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提出了「反對內戰，要求抗日」的請願。1933年5月，陳銘樞回國，在福州召集十九路軍將領開會，共商反蔣對策，決定聯合紅軍，反蔣抗日。

決定「反蔣抗日」，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先派人和紅軍構和，形成「聯共反蔣」的形勢。

9月22日，十九路軍派陳公培秘密前來延平（即今南平）前線，會見彭德懷，提出「停戰合作、反蔣抗日」的意向，要求進行高層會談。

彭德懷立即向中央報告，並命紅二車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與陳公培舉行會談。博古接到彭報告後，非常高興，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應當抓住這個機會，利用這個有利因素，擊敗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於是同周恩來、項英等商議後，復電彭德懷同意十九路軍派代表來瑞金會談。

9月24日，十九路軍派總部秘書長徐名鴻為全權代表，由陳公培陪同前來瑞金，博古派潘漢年為全權代表，與徐名鴻會談，博古指示：「我們不但在道義上，而且在軍事上要給十九路軍直接的支持」。至此，雙方在前線的戰事進入休戰狀態。

10月2日，雙方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協定內容有：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劃定軍事疆界、恢復商品貿易、發表反蔣宣言等。協定的草簽，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與十九路軍合作關係正式形成，它解除了敵人在中央蘇區東面對紅軍的威脅，使紅軍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對付北面的敵人。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通電反蔣，22日成立了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蔣介石得知「閩變」後，氣沖鬥牛，立即召開軍政會議，抽調十萬人，由蔣鼎文統率，興師討伐十九路軍，蔣介石還親至建甌，坐鎮指揮。

面對這個情況，中央紅軍要不要出兵支援十九路軍，1933年12月3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前敵指揮部合併

後，召開了第一次軍事領導人會議。^② 各軍團軍事領導人參加了會議，討論出兵援閩問題。會上大部分將領都不贊成出兵支援十九路軍，朱德也反對和蔡廷錯合作。歸納起來，理由有二：一、蔡廷錯政治上一貫傾向「社會民主黨」，是頑固的反共派；二、蔡廷錯為人不可靠，是看風使舵的傢伙。南昌起義時，他率部參加，後編入朱德的第九軍，但在起義軍撤離南昌，南下途中走到進賢時，他突然脫離起義部隊，把他率領的原李濟深第四軍的第十師（後來蔣介石擴建為第十九路軍）帶往浙江，投奔了蔣介石。一下子拉走了第九軍的主要兵力，使第九軍解體，亦使起義部隊減少了四分之一的兵力，對南昌起義失敗負有很大責任。三、十九路軍下轄的第六十師，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中，都是蔣介石的反共主力軍，對蘇區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尤其是第三次反圍剿中，紅軍與蔡廷錯兼師長的六十師，在高興圩一仗中打得最為慘烈，激戰兩晝夜，雙方傷亡上千人，我軍十一師師長曾士峨壯烈犧牲，紅四軍有兩個師的彈藥幾乎打光。而蔡廷錯卻因「剿匪」有功，被晉昇為十九路軍副總指揮。

② 博古出任中央軍委委員後，就著手改革軍事領導體制。因為戰爭的勝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信息的快速掌握和調兵的時效，在當時通訊條件比較落後的情況下，博古為了從決策到行動，力求有高時效，在十月軍事會議後，同周恩來、朱德、劉伯承商議後，決定撤消紅軍（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把軍委總參謀部並入前敵指揮部。以往凡是只牽涉到某一個軍團的軍事行動時，首先是中央軍委做出決策，交由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執行，如果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軍團的聯合行動，則還需要設立一個前敵指揮部（如東方軍、西方軍等），由總部，將任務下達至「前指」，再由「前指」下達給軍團，比較煩瑣，時效差。所以博古提出了改革。由一個是軍委總參謀部掌握著敵情變化、戰場形勢，和全局形勢變化（評估）等，但它在瑞金，是中央軍委的一個部門，每天給中央領導提供報告，可是它更應該給前敵指揮員提供情報。而實際情況是前方急需的軍事情報，只能每天用發報機發短訊，這對一線指揮作戰不利，所以乾脆把總參謀部搬到前方，讓訊息來得更及時。

第四次「圍剿」時，蔣光鼐、蔡廷鍇又是左路主、副總指揮。他們欠紅軍的血債太多了，因此大多數軍事領導人，都對與蔣光鼐、蔡廷鍇合作不感興趣。

正在這時候，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曼弗里德，轉來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不同意支持福建政府，認為「李、陳、蔡、與蔣之間的鬥爭是屬軍閥內哄」，他們在反共的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時機，來加強自己在戰鬥中的地位。

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臨時中央對福建人民政府的態度，來了一個 180 度的轉變。12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表態，發表了《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竟說「第二黨比國民黨還壞，對民眾帶有更多的欺騙性，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在玩弄『欺騙民眾的煙幕彈與把戲』。」

這時候，博古的心情是矛盾的，從現實情況看，聯合十九路軍對反「圍剿」有利，但對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態度則是政治路線問題，從這個立場看十九路軍，就得認為「它是最危險的反革命派別而反對它」。

正在這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原來十九路軍參謀長范漢傑是個內奸，不斷將軍事行動計畫和佈防情況，密報給蔣介石，使得「討伐軍」連連得勝，勢如破竹，從 1934 年 1 月 3 日到 14 日，攻克延平、水口、古田，16 日攻克福州。消息傳來，黨中央和軍委領導大吃一驚，急忙商議，決定召回西方軍，留下一軍團守蘇區北大門廣昌，以三軍團為主組織東方軍第二次入閩，救援十九路軍，並給三軍團配備了一個炮兵營（有七門迫擊炮）。1月 23 日到達延平附近，1月 25 日攻克延平。但此時福建政府大勢已去，十九路軍戰事已成殘局。

1934 年 1 月 21 日，十九路軍將領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等率部四萬餘人相繼叛變，通電蔣介石「脫離人民政府，擁護中央」。不久，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陳銘

樞等人，也相繼逃離福建，十九路軍殘部退入廣東，被陳濟棠收編。至此歷時僅一個月的福建政府，就被蔣介石鎮壓下去，中央紅軍也失去了利用「福建事變」夾擊蔣軍的良機。

前敵會議

12月5日中共中央表態不支持「閩變」後，福建戰局的勝負已趨明朗，范漢傑的叛變更加快了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政府的垮臺。蔣介石為了鉗制紅軍入閩，下令羅卓英部回師北線，任羅為北路軍第三路副總指揮兼第五縱隊指揮官，率部直逼廣昌，使北線形勢驟然緊張。

12月28日，博古在廣昌前線紅軍前敵指揮部召開「前敵作戰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軍委軍事顧問李德，各軍團負責人，軍委總參謀部所屬各局負責人，以及中央核心組成員張聞天和中革軍委部分委員列席了會議。

由於打黎川失利，攻永豐失敗，跳出包圍圈去外線作戰已經無望，面對敵人的進攻，我軍怎麼辦？這次會議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第三次軍事決策會議，也是戰前會議。

會議開始前，博古領著大家到前沿師指揮所觀看戰場形勢，參加會議的人都親眼看到了：敵人每隔一、二華里便築一碉堡，每個碉堡能駐一個排的兵力，碉堡和碉堡之間有交通溝相連。有道路的地方還放著一長排鐵絲網鋪設的三角架，形成封鎖線。蔣介石這次「圍剿」，接受了過去「長驅直入」的教訓，採用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以靜制動，縱深配備，穩紮穩打，一五里一進，七八里一推，前進一步築一層碉堡，拉一道封鎖線，耐著性子，慢慢地緊縮包圍圈，把紅軍困在裡面，逼紅軍決戰。北線是蔣介石的主攻方向，將近一半的兵力放在北線，共投入28個師和六個旅，合計136

個團、八百門火炮和五百架飛機，連後勤總計40多萬兵力。

面對這個戰場形勢，參加會議的將領議論紛紛。衝出包圍圈，轉入外線，牽著敵人鼻子兜圈圈，或者找敵人的「軟屁股」打，說得好聽，但經過打黎川、永豐，參加過這一次戰役的將領們有著深刻的教訓，搖頭反對，異口同聲說，不實用。大家一致認為現在必需面對現實，立足在廣昌打。具體怎麼打法？歸納起來，有四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把敵人放進來打」。放到哪裡打？朱德意見放到城外打，廣昌到驛前一帶，其東南是武夷山的丘陵地帶，地形對我有利，如果敵人佔領了廣昌，再「乘勝追擊」，則攻擊目標必然是驛前，我們可以在比設埋伏，打它個措手不及。大家認為總司令的設想是好的，但敵人現在的戰術是背著烏龜殼打仗，不吃魚餌、不鑽套。如果敵人佔領了廣昌，不再前進，停下來修碉堡，我們豈不是白白丟了廣昌，賠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種意見：「把敵人放進廣昌城裡打」。中革軍委委員，時任國家保衛局科長的譚震林意見，只要魚餌下得大，敵人會上鉤的，現在敵人想佔領的就是廣昌，不如就把廣昌作魚餌，把敵人放進城裡打。和它打巷戰，它的重武器大部分就使不上勁了，我們可以機動靈活，各自為戰，採用各種方法消滅敵人。項英認為這個辦法，聽起來像有一定的殺傷力，但現實的情況是敵人兵力比我軍多十倍，甚至20倍，打廣昌必然是左右包抄合圍，如果我們留在城裡打巷戰，就會成為瓮中之鱉，它們不急於求戰，會慢慢消耗我們，所以這是死路一條，只有敵我雙方兵力懸殊不大，敵人巷戰拿不下這個城市時，這個辦法才管用。而且巷戰對這個城市的破壞大，老百姓也遭殃，所以放進城裡打巷戰是行不通的。大家同意項英的意見。

朱德補充說，是不是可以把主力埋伏在廣昌至驛前之間的丘陵地帶，打敵人兩翼包抄的部隊。李德認為敵人攻廣昌

必然全線壓上，左右兩翼的兵力不會少於一至二個師，勢必採取扇形推進，這樣未等合攏就會與我伏兵接火，形成全面開花的局面，這對處於弱勢的我軍極為不利，這個辦法也是行不通的。

第一種意見 「以牙還牙」，軍事顧問李德認為，廣昌不能丟，不能當誘餌，應該堅守。我們攻黎川、永豐都被碉堡所阻 現在我們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碉堡阻止敵人進攻。蔣介石用堡壘圍困我們，我們就用堡壘反圍困，這叫「堡壘對堡壘」，同時我們還可以趁夜色，趁戰鬥的間隙，趁敵人疲乏的時候，組織部隊突然襲擊他們，來一個「短促突擊」。這樣一方面擋住敵人的進攻，一方面找機會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二種戰術配合使用。蔣介石的目的是「拖延戰略」，把我們圍困得精疲力竭時，與我們決戰。我認為，與其晚決戰，不如早決戰，現在士氣、物資供給都比以後要好，就在廣昌和敵人決一高低，用「集中對集中」，如果廣昌這一役我們勝了，就可以乘勝收復黎川，打通贛東北之路，若敗了，我們也給紅軍贏得了「擴紅」、「籌糧」的時間。我這個辦法也是沒有好辦法的辦法，說是下策也行。

劉伯承不同意李德「早決戰」的想法，批評說：「革命不能搞一錘子買賣」。他建議大家把眼睛放開，不要局限於廣昌這一個地區，可以在東線或西線下魚餌，套住了就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只有吃掉敵人三、四個師，第五次反「圍剿」就會取得勝利。

第四種意見，「避實就虛，打吉安」，項英認為，北線敵人強，我們不宜和他硬拼，從全局看南線不吃緊，邊貿還在照常進行，陳濟堂對「圍剿」不感興趣，處於「出兵不出力」的狀態，只要守住筠門嶺，我們還有一條退路，但現在最好不要惹他。我同意伯承的意見，在東、西線找「軟肋」，東、西二相比，還是西面弱一點，何況湘贛邊還有紅

六軍團，任弼時六月去湘贛邊主事後，紅十七師和紅十八師最近都有活動，讓贛軍頭痛，我看可以研究一下，來個東西夾擊，攻吉安。眾將領聽後，面有難色，吉安不會比永豐好打。這時，周恩來誤解了他們的意思說，不要怕跑路麼，紅軍就是要發揮走路的特長。至於廣昌這仗怎麼打？我意見，由五、七軍團守廣昌，把一、二軍團隱蔽集結在蛇形排、頭陂一帶，等待戰機，九軍團做預備隊留守雩都，八軍團的組建工作請項英同志抓緊進行。各連隊的機槍班要學習對空射擊，各連、營、團都要自製一些土地雷和炸藥包，對付敵人的封鎖線和碉堡。

周恩來表態後，會議準備結束。可這時張聞天突然要發言。他說「我聽了半天，覺得不少同志發表的意見、建議確實是為黨的利益考慮的。唯獨李德的意見太脫離現實，是『空想主義』。『堡壘對堡壘』，蘇區這麼大，要建多少堡壘，勞民傷財。蔣介石有錢有人，他修得起，我們是窮人修不起。打陣地戰，硬碰硬，敵人兵多槍多子彈多，還有飛機大炮，我們是兵少槍少，子彈更少，沒有大炮飛機，只有幾挺機槍，拼不起。『短促突擊』，須知我們既無戰車又無久炮，就憑手榴彈和炸藥包，上刺刀去突擊，你考慮過傷亡沒有，紅軍是我們革命的本錢，人是最保貴的。你這個餽主意，我堅決反對」。張聞天的發言使會場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主持會議的博古連忙說：今天開會就是聽聽各方面的意見，有什麼意見，想法都可以說，但是不准扣帽子。洛甫同志，那就請你出個好主意，這個仗怎麼打？

張聞天回答說「在座的不是帶兵的將軍，就是管軍事的委員，怎麼打？該我問你們」。

李德脾氣急，和張聞天在會上爭吵起來，博古制止張聞天不要和國際代表爭吵，張不服，指責博古「你支持李德要和敵人硬拼，是不是？出這種餽主意根本不配當軍事顧問」。博古就說張聞天：「你現在的態度就是普列漢諾夫對 1905 年

俄國工人武裝暴動態度的翻版，是列寧批判過的『本來就不該拿起武器』之類的話」。

會議在不歡之中結束。

四人會議

這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言中一再評擊的一次會議。

1933年12月29日，博古、周恩來、朱德、李德四人，開軍事領導小組會，商議對昨天的「前敵會議」上，大家提出的意見，重新理一理，做出最後決定。

朱德認為在西線攻吉安，是打攻擊戰，代價太大，把一、三軍團抽走後，北線空虛，敵人會「長驅直入」，太冒險。

周恩來意見：還是在北線伺機，抓住機會，打它個措手不及，消滅敵軍一、二個師。從目前形勢看，東、南、西三線蔣介石可能暫時按兵不動，等待北線向南推進，因此我們還是在北線，等到敵軍向前推進時，抓機會吃掉它一塊。所以我意見把一、三軍團隱蔽集合在蛇形排、頭陂一帶，等待戰機。

李德 廣昌的西面是雩山，東面是武夷山，蔣介石要侵佔蘇區，廣昌是必爭之地。因此蔣介石必定會下大兵力從東、西兩面圍攻廣昌。我斷定蔣介石必須兵分兩路，西面這一路是陳誠、薛岳的18個師，從南城、南豐向南推進，目標是侵佔廣昌到武夷山之間的一片地帶。而吳村、頭陂、蛇形排和寧都的黃坡，都是必攻目標，伏兵頭陂、蛇形排豈不首當其衝，根本不存在迂迴到敵人右側，突然出擊，出奇制勝的可能性。相反，當敵人東路，羅卓英、湯恩伯的六個師又兩個旅從黎川南下，攻佔傅坊和廣昌到武夷山之間的地

帶，包抄廣昌，廣昌萬失守，則埋伏在頭陂、蛇形排的我軍主力，豈不成了瓮中之鱉。所以這樣伏兵不行。



1937年4月博古等中央領導人在機場迎接周恩來從杭州返回延安。左起：博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肖勁光。

李德與周恩來，你一言我一語，一個主張堅守，一個主張伏擊，各不相讓。周恩來認為運動戰是制敵的法寶，是經驗的運用。李德認為只有攻、防是戰爭的主體，游擊戰、運動戰只能是輔助形式，不能本末倒置。兩人越爭越激烈，別人誰都插不上嘴。

忽然李德說了一句：山溝裡的游擊戰、運動戰，不是馬列主義，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周恩來說：那你的「堡壘對堡壘」這是馬列主義，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了，不要大霸道了，別看不起山溝裡出來的人。像你這樣狂妄的人，我一年前就見識過了，最後還不是照樣送客。

博古聽了，覺得再爭下去，傷了大家感情。於是急忙做了一個總結發言：「好了，不要爭了，我們都是為著同一個目的，在這裡討論。面對強大的敵人，為了保住廣昌，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我發表一個意見，最後請朱德同志總結。為了保住廣昌，正面可以採用李德的意見，在廣昌北面修築一些碉堡和封鎖線，阻擊敵人的正面進攻，任務交給九軍團，一軍團防守廣昌西側，迎擊敵人右路的進攻，二軍團防守廣昌東側，迎擊敵人左路的進攻，同時在丘陵地帶隱蔽一部分部隊，在敵人進入之後，襲擊它的腰部，雖然是『短促突擊』，但要打狠打痛，消滅它一、二個師。」

朱德：「我沒有新的意見，就按博古說的辦吧。」

散會之後，朱德和李德留下，部署工作。博古和周恩來回瑞金，因為過年之後，中央要開五中全會，1月中、下旬要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還有一些事情要回瑞金處理。在路上，周恩來突然提出：現在方面軍總司令部已撤消，中央管軍事有你一人就夠了，以後軍事上的事，我暫時不參預了，後方的事我多管一些。這樣你主前，我管後，互相配合，你看怎樣。博古同意暫且這樣分工。

根據李德的提議，中央通知在南線、筠門嶺一帶也要構築碉堡，進入戰略防禦。

筠門嶺失守

筠門嶺是中央蘇區的南大門，也是中央蘇區的後門，地處贛粵閩三省的交會點。向東是閩西的武平、上杭，向西是贛南的安遠、信豐，再經上擾，便能與湘贛邊的蘇區聯絡上，向南是粵北的地方，由尋烏南下，經蕉嶺、梅州，便是周恩來二次進入的東江地區。所以筠門嶺是很重要的戰略要地。

特別是東江地區是周恩來首選的紅軍退路，因此他一直對守住筠門嶺很重視。

由於中央紅軍兵力不足，在總兵力九萬多人，接近十萬人中，主力部隊（野戰軍）只有四萬多人，其餘是地方部隊和地方武裝，他們都歸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省軍區管轄。守衛筠門嶺的部隊，就是粵贛省軍區的紅二十二師，師長何長工，政委方強，下轄三個團，分駐澄江、吉潭、尋烏和筠門嶺。此外，還有粵贛省下轄的雩都、會昌、西江、筠門嶺、尋烏、安遠、信康共七個縣的縣大隊武裝和中心區域游擊隊，總兵力約五、六千人。

廣東軍閥陳濟棠一向與蔣介石不和，曾三次通電反蔣，這次與十九路軍也暗中有聯絡。但陳處事狡詐，未起兵響應。見十九路軍兵敗後，他一面收編逃入粵東的十九路軍殘部，一方面封鎖粵閩邊界，有意要進攻贛南蘇區，表現給蔣看。但這些跡象並沒有引起坐鎮中央的周恩來的注意。3月初蔣鼎文的部隊已佔穩閩東、閩南之後，開始進逼閩西蘇區。這時陳濟棠下令屯兵南雄、定南、平遠的粵軍張枚新師、黃任寰師、黃質文師和駐梅州的張達師，向我南線推進。3月中旬先後佔領尋烏、安遠、信康等基本區域，迫使紅二十二師後撤，使筠門嶺的形勢驟然緊張，蘇區南大門受到嚴重威脅。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急忙到瑞金的沙洲壩，請毛澤東務必去一趟贛南，視察南線佈防，特意叮囑務必保住筠門嶺，給中央紅軍留一條退路。

1934年4月，毛澤東來到會昌，召開會議，聽取粵贛省省委書記劉曉、省主席鍾世斌、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省軍區政委方強的彙報。在如何防守筠門嶺的方案上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分兵把口，以守為主；第二種是以攻為守，分兵出擊安遠、尋烏、澄江一帶，破壞敵人構築的包圍圈，發動縣大隊、游擊隊不斷襲擊、騷擾敵人，搗毀封鎖線、碉堡

等，第三種是誘敵深入，利用地形，在運動中打一個殲滅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打通去粵東的道路。

參加會議的人，幾乎大多數是毛澤東在井崗山的老部下，而軍區政委方強更是毛澤東的忠實衛士，他擔任過保衛毛澤東的總前委特務大隊長、中央政府警衛營政委、警衛團政委等職，跟隨毛澤東多年。所以他們熟悉的戰略戰術，就是游擊戰、運動戰。因此，第一、第二兩種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方強提出的第三種方案得到了與會者的支持。

在會上，何長工還說：「領導上不從實際出發，在我調來粵贛軍區之前，他們命令部隊在筠門嶺一帶修了些碉堡，現在看來毫無用處。我來會昌之後，這裡沒有再修堡壘了。」何長工又說：「根據現在的敵我形勢，我認為還是應該搞老一套的戰法為好，打游擊戰，家家是堡壘，戶戶是哨所。再修那玩意兒沒有必要，在烏龜殼裡怎能打游擊，堡壘對堡壘，淨挨揍。」

毛澤東聽了，甚感稱心，他深有感觸的說：「是呀，目前形勢仍然是敵強我弱，敵大我小。什麼堡壘對堡壘、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消滅敵人還是要從實際出發嘛，不能再拼消耗了。」

接著毛澤東又用了三天時間，視察了右水至筠門嶺一帶的地形、地貌。4月9日他電話指示方強：你們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打游擊，鉗制敵人。在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一下，是什麼道理擋不住敵人？是什麼原因不能打勝仗？不能消滅敵人？……為了保存紅軍實力，你們仍然要採取游擊戰爭和游擊性的運動戰的打法。要詳細偵察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佈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要考慮幾個作戰方案，例如：敵人如一路來，我們不打他的頭，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是打它的尾巴；敵人如幾路來，就打他側面的一

路。總之，要絕對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的弱點……。

毛澤東在電話裡，不僅指示方強「把主力抽下來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打游擊，鉗制敵人」，更具體的指示：「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佈置戰場」，「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還教給方強具體的戰術。

方強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把師指揮部撤到李官山，把部隊撤下來整訓，再隱蔽起來，準備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擺下戰場狠狠地殲滅粵軍一部分，把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的包圍圈，在南線撕開一個大口子。

可惜的是粵軍沒有鑽進這個圈套，4月13日粵軍輕鬆地佔領了筠門嶺之後，就沒有再前進一步，而是在周邊修築碉堡，加固工事，好似陳濟棠參加第五次「圍剿」的軍事任務已經完成。

毛澤東在李官山住了20天之久，眼看敵人無動靜，南線無戰事，而北線廣昌丟失，形勢嚴峻，毛澤東便返回瑞金。

5月10日，周恩來下令，撤銷方強贛粵軍區政委兼紅二十二師政委職務，調瑞金接受批判，後送國家保衛局關押。大轉移前夕，1934年10月被釋放，任軍委幹部團總支書記。

筠門嶺失守，使蔣介石夢寐以求的「大包圍圈」合攏，使蔣介石「竭澤而漁」的戰略，開始收網。其實早在3月中旬，粵軍的意圖已昭然若揭，可惜毛澤東沒有把它當回事。

筠門嶺的失守，在心理上影響了整個戰局，對紅軍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壓力，使軍委總部領導和幹部，上上下下都感到採用運動戰取勝的希望已變得越來越渺茫了。

廣昌保衛戰

1934年4月初，北線形勢日趨緊張，博古和李德、朱

德在廣昌前線研究決定在廣昌西南官殿成立野戰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博古任政治委員，李德任軍事顧問。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共八個師，組成一個集團。東方集團、西方集團和廣昌支點守備軍，在廣昌及其周圍，全長40華里的戰線上，抗擊敵人。

1934年4月9日，陳誠、羅卓英以11個師的兵力，向廣昌推進。敵人兵分兩路，夾汝水河兩岸平頭而進。東路直撲傅坊，西路推向吳村，同時出動四、五十架飛機輪番轟炸、掃射，走了一批又來一批。在飛機的掩護下，敵人烏龜爬，一天只前進四、五十華里，跟在後面的工兵，接著就建築碉堡，實施蔣介石「步步為營」的戰略。

4月10日中午
敵人與第一道防線接火，戰鬥打得十分激烈，敵人出動了幾百門大炮，爆炸震得大地發抖，山岡上田野裡硝煙彌漫，遮天蔽日，但我們的迫擊炮也不示弱，發發命中敵人集群，打掉了許多處敵人的迫擊炮陣地，戰士們英勇頑強，機智靈敏，儘量節省子彈、手榴彈，巧妙地與敵人周旋，保存自己，殺傷敵人。

由於工事被敵人炮火損壞嚴重，白



1937年7月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赴廬山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後回到西安時的合影。

天打黑夜修，已無補於事，4月14日朱德下令退守第二道防線（預備線），又堅守了四天。

廣昌保衛戰總共打了18天。儘管紅軍浴血奮戰，李德還親臨一線指揮，並參加戰鬥，英勇異常，也確實給了敵人以重創。但我軍傷亡還是太大，事後清點紅軍共傷亡5590人，佔參戰兵力的六分之一。據情報，敵人傷亡約一萬五千人，佔參戰兵力的三分之一。雖然從絕對數字上比較，我軍傷亡比敵軍小，但是我們的本錢少，蘇區前後方總兵力才不到十萬人，傷亡近六千人，佔6%，而敵人是一百萬，傷亡一萬五千人，佔1.5%。所以這樣的拼消耗，我們實在拼不起。

李德最欣賞和敬佩的將領是彭德懷，英勇、機智、善戰、精於帶兵，為人耿直，不謀私利，不搞權術。但在廣昌保衛戰中，紅三軍團傷亡較大，達2700多人，李德心裡很難受。

4月27日夜，彭德懷和楊尚昆來找博古和李德，彭說：「廣昌是不能固守了，必須估計敵軍技術裝備。……在自己沒有飛機大炮的情況下，就算是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在今天敵軍的裝備下，是不能起作用的。如果繼續固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一萬二千人，將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

聽了彭德懷和楊尚昆的意見後，博古決定撤出廣昌，於是連夜發電報報告周恩來：「我軍遭受重大損失，廣昌已難繼續堅守。」

4月28日臨晨，周恩來復電指示：「在我主力受到較大損傷，而在廣昌支點直接作戰又無把握時，原則上同意放棄廣昌，但仍須以一部扼守廣昌，遲敵誘敵，抽一軍團秘密東移，突擊湯（恩伯）敵。」但此時一軍團東移已不可能，傅坊陷落，湯恩伯二個師已抵廣昌東郊。

4月28日傍晚，紅軍被迫撤離廣昌，轉移到貫橋、高虎塢。

六路分兵拒敵

5月上旬，彭德懷、楊尚昆指揮紅一軍團，在廣昌高虎塢，趁敵人立足未穩，來了個「短促突擊」，殲敵四千餘人，打了個勝仗。使敵人不敢輕視紅軍，不敢長驅直入，仍是烏龜爬，築碉堡，修封鎖線。

5月16日，東線建寧失守。

6月1日，東線邊城失守。

7月，蔣介石下令，六路齊向蘇區中心壓進，縮緊包圍圈。一路 陳誠第八縱隊周澤元六個師，由泰和向興國推進；二路 第六縱隊薛岳四個師，沿勝田、沙溪向古龍崗推進；三路 第三縱隊攀崧甫四個師和第十縱隊湯恩伯九個師，向寧都、石城一線推進；四路 第五縱隊霍揆彰部八個師，從廣昌向寧都推進，五路 東路軍蔣鼎文六個師，由連城向長汀推進，六路 南路軍陳濟棠部二個師，由筠門嶺向會昌、雩都推進。

合計蔣介石共投入40個師、六個預備旅（補充旅），連同炮兵、工兵、運輸兵、空軍和後勤保障部隊，總兵力為80萬人。

面對這個形勢，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戰略：「分兵把口，全線防禦」。全蘇區總動員，按敵人六路進攻的形勢，實行六路分兵拒敵。於是形成了「六路分兵」拒敵的局面。

一路拒敵：紅一軍團；

二路拒敵：紅九軍團；

三路拒敵：紅七軍團；

四路拒敵：紅三軍團；

五路拒敵：紅五軍團；

六路拒敵：紅二十二師和地方武裝。

總計投入作戰兵力為八萬人，同時在瑞金正在加快完成紅八軍團的組建工作，作為總預備隊。

在六路拒敵中，打得最激烈的是紅二軍團的驛前防守戰。9月，紅七軍團抽出北上抗日之後，拒敵任務也移交給了彭德懷的紅三軍團。

由於「六路分兵」，使中央紅軍進一步陷入了被動局面。直到10月初決定部隊向雩都、瑞金、會昌集中時，清點人數，得知六路拒敵中，中央紅軍共傷亡4570人。

8月31日，廣昌的驛前失陷；

9月4日，高興圩陷落；

10月10日，古龍崗陷落。

北線節節敗退，東線敵人已開始向根據地中心長汀的白衣嶺發動進攻；南部粵軍已經進抵會昌一帶。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佈《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群眾工作等的指令》；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社論，公開透露和暗示了紅軍主力即將實行戰略轉移的消息。

10月10日傍晚，中央紅軍開始了大轉移，目的是去和第二方面軍賀龍的部隊會合，創建新的中央根據地，重建中華蘇維埃政府。

留下項英、陳毅率領一萬六千餘人的紅軍，在贛粵閩邊界堅持鬥爭。

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最嚴重的錯誤是「廣昌保衛戰」和蘇區的「六路分兵」。雖然「堡壘對堡壘」、「集中對集中」是李德提出的，「六路分兵」是周恩來提出的，但是「最終決定權」掌握在博古手裡，因此最後負責任的理應是博古，在遵義會議上作檢討的也應該是博古，對這點博古是很清楚的，而且也這樣做了。

第四章

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大轉移
說服毛澤東同意大轉移
大轉移的準備工作
中央在蘇區的最後一次會議
毛澤東要留在蘇區
毛、張給大轉移留下兩頂「轎子」
長征開始，突破三道封鎖線
湘江之戰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這次大轉移的組織者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從而順利地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三道封鎖線。在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遭到慘重損失。按周恩來的說法，「過湘江庾部隊遭受重大傷亡，歸根到底是不該帶那麼多笨重的東西，而且在接到中央三次命令後，還捨不得丟棄，加上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兩個縱隊走不動路，拖了全軍的後腿，拖延了過江時間，造成了不應該有的重大傷亡。在這上面，毛澤東和張聞天是應負主要責任的，他們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後來的歷史開口不提「抬兩頂轎子」的生靈是毛澤東逼的，一切責任全算在錯誤的軍事路線上。

湘江之戰，雖然紅軍遭到很大損失，但客觀上也產生了兩面積極因素：第一、慘重的失敗教訓了紅軍及其領導，意識到錯誤的軍事路線必須糾正，他們迫切要未能指揮打勝仗的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崗位。第二、湘江之戰徹底打碎了「兩頂轎子」的包袱，紅軍又變成輕裝、能戰鬥的野戰軍。這為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執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大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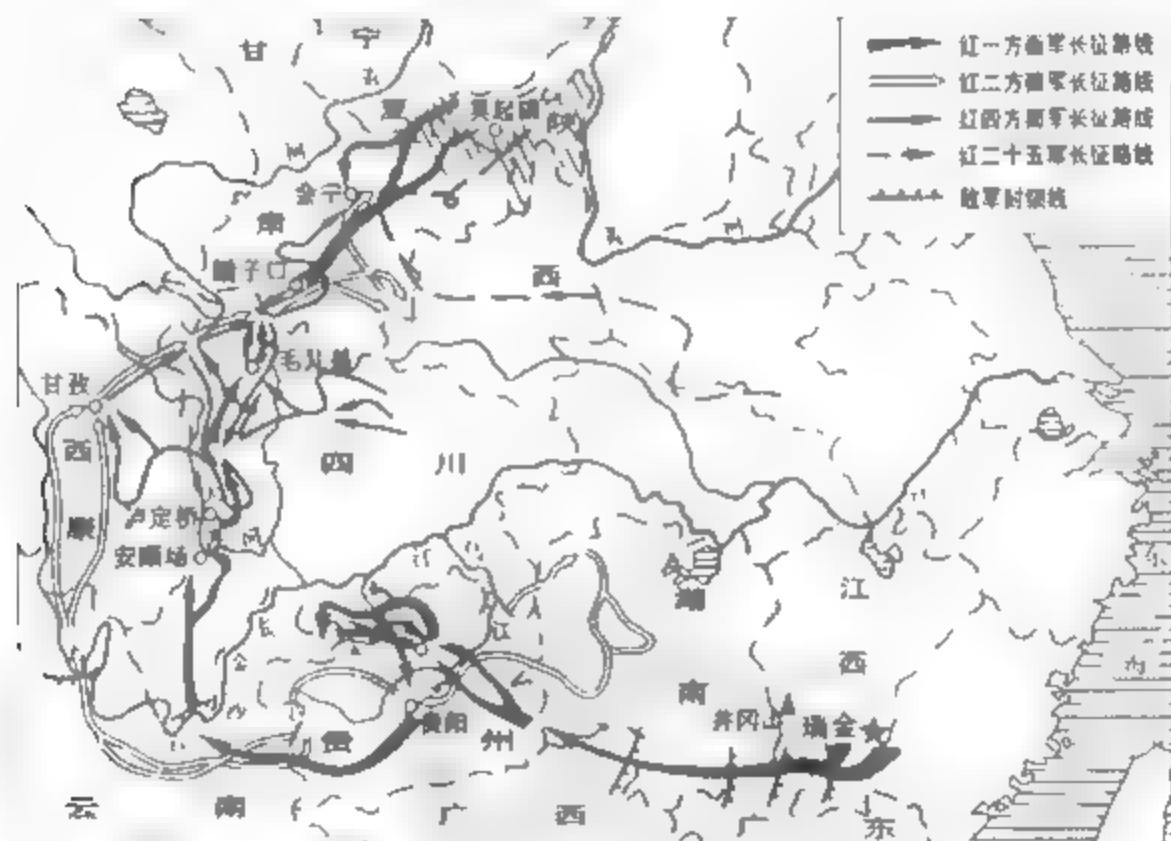
1934年4月28日，中央紅軍被迫撤離廣昌。

4月30日，博古從前方回到瑞金，立即通知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是在夜裡開的。會議一開始，博古先彙報了廣昌失守的全過程，然後博古說：「廣昌之戰清楚地說明

了，敵人在兵力上、武器彈藥裝備上都佔絕對優勢，還有飛機助戰，特別是大炮的威力，使我們搶時間建築的碉堡不堪一擊，李德的「堡壘對堡壘」成了畫餅充飢。蔣介石在戰略上採取步步為營，四面收縮，它的宣傳口號就是，「抽乾池塘的水，活捉池塘的魚」。現在紅軍傷病員與日俱增，根據地彈藥、物資、藥品、食鹽、燈油等都得不到補充，患瘧疾的人越來越多，但奎寧奇缺，怎麼辦。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及早突圍。」

周恩來、張聞天、項英都同意這個想法，但如何突圍？突圍向何處去？

博古說：在南線和西線，敵人的結合部信豐和南康之間，是敵人的薄弱環節，駐守信豐的是粵軍張枚新師，曾經噉過紅軍的鐵拳，可能記憶猶新，加上受陳濟棠消極「圍剿」態度的影響，這些日子一直防務鬆散，封鎖線形同虛



紅軍長征路圖

設。我們從這裡過，估計不會拼死攔阻我們。因此我初步設想從信豐一帶過贛江，進南嶺，沿南嶺攻汝城，進湘南。

到哪裡去，我主張到湘鄂西和紅三軍會師，在黔北、川東南、湘西和鄂西南，四省邊界上，依託武陵山，在武陵山西側開闢根據地。理由有四：第一是中央蘇區離蔣介石的巢穴江浙太近，離長江太近，離鐵路線太近。蔣介石調兵、運補給，速度快，兵源足，輕而易舉的就能集結幾十萬兵力和後勤供給。第一次「圍剿」是1930年11月，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對付江西革命根據地；時隔三個月，1931年3月調集20萬大軍，進攻中央蘇區，搞第二次「圍剿」；四個月後，1931年8月又出動30萬大軍，搞第三次「圍剿」，1932年下半年，才過了半年，又集中50萬兵力，開始第四次「圍剿」，先對鄂豫皖動刀，再回過頭來攻中央蘇區。從1933年1月開始，到3月21日，紅一方面軍殲陳誠的精銳主力部隊十一師止，歷時二個多月。可是間隔五個月後，1933年9月，蔣介石又調集了一百萬軍隊、一千五百門大炮、五百架飛機，來江西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由此可見，在蔣介石巢穴旁邊建立中央根據地，對紅軍很不利。既便我們取得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蔣介石還會有第六次、第七次……，兵力還會增加到一百萬以上。所以我們必須遠離蔣介石勢力鼎盛的江浙，到蔣介石力量相對薄弱的湘鄂川邊界地區，在那裡我們鬥爭的對象主要是地方軍閥和地方武裝，對付這些土匪武裝，我們是有能力取勝的，是能夠站穩腳根的。總之，我們要避開和蔣介石正面的短距離的交鋒，要看到中國的地理環境和交通現狀，及軍閥割據、相互爭鬥的事實，因此蔣介石不可能再集中幾十萬軍隊去遠征湘鄂川邊，搞第六次「圍剿」了，這樣我們就有了發展的機會。

理由二 現在能供我們選擇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四方面軍的川陝邊根據地，一個是賀龍的湘鄂川根據地。



1937年中共代表博古（中）八路軍代表葉劍英（左）
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處長李克農（右）在南京。

前者離我們遠，估計要走半年光景才能到達，後者離我們近些，但也要走三個月左右的路程。所以我選擇了湘鄂川根據地。去一個已經有群眾基礎的根據地，要比新開拓個地方負擔要輕得多，賀龍和紅三軍在湘鄂西一帶，群眾基礎好，有威望、有號召力，易於擴紅和籌糧，這樣就解決了我們兵源和吃飯問題，加上我們積極開展邊貿，生活會好起來的。

理由三：那裡背靠武陵山，跨黔湘川三省邊界和鄂西南，是開展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好地方，這就能發揮我軍之所長。特別是黔北很適合我們發展，貴州軍閥勢單力薄，名義上有一個軍的兵力，軍長王家烈是貴州主席兼國民黨二十五軍軍長，但他的實際能力，只能調自己的兩個師所轄的五個旅，共15個團。另外一個師轄三個旅，共九個團，指揮權在副軍長候之擔手裡。此外還有猶國才和蔣在珍各一個旅，每個旅只有兩個團，是獨立的，各自為政。這四個軍閥，矛盾重重，士兵都是雙槍兵（步槍加煙槍），各人割據一塊地盤，劃地為界，從不協作。黔北的中心城市是遵義，是候之擔的地盤，他的九個團根本管不了這麼大的地方，有的縣城連一個連的兵力都不足，因此給我們攻佔黔北創造了機會。我有個想法，中央紅軍和湘鄂川紅軍會師後，在適當的時機打通黔北，把它和湘鄂川連成一片，這樣根據地面積就大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將再建立起來。

理由四：賀龍為人正直，不搞陰謀詭計，不要政治手腕，沒有排外思想，組織觀念強，對中央尊重，沒有擁兵自重、佔山為王的領袖野心和軍閥習氣。這些優點，恩來同志很清楚，所以我們前去一定受到歡迎，今後中央與蘇區地方的關係，肯定會比現在好。

但是，去湘鄂西也有兩大困難，要大家齊心協力來共同克服。第一是路途遙遠，我們現在這麼龐大的中央和政府機關、人多物多，下屬單位多，必須下決心精減，年輕

的下連隊，年老的轉入地下，或疏散到有親屬的城市、農村去，小孩一定要轉走或託付給老百姓家代撫養。至於學校、醫院、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被服廠、修理廠、木材廠……，請人民委員會很快制定方案，做出安排。機器、設備該埋的埋起來，該毀棄的就毀棄，要分散隱蔽、化整為零，這件事請洛甫同志來辦，你是人民委員會主席，責無旁貸。

第二個困難，也是最大的難點，到湘鄂川去必須過湘江。一路上我們都是走山路，從南嶺到越城嶺，都比較隱蔽，可是過湘江就必然會暴露在敵人眼裡，所以過湘江是道難關。跨過湘江，轉移任務可以說成功了 80% 以上。再過沅江，經通道北上穿過苗族、侗族集居地，就到達湘鄂西了。現在摸不清敵人在湘江的防守力量，我想派一支部隊去打前站，偵察一下敵情。

書記處四個人商議後，一致同意去湘鄂川邊根據地。在態度上，項英最堅決擁護博古的主張；周恩來開始想退守東江地區，但最終還是贊成去湘鄂川邊；張聞天同意突圍轉移，但對去湘鄂川邊根據地好像一時拿不定主張，不過最後還是表態同意大家的看法。於是轉入討論派不派部隊去打前站，偵察敵情。派哪個部隊去，什麼時候動身。

研究結果，一致認為要派兩支部隊，一支由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敲鑼打鼓歡送，沿武夷山北上進入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與紅十軍會師後組成紅十軍團，給敵人一個紅軍要北上抗日的信息，用以掩蓋我們要西去湘鄂川的真實意圖。

一支由紅六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西征先遣隊」，從贛南「偃旗息鼓」，沿南嶺西行，過湘江，再北上與紅三軍會師後，組成紅二軍團。

這兩支部隊，立即進行出發前的準備工作，要嚴格保密，具體出發日期另行通知。

最後會議決定 一、立即向共產國際報告，請示批准。二、爭取在秋糧下來後立即轉移。三、要抓緊擴紅、組織第八軍團，還有近五個月的時間，抓緊疏散人員和籌糧工作。四、嚴格保密，絕對不准走漏一點風聲。五、派人去筠門嶺和信豐、南康一帶瞭解粵軍的動靜，請朱德同志給粵軍相識寫封信，爭取能與陳濟堂聯繫上。

說服毛澤東同意大轉移

1934年6月中旬，毛澤東得知政治局書記處做出決議，中央紅軍要轉移去湘鄂川之後，找到博古，表示他不同意中央書記處的這個決定，勸說博古中央紅軍要堅持留在中央蘇區不能走，理由是這塊根據地是蘇區軍民五年多艱辛創業建成的，大小戰鬥幾十次，犧牲了許多優秀的革命戰士和共產黨員，來之不易，現在撤離是背叛，是「右傾逃跑主義」。並說他當年率紅四軍一千六百人進贛南，現在老底子已犧牲了近千人，他不能對不起死去的烈士，既便你們要走，我和老部隊不走，你們怕和蔣介石正面交鋒，我不怕，我在這裡人熟地熟，不怕堡壘戰，決不右傾逃跑。……

博古問他，那用什麼辦法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呢？

毛澤東說，「辦法就是打圈圈」。他建議中央紅軍從會昌出發，經高排、渡挑江、取南康、崇義，越過羅霄山南段進入湖南，攻汝城、資興、來陽，跨過粵漢路，進陽陰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帶休整。這樣把圍困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引走，解蘇區之圍，同時找機會消滅尾追蔣軍的一部分，殺傷它的有生力量。然後，中央紅軍可以向南取嘉禾、宜章、南雄，返回中央蘇區。總之，用兜圈子的辦法，把敵人主力引開，化解敵人的圍剿。

博古，既然是兜圈子為什麼你總愛在湘中、湘南兜呢，兜來兜去總兜不出蔣介石的手掌心，總是在蔣介石中央軍的控制範圍內兜，為什麼不兜遠些，兜到湘鄂川，兜到黔北去呢，那樣就跳出了蔣介石的手掌心，中央紅軍就增加了自由度。原因就在於你捨不得離開你曾經為之付出心血的贛南閩西，在你思想深處總把贛南閩西看成是你的「私物」，其實即使你不在贛南，留在中央蘇區的部隊照樣可以和敵人打轉轉，兜圈子，保衛根據地的。這你就用不著擔心，大家都是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博古一面說，一面拿出一份電報來，潤之兄，這是四方面軍發來的電報，其中提到 他們在 1932 年 10 月初，衝出蔣介石的包圍圈後，越過平漢路，向西突圍，戰轉三千里，於 12 月初到達陝南邊，當時只剩下 萬四千人，但因為脫離了蔣介石的勢力範圍，面對的敵人換成了四川軍閥，經過一年半的戰鬥和創業，打敗了軍閥田頌堯、劉存厚、楊森、劉湘等，現在已發展壯大到四個軍，六、七萬人，開創了川陝根據地。這難道不是一個鮮明的佐證嗎。

毛澤東默然了。看來，最後一個，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指責去湘鄂川根據地是「右傾逃跑主義」的人，也被暫時說服了。

大轉移的準備工作

1934 年 7 月初，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於是，按既定方針，紅七軍團於 7 月 9 日，作為「中國工農革命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閩西北上，沿武夷山向閩浙贛邊界根據地進發了，7 月 11 日，紅六軍團作為「先遣隊」

離開湘贛邊界沿南嶺向湘鄂川邊界根據地前進，為中央紅軍大轉移探路。臨行時博古特意發電指示：一、嚴格保密，不得暴露行軍去向；二、沿南嶺到越城嶺務必走山路，盡可能避免和敵人發生大的戰鬥；三、過湘江後，立即給中央發電，隨時注意沿路敵情，有重大事件立刻報告。一般情況下，少發電報。

9月初，紅六軍團在廣西灌陽和文市一帶與湘敵十六師和桂敵十九師相遇，激戰四個小時，敵人潰逃。接著在全縣以南的界首地區，搶渡湘江淺灘成功。

當博古接到紅六軍團搶渡湘江成功電報後，立即把朱德、周恩來、洛甫、項英找到一起，博古說，紅六軍團從出發到過湘江，一共用了55天，路上沒有發生過特別大的戰鬥，只有過湘江前與湘軍、桂軍戰鬥了四個小時，湘軍和桂軍都是地方武裝，戰鬥力不強。我認為必須趁蔣介石尚未察覺之時，我們馬上行動。最近潘漢年去粵北活動，與粵軍高層有些接觸，我想派何長工去協助他，請朱德同志給陳濟棠寫封信，提議，雙方停止作戰行動，保持現狀，恢復貿易，居民往返自由……再給他一些甜頭，我們願意用黃金、大洋出高價，請粵方代購軍火……這樣力爭能比較和平地讓我們通過它在信豐與南康之間的防區。

過了這個粵軍防區，我們要急行軍，爭取在到達湘南前，不被蔣介石察覺，等蔣介石以為我們要在湘南或湘中建立根據地時，我們已經渡過瀟水，搶渡湘江了。所以這次大轉移的成功與否，關鍵就在於搶時間、爭速度了，我們要和蔣介石來個比賽，看誰能搶在時間的前面。

總之，誰先到達湘江，誰就勝利。為此：第一、一定要搶在蔣介石還弄不清我們的意圖前，進入湘南，等他明白過來，用最快速度能調動來的部隊也就是附近的桂軍和湘軍，加上一些地方雜牌軍，國民黨的中央軍頂多是顧祝同的三、五個師尾追，但得有二、三天的時間差距，所以我們取勝就

有把握。至於蔣介石的大部隊是不敢遠離華東地域的，這一點我們盡可放心。

第二、過湘江一定要快速，淺灘處可以涉水過去，倘若過湘江遇到阻擊，那也是地方武裝，湘軍和桂軍最快得一天到二天半，才能趕到，所以我們全部軍隊、文職人員、家屬、傷病員都必須在兩天內過完湘江。

綜合上述兩點意見，現在最重要的是做好大轉移的準備工作，包括：一、精減機關，把機關人員編到一線部隊裡去，年老體弱有病在身的，就地疏散、轉移到老百姓家裡安置；二、堅壁清野，把各工廠設備、醫院設備、凡是笨、大、重的東西，統統掩埋起來，重要的東西可以搬上武夷山找地方隱蔽起來，總之要做到輕裝行軍；三、徵集糧食，要保證部隊和行軍人員有一個半月的存糧，醫院傷病員隨軍行進的要有三個月的存糧。重傷病員要立刻分散寄養到老百姓家，留夠半年的乾糧。

大家統一思想，分頭去做大轉移的準備工作。但哪天轉移，博古不說，只叫大家抓緊準備好「待命」。事情悄悄地在進行，一切嚴格保密。

中央在蘇區的最後一次會議

1934年9月13日，博古接到潘漢年從會昌打來的電話說，已經把朱總司令的信送出去了，粵方答復近日將派代表來，與我方具體談判，地點在筠門嶺。博古說：只要粵方答應在協議中寫上：「可以互相借道」這一句話，其他條文可以不太計較。潘漢年說：我明白你的用意。讓博古放心，定辦好。

接完電話，博古決定召開中央政治局書記會議。9月14日，這是中央在蘇區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朱德和羅邁（李

羅漢，中央組織局長）列席了會議。

會議決定：

一、成立閩粵贛中央分局，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項英兼閩粵贛中央分局書記，及留守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原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地方部隊，統編為留守軍團），陳毅任中央政府閩粵贛辦事處主任（原中央政府所屬各部的留守人員，統編入辦事處）。

二、為了便於長途行軍作戰中的統一指揮，和集中領導、快速決策，決定成立「最高三人團」，由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大轉移的具體出發時間，由「二人團」決定。從9月15日起，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隱蔽地向雩都、瑞金、會昌集結。防務移交給留守軍團。參加大轉移的主力紅軍是紅一軍團、紅二軍團、紅五軍團、紅九軍團及新組建的紅八軍團，共五個軍團。



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

三、通過了中央組織局羅邁提出的，中央機關幹部和領導的去留安排原則及方案，並針對談話對象，做了具體分工……。會議責成羅邁負責將有關的決定，通知有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責成朱德負責將有關的決定通知有關的軍委委員、軍團負責人。

由於大轉移是帶有極端機密性的戰略軍事行動，涉及到突圍的成功，以及紅軍和大批人員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是要同敵人進行一場時間差的行軍比賽，它涉及到能否安全渡過湘江，順利到達湘鄂川，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命運的大事，必須保密，而且得十二萬分的保密，絕對不能讓敵人知道我軍的行蹤和行軍時間。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開更多人參加的會議，更不允許進行公開的動員。人有一張嘴，知道的人越多，傳得越快越廣，這是保守秘密的大忌。可是有人總認為沒有讓他參加會，心裡不舒服，不知道會上研究的情況，沒有讓他們參預決策等，說什麼「中央是倉促逃跑」。

毛澤東要留在蘇區

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接到項英連夜派警衛員送來的信，內稱：毛澤東離開了養病居住的雲石山古寺，於9月16日傍晚，秘密來到雩都，和正在集結待命的一軍團幹部頻繁接觸，還召開了二次座談會，天天找人談話到深夜，勞累過度病到了，發高燒不退，請中央派傅連璋……速來。

10月初，毛澤東病好後，突然派警衛員胡昌保和吳吉清兩人，連夜趕路送來一封信。信內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蘇區，和陳毅一道上山打游擊，中央機關裡的老人、孕婦、重傷病員以及不願意跟隨中央紅軍大轉移的人，都可以給他留下來，但他要把羅炳輝和九軍團的二十師留下，並說：軍團裡也有一些幹部戰士願意跟隨他留下來。請中央批准。信的結尾還做出保證，說二、一年後，中央蘇區和留下的紅軍都將以嶄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蘇區。

博古看完信，便找周恩來商議此事，周連連搖頭說：「不行，一是已經定了中央分局由項英主帥，現在要換毛澤

東，項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到許多人都要變動，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項英親自點名要的，現在重新調整，在時間上已不可能了。二是九軍團抽走二十師後，只剩下十四師，連軍團長羅炳輝也抽走，豈不是把這個軍團解體，成了一個獨立師啦，這個變動太大，牽涉整個大轉移的部署，不能這麼辦。我明天去找毛澤東談一談」。

而博古擔心的卻是留下毛澤東，他會不會故伎重演，佔山為王，到時候羽毛一豐滿又不聽中央招呼，鬧獨立，所以當周恩來提出願意去雩都，和毛澤東談一談時，博古也就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來一早就帶上警衛員，冒著小雨，披上蓑笠，騎馬奔雩都去了。

第三天，周恩來回到瑞金，只對博古說了一句話：他同意隨隊轉移了。

後來博古的警衛班長羅正基聽警衛員康念祥、陳年標嘀咕說，周恩來和毛澤東在雩都城北外的贛南省省蘇駐地，一直談到深夜。連警衛員送水都不准留在屋裡，送完水就得出屋，四個警衛員戴著蓑帽，披著蓑笠，在屋檐下冒著雨站了半夜，褲腿、鞋襪、綁腿全淋濕了。羅正基告訴博古時，博古一聽了之，全不放在心上。

毛、張給大轉移留下兩頂「轎子」

早在9月中旬，博古就反復強調，大轉移的成功與否，就決定在嚴守秘密和輕裝上陣上。多次要求機關人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一切不便於長途行軍作戰的人和物，統統就地轉移、疏散、隱蔽，或交給留守軍團處理。

可是就在毛澤東決定隨隊西征後的第二天，洛甫（張聞天）就來找博古，說是毛澤東不同意分散機關人員，認為

機關人員中有老人、婦女、病號和孕婦，編到大部隊裡一起行動很不方便，他們也不願意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去，有些農戶也不願意接受。因此毛澤東的意見是把機關人員集中，編成縱隊西征，既利於統一指揮，也便於統一照顧，對物資設備，毛澤東也不同意因重而棄，提出應「擇要隨行」。博古認為這個「要」沒有標準，醫院一臺X光機要六個人抬，還得準備兩個人輪換，非要帶上，其他工廠的設備都存在類似情況，這樣一來多少挑夫、馬匹，搞得隊伍太擁腫，影響行軍速度，因此這兩條都不同意。洛甫聽了怒氣衝衝地說：你專制、霸道、沒人性，你老婆跟著走，毛澤東的老婆就留下（孕婦）。後來，又向博古保證做到：一、機關人員編成縱隊後，作為戰鬥單位，一切聽從「三人團」的統一指揮，聽從軍委的安排，同大部隊統一行動；二、擔架、挑子、駄馬決不拉大部隊後腿，不掉隊，不暴露目標；三、保證行軍速度，做到「兵貴神速」。

隨後，博古跟周恩來、李德商量此事，洛甫也在場。周說：「毛澤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主席，他打仗有經驗，既然他提出意見，應該尊重他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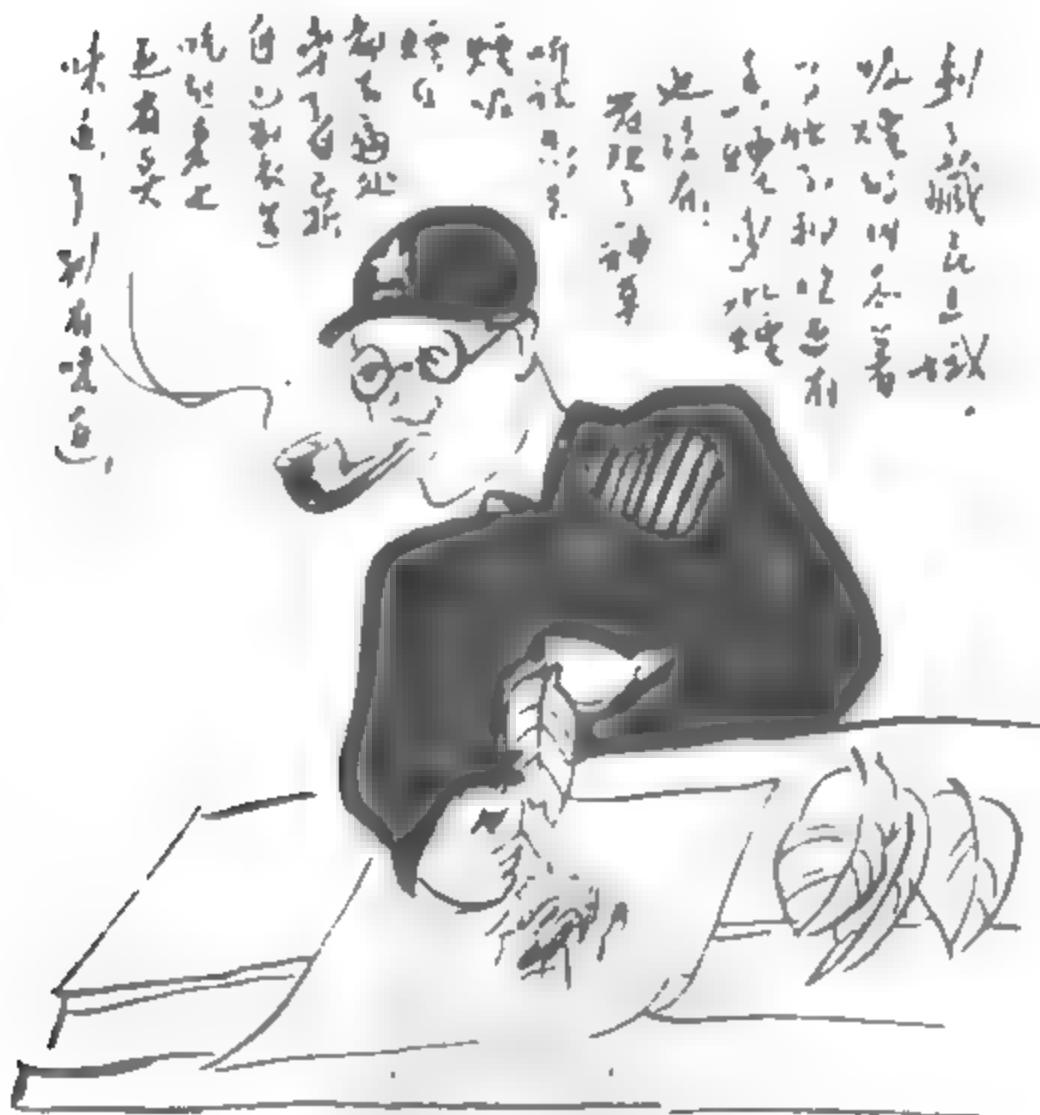
於是毛澤東的這個「餽主意」終於被採納了。成立了紅星縱隊和紅章縱隊，使肩負大轉移戰鬥任務的中央紅軍，又背上了中央機關、軍委機關和中央政府機關這二個「大包袱」。人稱二頂「轎子」。

以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證明正是這一頂「轎子」，拖了紅軍後腿，失去了中央紅軍在時間上的優勢，延誤了過湘江的時間，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

1934年10月8日，這是令博古難忘的日子，也是博古最後同項英在蘇區話別的日子。這天項英在中央局辦完交接事宜後，來看望博古，兩人促膝談心，甚為融洽舒暢。臨走前項英衷心告誡博古：「毛澤東這個人有野心，你要小心提防著點」。

長征開始，突破三道封鎖線

1934年10月10日上午，潘漢年來電話告訴博古。經過與粵軍代表楊幼敏、黃任寰、黃質文三人的五天談判，已經達成了五項共識，其中第五項中寫進了博古再三叮囑的協議條款，這個消息對我軍極為有利，「最高三人團」碰頭後，決定傍晚大軍開撥，實施戰略轉移，向西南方向突圍。



黃鎮將軍在長征中畫的秦邦憲的煙斗

博古要朱德嚴格要求部隊晝宿夜行，限制火把照明，不准吸煙、不准喧嘩、一隊緊跟一隊快速行進。

當晚八點，朱德總司令下令全軍出發。從雩都出發的是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從瑞金出發的是紅三軍團和紅八軍團，以及紅章縱隊和紅星縱隊，從會昌出發的是負責殿後的紅五軍團。也就是這一天，國民黨軍營裡燈火輝煌，軍官、士兵正在分別聚餐，慶祝國慶的時候，中央紅軍開始了後來被毛澤東事後定名的「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中央紅軍有紅一、紅三、紅五、紅六、紅七、紅九共六個軍團，總人數約六萬人。廣昌戰役中損失了近六千人，六路分兵損失近二千人。紅六和紅七軍團帶走了二萬四千多人。「擴紅」中又補充了二萬多人，又成立了紅八軍團。大轉移出發前清點人數，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紅一、紅三、紅五、紅九共四個軍團人數為六萬，新建紅八軍團人數為13313人，但其中新兵七千人，約佔五分之三。紅星縱隊和紅章縱隊中，機關幹部9228人（含家屬），另有挑夫五千人，警衛、勤務等318人，合計總人數14546人。整個參加大轉移的總人數為86859人。

由於人多，單位多，全部撤離完畢，幾乎長達一個多星期，到10月20日，所有部隊都潛伏在從龍布起，包括新田、重石、版社、固陝到韓坊間，40華里長的地段上。10月21日夜，一聲令下，潛伏的部隊突然從40華里長的地段上，一齊向封鎖線衝過去。這時防守的粵軍余漢謀縱隊已得到陳濟棠的示意，假作抵抗，朝天開槍，便向信豐、安遠、南康三縣撤退，讓出了中間大道，佯攻假打，遮人耳目。

10月22日，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紅一軍團先後渡過信豐河，23日又在南康、大余間橫渡章水，越過南雄公路，進入粵北。

10月30日，先頭部隊向湘粵邊汝城進發，在治理與城

口之間，遇上了由粵軍李漢魂、葉肇部、湘軍六十二師陶廣部，及地方團防胡風璋部，聯合設置的所謂「防線」，但見了中央紅軍粵軍不想打，湘軍畏縮不前，只有反共成性的地主武裝即所謂的地方團隊，狂妄猖獗，要和中央紅軍幹一仗。10月31日紅三軍團攻克熱水、土橋，搶佔了蘇仙嶺，擊退了湘敵，殲滅胡風璋的一部份匪徒，迫使殘敵退守汝城。接著紅三軍團在城頭寨、太來圩、大坪等地重創湘軍。

11月4日紅一軍團攻克城口，紅章、紅星縱隊和護後的紅五軍團，亦都先後入湘。部隊在城口休整了一天。這天中午劉群先來到博古住處，博古問及二個縱隊的情況時，劉群先說：「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個人，一路上，天天聚在一起，人稱『小三人團』、『中央三人小組』，總之要小心他們結成宗派小集團」。博古一笑了之，並未引起重視。

此時，蔣介石軍隊還在中央蘇區腹地烏龜爬，10月26日佔寧都，11月10日佔瑞金，才知道紅軍主力已經入湘，蔣介石怕中央紅軍在湘南建立起根據地，急令湘軍何鍵為「追剿總司令」，又調動薛岳、周澤元的五個師和湘軍劉建緒的李覺、王東源、辛亮基的四個師，共十個師，趕在彬縣、宜章及粵漢鐵路兩側佈防，堵阻紅軍向湘南及湘中進軍，蔣介石的判斷錯誤及敵軍的行動遲緩，已經在時間上失去了戰機，趕不上中央紅軍了。

湘江之戰

11月13日，紅軍攻佔宜章，15日攻克臨武，接著各路紅軍主力相繼渡過瀟水，集結在道縣到江華一線。這時發生了挑夫罷挑，要求付錢，回贛南，不願意再繼續西行。博

古得知此事後，急電葉劍英，發銀兩讓挑夫回，所有輜重一律拋棄，兩個縱隊合併為一個縱隊，稱中央縱隊，不願意隨隊西行，願意回家的，可以發給路費，總之必須輕裝過湘江。



湘江紅軍渡江指揮部

可是這個電報，受到「小三人團」的抵制，葉劍英也難以執行，挑夫走了，輜重還得帶上，縱隊也沒有合併，葉劍英不得已，讓紅八軍團的新戰士暫當挑夫。結果大大影響了行軍速度，一天走不到40華里，這個惡果的報應很快就顯現了。

11月25日，朱德發佈命令：野戰軍分四路縱隊，迅速從全州到興安之間，搶渡湘江，一路縱隊：紅一軍團一個師、二路縱隊：紅一軍團的一個師、紅三縱隊和紅五軍團的一個師，三路縱隊：紅三軍團、紅星縱隊、紅五軍團一個師，第四路縱隊：紅八、紅九兩個軍團。另紅五軍團一個師。

斷後。

命令發佈後，各路縱隊都加快行軍速度，11月26日，紅一、三軍團主力順利到達文市地區，27日先頭部隊紅二師和紅四師分別在興安與全州間順利渡過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腳山鋪的湘江淺灘，這也是9月間紅六軍團渡過湘江的地方。

可是在這最關鍵的緊要時刻，紅七和紅星縱隊，以及挑著輜重的紅八軍團，卻像蝸牛爬，三天只前進了一百華里，本來五千挑夫挑的東西，現在一個軍團一萬多人來挑也走不起來。紅九軍團為了保衛這兩個縱隊，也被拖著走不快。整個隊伍離離拉拉，從湘江邊一直拖到文市，首尾相差160華里，為了保護這個隊伍，紅五軍團的二十四師死守在文市。

這時蔣介石已完全醒悟，知道中央紅軍的意圖是想去湘鄂川邊界地區，與紅二方面軍會合，於是他嚴令湘、桂兩省軍隊，分路猛撲湘江，務必奪回渡河點。蔣介石的中央軍也分三路。馬不停蹄，尾追過來，直撲文市，想一舉消滅中央紅軍於湘江兩岸，形勢十分嚴峻。

縱觀全局，中央紅軍從大轉移開始，到渡湘江前，在同蔣介石時間差這個仗上，一直是處於主動位置。11月27日中午，當紅軍先頭部隊渡過湘江，右翼一軍團在全州以南30華里的腳山鋪西北的屏山渡，遇上交火的只是地方武裝，左翼三軍團在興安北的界首，遇上交火的也只是桂北的地方武裝。如果這時候進一步向前推進，完全沒問題，但為了保證紅星縱隊和紅七縱隊順利過江，朱德命令他們不再前進，而是要像一顆堅硬的釘子，釘在這兩端，控制住南起界首、北至屏山渡之間60華里的湘江淺灘。由「小二人團」帶領的這二個縱隊和挑著重物的紅八軍團，按照現在的行進速度，要走四天才能全部過江。

可是最接近全州的湘軍劉建緒的十八軍，其先頭

部隊距全州還有兩天路程，離興安最近的是灌陽的桂軍夏威的十五軍，有一個師，先頭部隊已接近新圩，距興安也只有兩天路程。而蔣介石尾追的二路兵，中路是周渾元二個師，經寧遠、道縣直逼文市，只有半天路程了；南路是二十七軍李雲傑的二個師，經桂陽、嘉禾、寧遠，從橋頭攻擊我右側，大約還有一天多路程；北路是十六軍李韜珩的五十二師，經臨武、蘭山、江華，渡永明河經灌陽，攻擊我左側，大約也有三天路程。但蔣介石出動了二百架飛機，分批出動，輪番轟炸、掃射我行軍隊伍。還飛到湘江渡口轟炸。傷亡最大的是挑着重物的紅八軍團新兵。這時兩個縱隊中少數的青壯年男子已緊跟主力到達湘江。剩下的大部分機關幹部主要是走不動，還有的年老身體弱，以及孕婦，躺在擔架上的傷病員，還有中央醫院。有的設備也因挑它的戰士犧牲了，丟在路旁，但毛澤東仍不下令全部丟棄，把抬物改成抬人，把一些實在走不動、或行動不便的，統統上擔架，快速趕路，而是聽任一天走40華里，慢悠悠地往湘江走。此時紅五軍團的三十四師，已奉命在新圩、文市一線阻擊追兵。

1934年11月28日湘江之役開始了。這天尾追的中路敵軍，在文市與紅五軍團的三十四師接火，戰鬥越打越激烈。11月29日下午情況驟然緊張，湘軍先頭部隊趕到了全州，桂軍先頭部隊也趕到了興安；尾追的南路二十七軍的二個師也在興安至新圩一線與紅三軍的一個師接火，北路的十六軍的一個師也與紅九軍團接火。至此中央紅軍被圍在南嶺南側山腳下一個底寬60華里（湘江渡口），長160華里（至文市）的一個三角形地帶裡，情況萬分危急。這是蔣介石在五次「圍剿」中，想辦而沒有辦到的事情，現在實現了。

在這要發生「全軍覆沒、一髮千鈞」的時刻，朱德總司令從11月27日下午到29日、12月1日中午曾二次發電，

命令後續部隊：扔掉輜重，火速過江；又命令「十萬火急，急行軍過江，再命令：限今日必定過江。可是疲馬不畏鞭棰，命令不起作用。

如果，在27日下午接到命令後，立即奉命行事，摔掉譚譚罐罐，開始急行軍，一天一夜即能趕到湘江渡口，這時湘江將成為阻擊敵人的天然工事。

如果，在29日上午接到命令後，立即奉命行事，摔掉譚譚罐罐，組織擔架，急速前進，此時距湘江渡口只剩70華里，30日凌晨定能渡江。這樣紅九軍團的傷亡定能減少一半，紅八軍團也不會造成「整排整連的開小差」。

12月1日拂曉，電報發過之後，博古看著江灘上被敵機轟炸、掃射而犧牲的紅軍戰士，心中涌起一股悲憤而無處發泄的情感，大聲說：我算一個什麼「統帥」。最高三人團下的命令，一次又一次被「小三人團」擋回來，到底誰聽誰的。說著把腰間別著的小手槍拿出來，喊道：「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槍斃了」。伍修權看見了，急忙過來說：「總書記，小心走火」。博古把槍收起，恨恨地說：「總有一天我會跟他們算這筆賬的」。

直到12月1日傍晚，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才不慌不忙地在警衛員的護擁下來到湘江渡口。

12月3日拂曉，周恩來下令炸掉浮橋，渡江之役結束。可是紅五軍團三十四師，幾乎全部犧牲在江東了，後來聽說只剩下幾十個人進山打游擊了。

1月7日，紅軍佔領了貴州省第一大城市遵義。

1月9日，周恩來找博古建議召開政治局會議。

紅軍在遵義休整時，清點人數，總人數為36919人。開始大轉移時總人數為86859人，減掉五千挑夫，紅軍人數為81859人。

整個大轉移中，紅軍傷亡和失蹤人數為44940人。其中紅八軍團的七千新兵中，大約一分之一以上的新兵，集體

「開小差」了。大轉移途中還有一些患瘧疾、肺病吐血和腸胃病不停拉肚子的病號，或死亡、或就地安置了。真正傷亡於戰鬥中的大約有四萬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傷亡於湘江之役。

損失最慘重的是兩頂「轎子」。出發時，兩個野戰縱隊總人數是 14546 人，到遵義時只剩下 1980 人。除去五千挑夫，淨傷亡 7566 人，傷亡 80%。

第五章

遵义之前的三次會議

遵义會議

博古的困惑

周恩來、博古一次重要談話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折。這次會議結束了錯誤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又回到領導地位。

這次領導權的成功轉變，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於殘酷的戰爭實踐讓大多數參與者認識到並選擇了毛澤東的領導。

其次，作為批評的一方，毛澤東採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1）只解決軍事路線問題，避免在政治路線問題上爭論；（2）集中解決軍事指揮權，而不走於解決黨的領導權問題，讓張聞天當負責人。這減少了阻力，團結了大多數人。

第三，作為被批評的一方，博古是最高等級領導人和會議主持人，在福壽不利的局面下，始終保持民主作風，虛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嚴格服從多數人通過的決議，一切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計個人得失，主動辭去總書記職務，為順利解決領導權的轉換創造了條件。在共產黨的歷史上，一個最高領導人，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第四，1934年10月以後，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失去聯繫，這在客觀上使中國共產黨得到一次沒有國際干預的機會。這次會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歷程。

湘江之戰後，經過通道、黎平、猴場的三次會議，實際上「最高三人團」已名存實亡，為遵義會議做了準備。

博古在遵義會議前是不贊成毛澤東的。但是，在他交權之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還不穩固時，他卻一直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維護毛澤東的領導。這種轉變，應該說與周恩來同他的一次坦誠的談話有關。顯然，他意識到「只有毛澤東能領導紅軍走向勝利」。

遵義之前的三次會議

一、通道會議

湘江之戰後，中央紅軍衝出包圍圈，於1934年12月11日攻佔了湘西南邊界上的通道縣城。12日在通道召開了一次所有隨軍同行的中央負責人參加的「飛行會議」，也可以說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當時敵人尾追很緊。湘江之戰後，蔣介石把他分散的五路兵力，編組為兩個兵團，任命湘軍劉建緒為第一兵團總指揮，指揮湘、桂、粵三路兵馬，及第十九師、五十五旅和補充四團；任命薛岳為第二兵團總指揮，指揮尾追的中路和北路中央部隊。

在中央召開「飛行會議」之時，劉建緒的湘軍先頭部隊，已距通道不足百里。所以開會只研究一個問題：「紅軍的前進方向」。

按照紅六軍團行進的路線，原計畫是在通道轉北，但後來紅六軍團捨近求遠，走了黎平，再北上，走黔東邊界到印江思南附近，與紅二軍取得聯繫。

現在，中央紅軍是從通道轉北，還是先西行到黎平、再轉北？這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李德堅持要在通道轉北，理由是沒有必要繞道黎平，走黔東，這樣要多走十天路程才能到湘鄂川根據地。

毛澤東意見走黎平再北上，理由是：「通道轉北，路雖然近了，但走的是直線北上，全在湘西邊走，現在蔣介石已清楚我們要和賀龍會合，肯定會在這條必經之路上設封鎖線，所以走這條路，吉凶難料」。

博古一時躊躇，總覺得李德的意見，風險太大，所以開「飛行會」，請大家來商議。

李德在1939年後，寫了一本《中國紀事》，他在書中寫道：「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個飛行會議，會上

討論了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計劃時，我提請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上追擊我們，或向西面戰略要地追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軍團建立聯繫」。

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方案，認為湘西邊是苗族、侗族的集居區，寨子裡人人有土槍，多年來他們受湘西軍閥的反動宣傳，對紅軍沒有好感，語言又不通，我們冒然前去會激化矛盾。再說現在紅二方面軍已退出洪湖地區，北上湘鄂川邊的咸豐、龍山、鶴峰、桑植、永順這一帶地區活動，處在武陵山的北側。如果從通道北上，必需經過洪湖地區，也即武陵山與雪峰山之間的山坳開闊地。如果湘敵在這裡設伏兵，則我們死無葬身之地了。

正在雙方爭論之時，軍委作戰科報告，已查明湘敵在通道至洪湖進口處，設置了四道防線，有一個軍、二個獨立旅的兵力，軍部和師部設在黔陽、芷江和新守，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防護體系。並送上地圖，圖上面清楚地標明四道防線的位置。

於是博古做出決定，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紅軍立即繼續西行，奔黎平。

這次會議對李德的威信是一次大的打擊，對李德的支持率一落千丈。

二、黎平會議

「飛行會議」只開了一個半小時，部隊立即出發。1934年12月13日進入貴州省，15日攻佔黎平。

蔣介石原定「圍殲」紅軍殘部於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的計劃落空。「追剿」的部隊不知何去何從，只好原地待命。中央紅軍得以在黎平作小休整。

1934年12月17、18日兩天，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

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爭論尤為激烈：李德主張北上，經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順與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主張繼續西行，經臺江、黃平、瓮安、同樂，攻遵義。毛澤東的理由是：一、新寧是湘軍劉建緒的老巢，現在他發現紅軍不在通道北上，來到黎平北上，他肯定要在江口、思南一線設防，因此不宜走這條路；二、黔北軍閥候之擔兵力薄弱，我們不如先取遵義，在黔北發展。這樣必要時，東出思南，可與二、六軍團會合，西渡赤水河，北上可與四方面軍會合，這對中央紅軍休整，出兵都極為有利。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最後博古也接受了這個意見，決定西進，攻佔遵義。

李德在他寫的《中國記事》一書中，對此次會議的情況做了敘述，他寫道：「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指李德提出的由黎平折入黔東，向思南前進），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了洛甫、王稼祥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又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長江以南同二、六軍會合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係指紅四方面軍）會師」。

八年後，在延安整風時，周恩來對黎平會議的敘述是「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

第二天會議休會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找政治局的同志談心，宣傳建立川黔根據地。

第一天，接著開會，研究到遵義後的下一步行動。是東出思南，還是西渡赤水。毛澤東改變了昨天的意見，提出就

以遵義為中心，建立川黔邊根據地。最後會議通過表決，少數服從多數，決定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師和建立湘鄂川黔邊根據地的原定計劃。



博古、葉劍英、朱德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如下：「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不可能，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這在目

前成為主要危險傾向」。

會後，遵照博古的決定，撤消紅八軍團，剩餘人員並入紅五軍團，撤消紅星、紅章縱隊，能戰鬥的人員充實一線部隊，無戰鬥力的重新編組稱中央縱隊；全面檢查務必輕裝上陣，徹底丟掉「鐸鐸罐罐」。部隊經過休整，於1月20日向黔中前進。

三、猴場會議

1935年1月1日，搶渡烏江之前，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的猴場，又開了一次會。

會議只開了一個多小時，確定渡江後「首先佔領遵義城，以遵義為中心擴展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這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全軍明確了目標，鼓舞了士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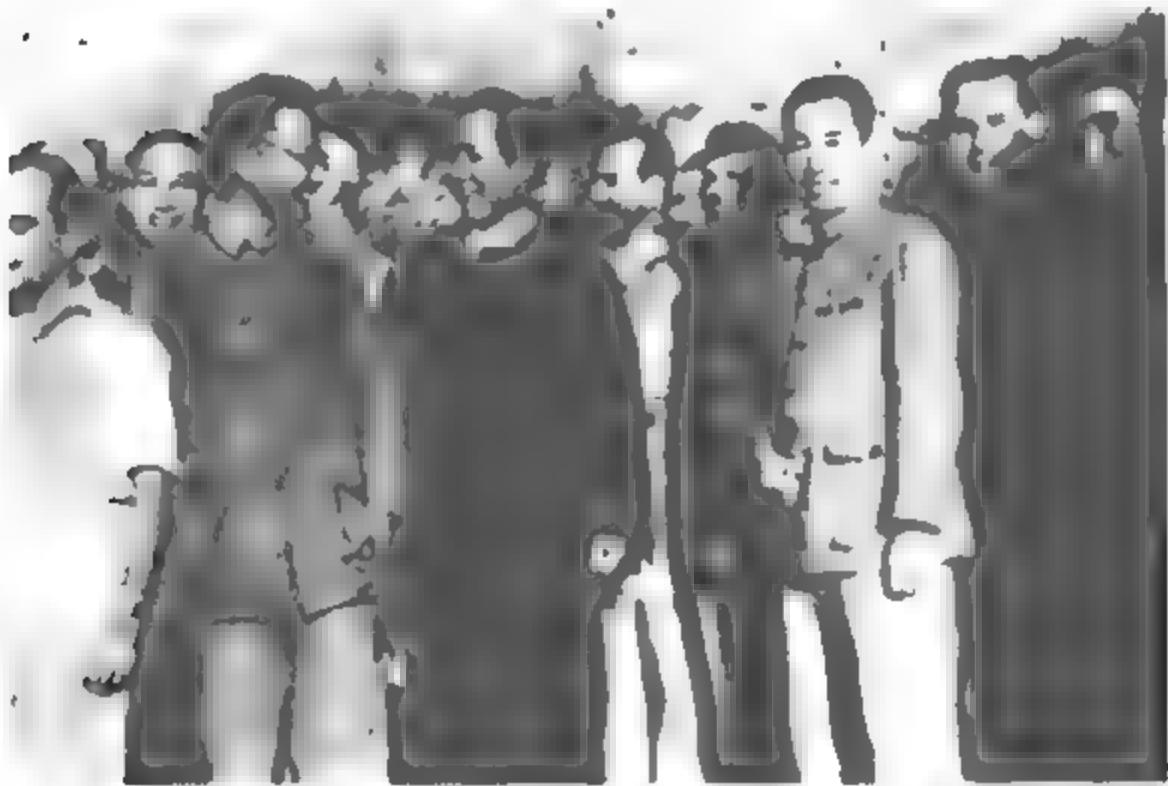
這次會議和黎川會議最大的不同處，就是否定了毛澤東主張重點發展遵義西北地區的戰略，而是以「向川南發展」為目標的戰略。

1月7日，紅軍佔領了貴州省第二大城市遵義。

遵義會議

1934年1月9日，周恩來找博古建議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對大轉移進行一次初步總結，接受教訓、溝通思想、消除委員間存在的意見、增加團結。博古說：湘江之役要好好總結教訓，現在政府比黨大，誰也管不了，有禁不止，死了那麼多人，一臺X光機還要堅持抬到湘江邊才扔掉。這次會議一定要強調組織性和紀律性，政治局內絕對不准搞什麼「中央二人組」這種宗派小團體。這次會議就是要以這些作為主要議題，團結全黨。恩來兄，這次會議由你主持，掌握住議題和議程，開二至一天。總之，對在湘江之役中

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一定要進行批評和糾正。周恩來說一定在15日開吧。



1945年，博古（左三）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右四）、葉劍英（右二）、吳玉章（左二）在延安機場。

會議從1935年1月15日，開到17日，共三天。第一天會議是周恩來主持的，第二天第二天是博古親自主持。

會議第一天，一開始就進入了雙方爭執之中，爭論的焦點發生在議題上。博古的發言是從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突圍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講到湘江之役時，提出這次會議要糾正湘江之役中發生的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正是這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為，破壞了大轉移的整個戰略計劃，造成了湘江之役的重大傷亡。……」可是博古話沒有講完，還沒有講到紅軍下一步向何處去的戰略意見，就被突然站起來的張聞天把話打斷了。

張聞天怒氣衝天地大聲說 先別忙著糾正別人，要糾正的是你自己。這個會議的重點，應該是追究第五次反「圍

剿」在軍事路線上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者的責任。接著他發表了長篇大論。這完全是有預謀、有準備的發言，結論是「像這樣對軍事指揮不懂裝懂，只知以權壓人的人，在目前戰爭時期沒有資格擔任總書記。」

對張聞天的突然發難，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卻不按會前與博古商議好的議程進行，而是帶鼓動性地稱讚張聞天的發言好，「撥開了近三個月來籠罩在中央紅軍頭上的迷霧」。接著他自我檢討了在五次反「圍剿」後期，搞「六路分兵」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表現，請大家批判。於是把會議引導到全面討論「廣昌戰役」的失敗原因，和追究指揮者（博古和李德）的責任上來。

緊跟著毛澤東就此發表了長篇評論，狠批了李德的「愚蠢」的「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的戰略戰術，說博古和李德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央蘇維埃共和國」葬送了。王稼祥還氣呼呼地跟一句：「賣國賊」。

李德幾次站起來又坐下，周恩來不讓他發言。

第一天參加開會的有：

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陳雲；

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鄧發、劉少奇、何克全；

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第二天的會議應毛澤東的提議，吸收了紅軍總部和各軍負責人參加，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

增加的是：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致、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

參加會議的總人數 19 人，有表決權的十人。

第二天的會議由博古主持。會議一開始，博古首先講話：今天請軍隊的領導同志來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中央想直接聽，聽大家對第五次反「圍剿」和戰略大轉移上，中央軍事領導上犯了哪些錯誤，對「三人團」有什麼意見、看

法和批評。

接著博古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做了初步總結發言。博古說：昨天會上大家提出了這個問題，夜裡我反復思考，今天也只能算個「初步總結」。他根據自己寫的提綱，開始了題為《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講話，首先指出由於鄂豫皖等根據地的喪失，使蔣介石能用全部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國民黨出動了百萬軍隊，五百架飛機，1500門火炮，敵我兵力懸殊，客觀上紅軍處於劣勢，加上敵人對蘇區的長期封鎖，在物資供應上我們也十分困難，而白區，黨對人民群眾的動員工作也都沒有很好的開展起來支援蘇區的反「圍剿」。而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中央估計不足，寄希望於國民黨軍隊內部「不斷高漲的反戰情緒」，和要求抗日救國的熱情。可是當十九路軍真的要和我們聯手「反蔣反日」時，我又「葉公好龍」，遵從共產國際的意見，拒絕了他們。當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實施「竭澤而魚」的戰略時，彭德懷同志曾向我建議：留七、九軍團守根據地，讓我和中央軍委率一、三、五軍團北上，與贛東北紅軍會合，開拓閩浙贛根據地，也就是後來紅七軍團組成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走的這一條路。當時我沒有同意，認為這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國」字在我的腦海裡壓得很重。昨天有人說我丟棄了中央蘇區是「賣國賊」，當時我就是怕揹這個「罪名」。後來毛澤東又提出，要中央紅軍從興國突圍，越過羅霄山脈中段進入湖南，攻茶陵、攸縣，跨過粵漢鐵路，進衡山西麓的白果一帶開闢根據地，可以留紅七、九軍團在中央蘇區與敵人周旋，等敵人撤退後，主力紅軍再從湘中殺出，過陽明山，進南嶺，返回中央蘇區。我聽了之後，認為這又是1929年春井岡山第三次反「圍剿」時，毛澤東用過的「損人利己」的辦法，我決不採納。由於失去了這兩個跳到外線作戰的機會，使紅軍被圍在中央蘇區這一狹小的

地盤裡，為抵禦敵人的步步緊逼，只得採用李德提出的「防守反擊」的陣地戰，加上短促突擊的戰略戰術。結果使紅軍遭到了不應有的很大損失，廣昌也丟了。對這次戰役的失敗，以及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博古發言之後，第一個發言的是毛澤東，他把昨天的發言歸納了一下，認為博古剛才的講話是在替自己的錯誤做辯護，整個戰爭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博古的錯誤在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個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二個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接著張聞天發言，認為，戰爭的勝負不決定在一城一地之得失，關鍵在於軍事路線是否正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博古制定的軍事路線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正如剛才毛澤東指出的，在三個階段上各有不同的特色。但產生這條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原因在哪裡，我認為根子就在博古在中央蘇區建立的軍政聯合領導體制上。1933年9月，身為黨的總負責人的博古，擠進中央軍委委員，雖然是委員卻把持了軍委大權，接著1934年1月，他又將中央軍委和紅軍前敵指揮部合併，直接控制了軍委指揮權，還兼任了紅軍總政委，直接指揮部隊。這種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領導體制，我同恩來同志都曾當面勸過他，但他堅持認為這是戰時領導體制，中央蘇區處於戰爭狀態，軍事工作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黨的總書記必須親自抓，於是，一個不懂軍事工作的人掌握了涉及八萬紅軍命運，整個蘇區危安的第五次反「圍剿」的總戰略和總路線的決策權。而把精於駕馭戰爭的、擅長於游擊戰、運動戰的紅一方面軍的創建人之一的毛澤東同志趕出了軍界，這是中央和博古在用人上的最大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打倒這個領導體制，重新建立黨、軍分開的體制，讓毛澤東回到軍隊的領導崗位上來。

毛澤東和張聞天的發言，為會議定下了「基調」。

接著發言的軍隊領導人，幾乎都是大同小異地在這個既定框架內打轉轉，沒有多少新意了。楊尚昆、陳雲簡短地表了態，王稼祥雖然很激動，說話嗓門很高，但也是重複了毛、張的話，只有彭德懷沒有發言，深思不語。

凱豐（何克全）不同意張聞天的發言，認為不能因為軍事上的部分戰略戰術有錯誤，就否定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體制。從近二年的實踐證明集權領導要比分權領導、各自為政好得多，適合中國國情、適合無產階級一黨執政，是一種比較好的領導體制，不應該反對。剛才洛甫（張聞天）同志說黨軍分開，這是嚴重的分裂主義，其實質就是讓軍隊獨立於黨的領導之外，這是十分錯誤的，不能以反對「左傾本位主義」為藉口，實行「右傾本位主義」。

第三天的會議仍是由博古主持。

會議開始時，博古承認在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上犯有錯誤，在戰略上犯了「寸土必爭」的左傾錯誤，請大家繼續提意見，希望大家對臨時中央這幾年在政治路線上做出評價。

一直沒有吭氣的劉少奇發言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檢查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五中全會後，對白區的工作重視程度、以及在白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劉說：我認為在白區拒絕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拒絕與小資產階級聯盟是「左傾」關門主義，多次指示白區的中共地下黨要積極組織城市罷工、罷課、搞暴動，以支持蘇區的反「圍剿」，緩解蘇區的戰爭壓力，是「左傾」冒險主義。這都是「左傾」本位主義在政治路線上的錯誤表現。

對劉少奇的發言，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都不表態，因為他們知道在政治路線上，臨時中央的政策都出自共產國際，博古只是跟著共產國際路線後面，亦步亦趨罷了。如果說現在提政治路線上犯了錯誤，那鬥爭的矛頭所指就不是臨

時中央，而是共產國際了。這可是個組織原則問題，而且導致共產國際的反感，不承認或者不批准這次會議最後得出的結果。所以他們全部都避而不談政治路線。

凱豐見沒有人發言，就說 我談點看法，博古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上打了敗仗，是有錯誤，但不能說總的政治路線也都錯了。四中全會以來，博古同志始終忠實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歷次重要指示，從不打折扣，如果說這是「左傾本位主義」的政治路線，那這個意見應該向共產國際執行局反映，請季米特洛夫同志回答。臨時中央成立以來，蘇區根據地是發展了還是縮小了，這是有目共睹的。我們還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三大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發展到了四、五十萬。經過「查田」運動，蘇區的土地革命得到了鞏固，人民群眾踴躍參軍，中央蘇區擴充紅軍近十萬人。我們還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隊，在全國擴大了抗日的號召……等等，難道說這些都是路線錯誤嗎。難道因為未能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就把黨中央領導全黨奮鬥得來的功績全盤抹殺掉嗎。再說軍委工作具體是周恩來同志與李德同志負責的，周、李二人長期不和，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李德是德國人來參加中國革命，沒有一己私利，這是國際主義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與共產國際友人共事應該謙忍，對李德的缺點應該善意幫助，不應一棍子打死。更不應該把全部過錯都記在博古和李德身上，這不公正。

晚上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站起來發言。他說：我完全同意同志們對黨中央所犯錯誤的批評，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作為指揮這場戰爭的一個負責人，毫無疑問的要承擔責任。免去導致失敗的揮指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爭中用正確的軍事原則，巧妙地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讓黨來重新安排。澤東同志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我請求

中央考慮。

最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如下決定：

- 一、增選毛澤東同志為政治局常委。
-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一、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擴大會議完畢後，1月18日上午，博古召集中常委研究分工，確定博古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張聞天負責黨的宣傳工作，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作為周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張聞天提出總書記一職是否改選，毛澤東意見不急於改選，等大家都平靜之後，在適當時候再考慮。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暫時仍由博古擔任。

會議分工之後，一個周恩來、毛澤東、朱德三人組成的長征路上新的最高軍事領導團成立了。

李德被撤消中央軍委顧問的職務後，沒有安排工作，隨中央縱隊長征。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走上軍事領導崗位，準備組織一次有力的戰鬥，消滅當前的敵人，把總政治部的所有幹部都派到連隊上去激勵士氣，參加戰鬥。

「新三人團」決定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一方面發電報，要張國燾渡過嘉陵江南下迎接中央紅軍，一方面率部隊過婁山關，西進桑木、土城，進入川南，再穿過瀘州與合江的中間地帶北上，計劃在川西兩軍會師。

不料，中央紅軍打土城失利，損失紅軍近千人，這是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崗位後所指揮的第一次戰役，給剛剛鼓起來的部隊情緒潑了一瓢涼水。在渡赤水河，向威信行軍的途中，張聞天向毛澤東反映：現在部隊情緒回落，很需要

政治宣傳鼓動，但中央沒有領導核心，宣傳工作也缺乏號召力，如果讓博古繼續佔著總書記的位置，恐怕部隊不服，時間一長就難以掌握了，應該扒時間開一個會改選一下。

毛澤東回答 不急，再等等。給他點時間想一想，到時候博古會自己要求辭職的。

博古的困惑

遵義會議後，博古有半個多月一直深思不語，不思茶飯，也不讓別人打擾，行軍路上只是騎馬跟著走，從不問去向或到哪裡宿營。

博古困惑什麼呢？主要有五個問題解不開疙瘩。

一、從張聞天準備的發言提綱，可以看出張、毛、王是早有預謀的，但沒料到在這次會議上發難。但為什麼周恩來要改變原來商定的議程，去跟著他們跑，迎合張、毛、王的需要？周恩來與李德經常爭執，把李德趕下臺尚能理解，但為什麼對屢犯錯誤的毛澤東卻推崇備至呢。毛澤東是個野心家，這次一躍為軍事指揮，周恩來能駕馭好軍事領導小組嗎？

二、為什麼張、毛、王避而不談「湘江之役」失敗的責任，難道「湘江之役」損傷紅軍將士近萬人，這個責任不該追究嗎？並且更嚴重的是造成整個「大轉移」戰略的失敗。湘江之役是比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更為嚴重的錯誤。是誰把「轎子」抬起來的，張聞天為什麼在會上不敢承認是毛澤東的主意。朱德的三次電令，為什麼對紅星縱隊、紅章縱隊不起作用？身為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知道了電令，卻無動於衷，置若罔聞，拖延到12月1日傍晚才到湘江邊，這對軍委命令是什麼態度？160華里，走了四天半，造成先頭部隊左右兩翼付出了沉重代價。尤其是挑夫走後，

毛澤東堅持讓紅八軍團的新戰士當挑夫，造成新戰士思想混亂，加上敵機轟炸，吃不飽等因素，成批開小差，整排整連的潰散，部隊接近解體。後衛部隊紅五軍團的十四師阻敵五天，幾乎全軍覆沒。這些責任難道不該澄清嗎？難道用一句「本不該轉移」就把責任推卸光嗎？當初出主意抬「轎子」，還逼著「最高三人團」同意，然後又堅持要把「轎子」抬到底的人，難道不應該做出一個像樣的檢討嗎？

二、在遵義會議第一天會議結束前，博古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我作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作為野戰司令部的政治委員，是要負責任的。「堡壘對堡壘」拼消耗是最嚴重的錯誤，沒有更廣泛深入地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更多地採納大家的意見，對李德存有偏信，這也是錯誤，我接受會議上大家對我的批評。以後還要更多的聽取基層對我的批評。但是，不能一股腦兒地把所有錯誤，甚至是別人犯的錯誤，也趁機全栽到我頭上，這是不公正的，教訓大家都應該吸取，可是會議為什麼仍然不能尊重事實，公正對待每一個錯誤呢？

四、作為總書記主要是對黨的政治路線負責。既然會議承認自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在政治路線上，是遵循共產國際路線，忠實的貫徹執行的，沒有犯路線錯誤。那麼當張聞天、王稼祥提出要更換中央負責人時，為什麼周恩來、毛澤東卻成了會議的旁觀者。最近有人反映張聞天去部隊裡，煽動改組中央，這是什麼行為。

五、開政治局會議為什麼要更換警衛營。原來保衛「三人團」的警衛營是去年九月初項英從國家保衛局裡挑選的幹部，忠誠可靠。為什麼臨到開政治局會議的前夕，周恩來卻把紅九軍團二十師調上來擔任警衛（幹部、戰士中大部分是毛澤東上井岡山時帶的湘東嫡系），把原來的警衛營（裝備比較好）調去對換，美其名曰：加強一線部隊。其實，明擺著是武力威脅，不達目的就動武。

周恩來、博古一次重要談話

1953年夏天，我出差上海，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每逢休息日我總愛去潘漢年伯伯家玩，有時下棋、有時聊天。有一天他說起在無錫剛認識博古時，在一起籌備舉行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的一些趣事，我趁他高興，問起遵義會議之事，他沉思一會說：1934年中央紅軍離開雩都，進行大轉移時，我在總政治部工作。開始時因為脫離了包圍圈，部隊的情緒很高漲，但不久由於連續半個多月的長途行軍，隨著疲勞的增加，一些牢騷怨氣也逐漸增多。先是野戰縱隊裡有人議論：黎川失守，處理了肖勁光，筠門嶺失守，處理了方強；為什麼廣昌失守不處理李德？外國人就該包庇？中央處事不公。黎平會議後，對李德的不滿迅速擴散，對中央產生了一股極度不信任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博古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主觀認為這是「中央縱隊小二人團」在惑亂軍心，反對中央。渡湘江時三次拒不執行軍委命令就是佐證。所以，博古決定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毛澤東想通過這次會議來清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罷免「最高三人團」，給部隊群眾一個公正的交待。明確今後不懂軍事的中央領導不要再直接插手軍事行動，以保證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則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改組軍委，把李德清除出去，恢復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的主帥地位。還有一個張聞天，則是想趁機把博古搞下臺，自己取而代之。遵義會議就是在領導人物各有打算，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召開的。後來改成擴大會議，吸收軍隊主要領導參加，情況出現了「一邊倒」。大家都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堅持仍要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最終會議得出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結果。

但是博古這個人很偉大，很快就誠懇地接受了會議的決

議，主動辭去了總書記職務，心甘情願地搞業務工作，扶助毛澤東，全心全意地為了中國革命，貢獻了自己的一生。那麼博古的思想是怎麼轉變的呢？有一個小故事，可以講給你聽。

那是1935年2月。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攻打土城失利。折回雲南扎西休整，中央領導住的村子，當地人稱「雞鳴三省」村。2月5日午飯後，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一共談了六點，涉及五個人。

一、關於遵義會議

周恩來說：會前我曾和你商量過，湘江問題主要是老弱傷病和婦女、機關部分幹部走不動了，疲馬不畏鞭捶，命令已經不起作用。當初老毛和洛甫堅持把他們單獨編成野戰縱隊，還雇了五千挑夫挑擔子，一起轉移，是考慮欠周。可是現在來追究過江遲緩的責任，而不談反「圍剿」失敗的責任及長途行軍在組織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議，先代表中央深刻檢討反「圍剿」失敗及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及責任，最後談湘江教訓，這樣會使會議開得順利些。可是你的講話對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只談現象，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對李德的批評也只是一帶而過，



周恩來

早早地把湘江問題作為會議重點擺出來，矛頭指向「黨內小宗派」，這給了洛甫「開炮」的機會，使會議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檢討反「圍剿」失敗的軍事指揮責任，承認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批評你確有盲從李德，包庇李德的錯誤。至於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這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能擋得住嗎？所以你應該想開些，以大局為重，虛心才能團結人，特別是對行伍出身的同志更要尊重。

二、關於我（周恩來）自己

本想在這次會議上給自己一個處分，撤掉軍委主席職務，以平息下面對中央的意見，還政治局一個公道的名聲。可是大家不同意，索性不設軍委主席這一職，代之以一個集體領導——中央軍事領導小組，仍要我擔任組長，這豈不掩目盜名嗎？我堅決不同意。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不設組長，要我擔任中央軍事領導小組的軍事行動最後下決心者。轉了一個圈，實質上還是回到原地，讓我負責軍事的最高領導工作。

為什麼軍隊幹部如此信任我呢？這同我十年的經歷是分不開的。1924年從法國回來就進黃埔穿上軍裝，與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孫中山先生支持下，組建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孫先生逝世後，鐵甲車隊與警衛團合併，成立了獨立團，這是我黨領導的第一支軍隊，在北伐中立下赫赫戰功，受世人矚目。國共合作破裂後，上海起義失敗告訴了我們，中國革命要成功，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不行。南昌起義失敗，有一個深刻的教訓，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非有一個比領導南昌起義的這些軍事指揮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來領導。廣州起義失敗，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的道路。「八七」會議後，全國各地的農民運動風起雲涌，開闢了大蘇區，我在中央任

組織部長，盡可能多地給蘇區注入大量黨的優秀幹部，所以軍隊對我有很深的感情。這次會議上大家不願意看到我離開軍隊。當然，我有自知之明，我不適合當統帥。歷史註定要扶持一個真正的統帥上臺，在不久的將來我肯定會讓賢的。

三、關於你（博古）

現在你在軍隊中威信很低，繼續做總書記已經不可能了。經過反「圍剿」失敗和「最高三人團」的壽終正寢，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一個不能參與軍事指揮決策的書記，猶如一個騎著戰馬奔馳卻由別人拿著韁繩的人，這是多麼窩心的事。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慾望，也不具備吸引群眾頂禮膜拜的魅力，心地善良，不會耍政治手腕。在中央蘇區主持工作的一年多裡，在政治路線上總是壓抑自己的見解，唯國際指示是從。「福建事變」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樣的結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議，使自己處在一個夾縫中。所以說這個「書記」不當也罷。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合適做領袖或主帥。在中國做黨的總書記要比聯共的總書記難，共產國際和軍隊、老百姓，這兩頭的哪一個在搖頭，你都不好受，都得下臺。陳獨秀、李維漢、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嗎！我看趁現在這個機會你自己主動辭職，比以後讓人趕下來好。這幾年你搞組織工作、宣傳鼓動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趨重，我這個紅軍總政委急需幫手，你來出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四、關於毛澤東

我建議你認真研究一下「十六字訣」，這是老毛秋收起義後在湘贛邊界羅霄山中段「佔山為王」時，從一個山大王的「打圈圈」戰術中學到的，經過他在多次游擊戰、運動戰

中的應用，總結出來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法寶。

老毛是繼澎湃之後又一個擅長搞農民運動的人。他深知在中國幹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深入瞭解農民的願望，緊緊抓住土地改革這個核心問題，發動農民起來反對剝削，建立自己的政權，同時他又善於利用中國幾千年封建習俗，道德文化，樹立起自己的威望，擴充軍隊，擴大根據地。

1927年老毛上羅霄山中段時，才幾百人的隊伍，佔據了兩個小山村，一年光景就發展到幾千，佔據了湘贛邊界四個縣城，後來又發展到贛南閩西，形成了湘贛閩蘇區。提出的口號很切合農民的心願，對鞏固根據地，擴充紅軍，籌集糧草很見效。他喜歡研究歷史，善賦詩詞，文筆驕橫恣肆，豪放不羈，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但老毛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領袖慾太強，好猜疑，主觀，聽不進意見。這幾年就是因為他主觀武斷屢犯錯誤，先後八次受處分，中央和湖南省委都曾撤過他的職，兩次黨代會上落選。不過，對其中有些錯誤也各有看法，處分也不一定都正確。至於「肅反擴大化」，責任在中央。老毛是借風使船，排除異己，趁勢統一江西境內各路紅軍，統一領導，目的是好的。手段狠了些，但這樣的大手筆沒有足夠的政治膽量，敢於承擔後果的人，也是做不出來的。人無完人嘛，戰爭需要他應用「十六字訣」率領紅軍打敗蔣介石，這是最重要的。

我真正理解老毛是到了中央蘇區後，在寧都會議前，打樂安、宜黃、南豐，這仗都是老毛主帥，我和老朱、老王輔佐，應用「十六字訣」的用兵方法，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結果仗仗打得得心應手，每仗全勝，心裡舒坦極了，對老毛很是佩服。可是寧都會議上由於老毛目空一切傲橫武斷的作風把自己趕下了臺，離開了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以後幾個月裡老毛一直抱病休養，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

我心頭，總感到對不起他，對不起中央紅軍。大轉移前夕他寫了一封信要求留在贛南打游擊，我聽急了，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於是匆忙去雩都勸說老毛隨隊轉移。那一夜我倆談了很多，從寧都會議談到廣昌失守，從李德談到中央的軍事路線錯誤，以及紅軍下一步往何處去。一直談到黎明。經過這次推心置腹的長談，我堅定了信心，應該幫助老毛儘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老毛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進湘鄂邊的錯誤路線，使我加重了要儘快「去李換毛」的決心。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夠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

五、關於洛甫（涉及張國焘）

洛甫是自己跳出來的。會後我同老朱，老王商議，一致意見讓老毛來做（書記）。但後來我同老毛交換意見，他說現在博古在軍隊裡威信低，沒有號召力，換一個人來做會好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線上是緊跟共產國際的，現在還不能提政治路線上的問題，所以就很難向國際執委會提出罷免他的理由。而且現在是非常時期，要保持領導層的穩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維護五中全會的選舉結果，只能做個別調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書記，也還是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今後還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對博古只能說服，不能硬來。現在洛甫想做總書記，那就讓他做一個時期。博古想通後，政治局可以發表一個聲明，博古不擔任總書記了。洛甫是五中全會選出來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又是莫斯科回來的，王明那邊也容易通過，雖然他在中央蘇區也做過一些錯事，但人總是要幫的嗎。於是，大家同意了老毛的意見，讓洛甫做個時期。

其實，現在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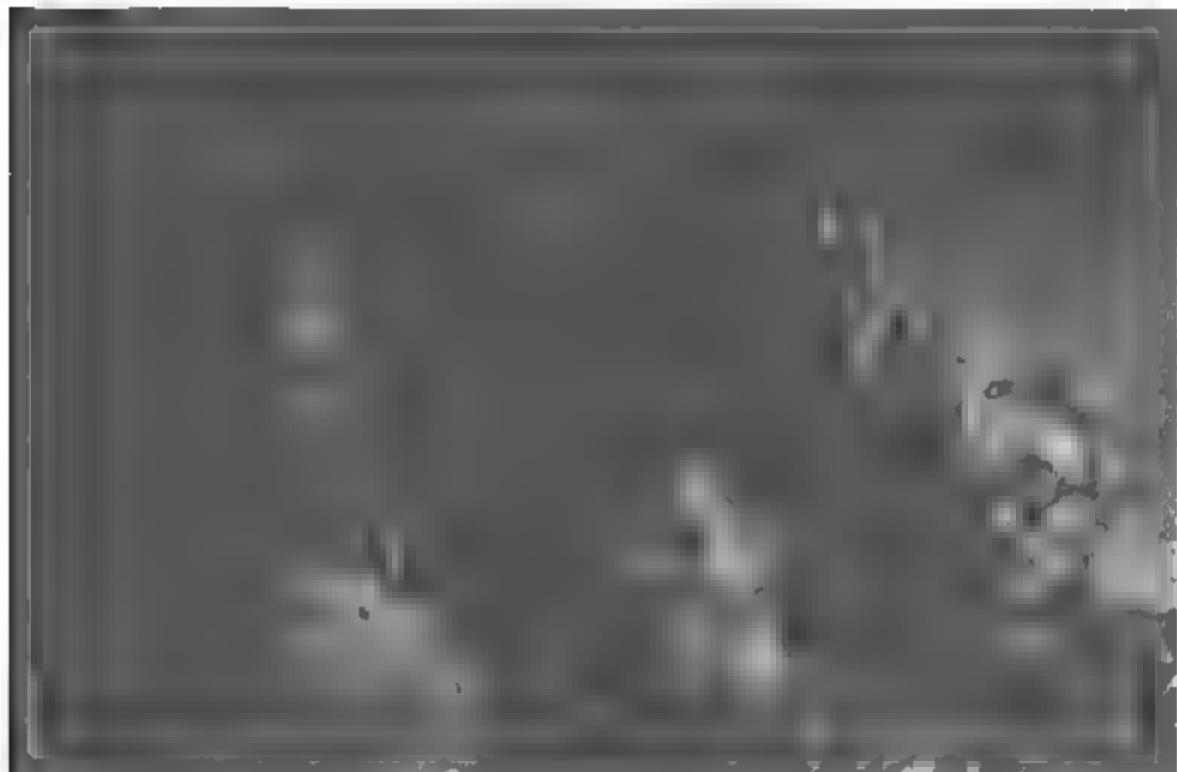
權，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別看洛甫現在高興，但他不會領兵，不掌軍權，用不了多久難題就來了。我們遲早要和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是視軍權至上的人，對既沒有資歷，又沒有實力，也不懂軍事的洛甫是不會買他的賬的。多年來張國燾一直是黨內老大，政治局常委、軍事部長，現在能和張國燾相比的只有老毛，他們都是「一大」代表，在「一大」二人交過手，以後都擔任過中央領導職務，後來又都領導過一個大蘇區，領兵數萬，現在又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領兵的主帥。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現在不設軍委主席一職，老毛也只是軍事集體領導中的一員，張國燾便會提出進入這個集體領導班子，而這個班子我是沒有能力駕馭的。因此必須趕在兩軍會師之前，恢復中央軍委主席之職，請老毛來擔任。由於軍權是由兩塊組成的，一塊是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在軍委主席手裡；一塊是軍事行動的實施權，在總司令部手裡，現在朱德是總司令、我是總政委，而擁兵八萬的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在這兩塊裡都沒有職務，這肯定是要禍起蕭牆的，會師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現在很難預料。到時候洛甫如何處理，在政治局會議上能否拿出一個成熟的主見，對他來說的確是個重大考驗。

六、關於調換警衛營

這事出於倉促，掛一漏萬，沒來得及和你商量就辦了，這是我的疏忽，請你原諒。起因是元旦過後盛傳中央要抓造成湘江失利的禍首，我正在納悶，是不是警衛營裡傳出了謠言。就在這時，老朱來找我說：八軍團撤銷後，新兵補充到九軍團了，但九軍團缺少有戰鬥經驗的連排幹部，我知道中央警衛營是項英從原保衛局撤消時，從中挑選一些有戰鬥經驗的，而且有的還在基層帶過兵的同志組成的，不如調到九軍團去，分配到新崗位上去發揮作用，再把原中央政府警衛

團從九軍調換過來，現在這個團缺員較多，整編成一個加強營，負責中央和軍委的警衛任務，整編後多餘出來的幹部也留給九軍團。我聯想到那個謠言，馬上同意了老朱的意見，決定第二天立即實施。後來事情一多也就忘了告訴你了，事後可能引起你和其他人的猜疑，這實在是一個誤會，與這次會議的確無關。

周恩來的一席話，感人肺腑，解開了博古的思想疙瘩，應了毛澤東說的：「解鈴還需繫鈴人」（當初成立「臨時」政治局，博古就是周恩來扶上去的）。



南方局常委和「三老」

後排左起葉劍英、博古、周恩來，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

博古的博大胸懷，不計個人得失，服從革命大局的需要，主動辭去總書記職務，也確實令人欽佩。結合他後十年的表現，確實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他的評語「一個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七大」後，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中說：「當

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是要幫麼。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第六章

王明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聯絡員
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兼報
潘漢年、張浩受命回國
博古與潘漢年臨別前的一次談話

很多人知道潘漢年的冤案，但人們很少知道，1931年王明去莫斯科之前曾和博古約定，潘漢年作為他們的聯絡員，所以，達成會議後，中央必須派潘去國際彙報。

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認為潘漢年「不可信」，看來，解放後潘漢年蒙受冤屈和毛對他的看法不無聯繫。

博古和潘漢年的一席話概括了和張國焘的鬥爭，以及毛澤東如何從周恩來的「幫助者」最後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

王明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聯絡員

一、博古和潘漢年的友誼

博古認識潘漢年是在1925年的春天。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震動全國，震驚世界。全國人民無限悲痛，各地紛紛舉行悼念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錫社」也在無錫籌劃舉行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博古是無錫「錫社」的負責人，正全力投入追悼會的籌備工作。按照黨的指示，要把追悼活動辦成一次範圍廣泛、規模鉅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傳運動。因此在人手上很緊缺。

就在這個時候，3月中旬的一天，潘漢年來到會場，找到博古，自薦願意參加籌備工作。經過交談，博古得知他在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已經學了半年了。春節前回宜興老家，在母親的主持下，農曆12月28日與個許姓女子結了婚，婚後又匆忙趕來無錫繼續學習。

經過幾天接觸，博古覺得潘漢年很有能力，處事機靈，

寫東西快捷通順，辦事利落，就請他負責宣傳，並兼顧保衛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倆的莫逆之交。

3月下旬，博古投身革命的啟蒙老師、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中國青年》主編惲代英來無錫參加孫中山追悼大會。博古介紹潘漢年與惲代英相見，惲代英瞭解了潘漢年的情況後，建議潘漢年去革命正在蓬勃發展、需要有志青年投身革命的上海工作。博古因為尚在蘇州省立第一工業專科學習，還沒有畢業，追悼活動結束後，即將去蘇州繼續上學，所以不能和潘漢年同去上海。

3月底，兩人惜別後，潘漢年即赴上海，4月底進入中華書局當校對。

1930年9月，博古從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同時在《勞動報》任編輯。

1930年10月，潘漢年從「左翼文藝運動委員會」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日報》任總採訪，同在中宣部任黨刊《真理》編輯的王稼祥住在一起。

1930年10月下旬，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摯友沈澤民也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宣部任新聞宣傳主管，是潘漢年的領導。

由於大家都在搞報刊宣傳工作，不久博古和潘漢年又重逢了。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是李立三。

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進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擔任江蘇省委書記。1931年1月，王明有一天對博古說，他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幫他主持宣傳工作，博古就推薦潘漢年。於是，1931年1月底，潘漢年就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1931年是當時處在地下活動的中國共產黨最困難的一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被叛徒出賣，2月7日英勇犧牲。4月27日，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送張國壽去鄂豫皖根據地後，返回上海時，在武漢被捕叛變。由於顧順章長期負責黨的保衛工作，知道黨的機密極多，清楚中

央機關和領導人的住址，所以顧的叛變，對中央構成很大威脅。周恩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才避免了對黨的機構的嚴重破壞。

可是一波剛平，另一波又起。6月21日總書記向忠發外宿時被人認出，而遭敵人逮捕，在24日就叛變了，供出周恩來的住處，幸虧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已撤離，^①但敵人在全市大搜捕，使周恩來難以長期在上海繼續存身了。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和王明決定加強特科的工作。由陳雲兼任特科科長，博古特別推薦潘漢年，認定他是搞保衛和反間諜的能手。因為在1925年無錫籌備開孫中山先生的追悼大會和進行追悼活動中，博古已經親眼目睹了他負責保衛工作的過細能力。於是在1931年7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漢年，談到了中央的想法，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漢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了宣傳系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繫，參加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7月，個新的中央特科成立了，由陳雲、康生、潘漢年三人直接負責。陳雲兼一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潘漢年任二科科長，負責搜集情報、偵察敵情和反間諜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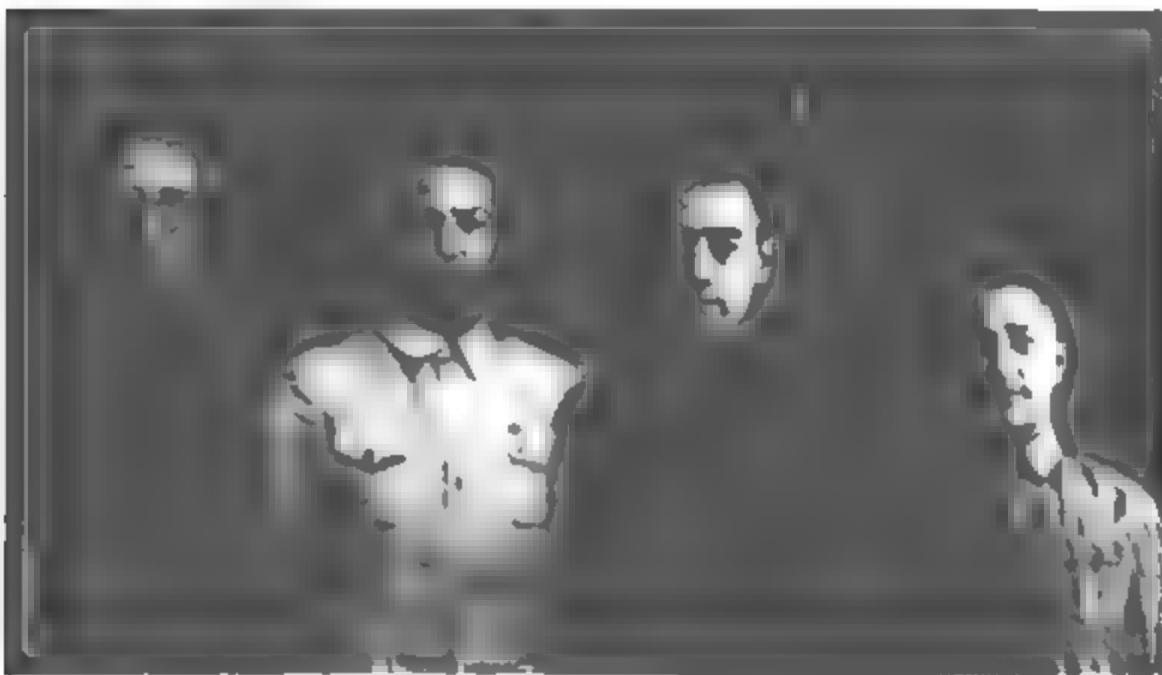
二、博古和王明約定潘漢年為聯絡員

進入9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嚴重，中央機關已經暴露的人員，開始分批轉移，前往中央蘇區。王明也想離開上海，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準備去莫斯科擔任瞿秋白離任回國後一直空缺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職位。臨走前他做了安排來控制國內的中央最高領導層。

王明和周恩來商定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並確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為常委，博古任總負責人。隨後

① 在陳雲的安排下，搬到了楊琳開設的文具煙紙店的閣樓上居住。

報告共產國際，10月10日獲得共產國際批准。這項安排有一個特點：這些人多數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其中博古、張聞天、李竹聲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是在中山大學的政治鬥爭中觀點一致的戰友。尤其是博古在同李立三路線鬥爭中，和王明聯手，共過患難。因此這個班子是王明完全信得過的班子。第二個特點是這個臨時班子不設總書記，只有常委和總負責人，因此王明給自己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



長江局常委博古、葉劍英、周恩來、王明

王明給博古單獨交代了二條「切記」。第一條「切記」是，要盡最大的努力，讓政治局在上海堅持下去。實在難以堅持，就遷往閩贛蘇區，但必須先派人報告共產國際，再遷出上海。同時必須牢牢掌握住中央蘇區，把這塊根據地建成中央的根據地。第二條「切記」是，儘量不要召開「五中全會」，不要改變四中全會的選舉結果和政治局的組成人員，要強調四中全會是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並批准的會議結果，必須尊重。情況發展到實在非開「五中

全會」不可時，也應提前向共產國際報告召開的理由，經共產國際同意後再開。第三條「切記」是：從1932年元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准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如果發生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出現特別情況必須報告共產國際時，「我們兩人確定一個秘密聯絡員，只有他來莫斯科，說的話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話」。

由於當時白區國民黨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帶信函文件，只能靠腦子記，用口述傳達，所以人選特別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腦子記憶力特別好，還要機敏善於應付種種環境，能穿插過敵人佈下的特務網線。博古認為只有他的好友潘漢年具有這方面的才能，於是兩人商定了聯絡員為潘漢年。

要發動群眾起來同國民黨軍警特務鬥爭，要緊緊依靠上海的工人階級，保護政治局在上海的安全。為此成立了「江蘇省委破壞反革命軍隊運動委員會」，調來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善長於做群眾工作的帥孟奇（女）任「破反會」書記。這樣內線有陳雲、潘漢年的中央特科，外線有帥孟奇的「破反委」，負責政治局的安全。

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潘漢年和特科暫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

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時被捕。為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李竹聲決定潘漢年撤出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工作。

1933年6月中旬，潘漢年到達瑞金。博古十分高興，留潘漢年同宿，細談別後上海的情況。當時中央紅軍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土改「查田」運動亦取得了勝利，邊貿開展得很活躍，根據地正在發展，軍隊和地方都很需要幹部。正好前幾天彭德懷向博古提出要給他配個政治幹部，楊尚昆願意去與彭共事。楊尚昆說「彭總是條漢子，

為人坦蕩，與他共事有安全感」。現在潘漢年來了，正好接楊尚昆的工作，讓楊去紅三軍任政治委員，潘漢年就接任楊尚昆原來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蘇區宣傳部長，在中宣部部長張聞天手下工作。

大轉移開始前，博古把潘漢年從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崗位上調回來擔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同部隊一起轉移，為的是使潘漢年能留在身邊。

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

遵義會議後，1935年2月上旬，部隊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雲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時，博古派警衛員去叫潘漢年，警衛員對潘說：「昨天總政委和總書記說了一下午話，現在總書記精神好了，找你過去談一談」。

來到博古住處，博古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全過程。談得很細，要潘漢年仔細記下，並把周恩來昨天說的話也仔仔細細地講了一遍。並強調：現在自己決定交權，讓位給張聞天，並同意會議的決定，重新起用毛澤東，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自己作為中央軍事上掌握最終決定權的人，難辭其責。紅軍需要有一個有獨特軍事才能的人，來幫助中央掌握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的周恩來行使這個權力，否則「蒸沙難成飯」。雖然毛澤東有不少缺點，尤其是有濃厚的封建帝王意識，排除異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沒有一個曹孟德那樣的人還不行。所以我思來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來的意見「煮粥焚鬚」了。

博古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一個印章，交幾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接班，否則即使交了印章，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沒有交出

去。所以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來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我和王明約定的秘密聯絡員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會相信這是我的意願。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把我剛才講的話，反復背誦記牢。為了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已經商量過了，讓陳雲同志也去，由周恩來把我昨天說的意見告訴他。但兩人要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彙報以你為主，陳去補充。

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

1935年2月7日，張聞天同時把陳雲和潘漢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和向王明彙報的任務。並提出自己有一個建議，想把黨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請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請共產國際執委批准。

1935年2月10日在中央紅軍轉移的同時，潘漢年化裝成商販南下，經雲南、香港轉上海，走海上。同年6月陳雲出發經四川轉上海，走陸路。

8月初，陳雲、潘漢年先後到達上海，在新組建的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後各搭蘇聯貨船，以押運員身份，經海參崴，再轉乘火車先後去莫斯科。潘漢年是在1935年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的。

此時，共產國際「七大」已經閉幕，王明在「七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公佈主席團名單時，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臺爾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樣，受到「暴風雨般的掌聲」的歡迎，王明此時此刻受到的殊榮，也是他一生中所達到的最頂峰。

王明聽了陳雲、潘漢年關於遵義會議及前後情況的詳細報告後，對博古主動交權感到很遺憾，對張聞天上臺則表示尚能接受。1935年10月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批准張聞天為中國共產黨臨時負責人。

潘漢年、張浩受命回國

一、潘漢年和張浩分別返國

1935年10月，王明決定派潘漢年和張浩兩人分別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對張聞天的任命。張浩原名林育英，在1932年底，博古決定把臨時中央遷往蘇區時，派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國內情況和遷移原因。挑選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有一個強項，記憶力過人，篇文章看幾遍後，能一字不誤地背出來。這次王明選派他，也是看中了這點，要他背熟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中共中央代表團發表的《八一宣言》，包括對張聞天的任命，也是口述傳達。

由於不知道中央紅軍現在何處，仍在黔北、川南邊活動呢，還是已到川陝甘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了。因此陳雲意見張浩走陸路，潘漢年走水路往回返。

10月6日，張浩裝扮成蒙古商人，從莫斯科經外蒙古，再穿越內蒙古毛烏素沙地西沿的鄂託史旗，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打探中央紅軍的所在。

1935年11月7日，張浩到達陝北定邊，找到縣委，瞭解到中央紅軍已在陝北，說明自己身份後，要求見中央。

11月9日，周恩來派人把他接到瓦窯堡，一見面才知道原來是林育英。張浩把他被黨組織從瀋陽監獄營救出來後，改名張浩，後被派往莫斯科，以及這次受王明委派回國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及宣佈共產國際對張聞天的任命等，細說了一遍。問及潘漢年是否已到，周說還沒有。

其實，這時候潘漢年還沒有離開莫斯科，他在盧鏡如的陪同下，在共產國際的情報局學習「新編密碼辦法」和「第二套新編密碼」1936年版。白天學習，晚上還要反復強記，不斷默寫，再燒毀。經過二個月的訓練，已經完全背熟。

1936年1月中旬，潘漢年已準備就緒要回國了。這時

王明又找他說：蔣介石派國民黨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來找我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這可是一個大事情。我和陳雲商議，陳雲說你是個「談判高手」，因此我們商定派你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去和鄧文儀接觸。辦完這件事，你再回國。

在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漢年同鄧文儀進行了三次談判，確定7月在南京和國民黨代表陳果夫繼續深談。為什麼蔣介石會提出「國共合作抗日」呢，為什麼會在莫斯科開始這個談判呢。原來蘇聯政府答應，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積極抗日，蘇聯就像當年支援孫中山和黃埔軍校那樣，全面支持和支援蔣介石及國民黨軍隊，並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簽訂友好互助條約。蔣介石為了得到錢和武器，就讓陳果夫出面與共產黨高層聯繫。

為了使這個接觸能繼續下去，並取得圓滿結果，王明讓潘漢年趕緊回國，向張聞天報告談判情況。王明再三強調，要向張聞天闡明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當前的首要任務，也是唯一的能夠動員全國人民去與帝國主義做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與蔣介石商談「合作抗日」作為首要的中心工作來抓。

1936年2月24日，潘漢年經列寧格勒，準備乘希臘客輪繞道香港回國。不料希臘政治情況突然變化，船出海二天後又折回列寧格勒。直到旅遊旺季的4月8日，潘漢年才以旅遊者的身份，乘坐國際列車，取道巴黎，從馬塞乘船到達香港，此時已是1936年5月中旬了，到香港後得知中央紅軍已到陝北，而上海自1934年冬發生李竹聲、盛忠亮的被捕叛變後，白色恐怖一直盛行，進入上海仍十分危險。

這時距和鄧文儀商定的7月會見陳果夫的時間已經很近了，先回陝北再來南京時間上恐怕來不及了，而且怎樣過上海也是個大問題。於是他在香港給陳果夫發信，告訴陳，他已到香港，讓陳果夫派人來和他聯繫。1936年7月7日，陳

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報》上，登了一則尋人啟示，「叔安弟，遍訪未遇，速到九龍酒店。敘。兄黃毅啟。」^②見面後，才知道黃毅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張沖的化名。

有了張沖這張護身符，潘漢年平安到達南京。可是當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得知潘漢年尚未和陝北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見面後，便不肯親自出面，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來和潘漢年談，要潘先回陝北，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談判條件帶來南京，然後再和二陳進行正式談判。並給了潘漢年「特別通行證」。

有了「特別通行證」，潘漢年在1936年8月1日乘火車到達西安，8月7日順利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張聞天彙報了在莫斯科的情況，談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對張聞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務。特別是著重彙報了他和鄧文儀、張沖、曾養甫談判的情況。

二、解決張國焘的問題，張浩立了大功

潘漢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時間裡，中共中央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特別是他比張浩晚到九個月，沒有儘快帶回國際的指示和密電碼，毛澤東對他很不滿意。而他更不清楚現在中共中央實際當家掌權的人不是張聞天，也不是周恩來，而是毛澤東。正是由於這些情況，對潘漢年的回來，毛澤東、周恩來都表現得比較冷漠，和張浩回到陝北時的熱烈歡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只讓他住在中央黨校宿舍，撥出一窯洞，讓他晝夜不停地把新編密電碼寫出來，交給鄧穎超同志。

這幾個月，到底發生什麼事，和他的晚歸有關呢？

原來，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② 肖叔安是潘漢年在莫斯科與鄧文儀談判時用的化名。

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開擴大會議，會議開了一天，在紅軍向哪裡發展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爭執。

川陝根據地由於長年戰爭的消耗和破壞，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要兵員補充沒有兵員，別說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問題。所以張國燾早已決定放棄「川陝邊」，進軍「川康」。當張國燾接到中央電令，要他渡過嘉陵江，迎接中央紅軍，建立川西根據地時，他滿心喜歡，揮師南下西出，攻佔了懋功一帶川西草原，準備以此為基礎，建立川西根據地。

在兩河口會議上，當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要建立川陝甘根據地，首先要奪取甘南，命四方面軍北上攻取松潘。張國燾對這個計劃不滿意，堅持紅軍南下，建立川康根據地。最後在會上張國燾勉強同意北上攻松潘，但會後又反對，最終發展到鬧分裂，帶領四方面軍南下在川康成立了第二中央。

如何解決收回紅四方面軍，使中國共產黨免於分裂。如何使中央的權威得到張國燾的承認，使黨中央成為真正的中共中央，一直是毛澤東、周恩來考慮的問題。尤其是四方面軍有八萬多兵力，比中央紅軍多四倍，如何安置和統一也是毛澤東的一大心病。

張浩的來到，使毛澤東有了主意。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澤東把張浩請進窯洞，要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報，說明是共產國際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但起初張浩沒有同意，因為共產國際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面軍「草地分手」這件事，也從未任命他以國際代表身份來解決這件事。

1936年1月，毛澤東再次把張浩請來。強調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已迫在眉捷。現在共產國際已批准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負責人，換言之，張國燾的中央就是非法的，張國燾自封的總書記也是非法的，應該讓他歸順。張國燾自認

他的軍隊比陝北紅軍多，比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強，因而自稱是「大中央」，而陝北中央是「小中央」，長此下去就更難求得統一了。

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張浩最終同意了毛澤東的設想。1936年1月16日，張浩用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報，內稱：「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

1936年1月24日，張浩又以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名義，批准張國燶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張國燶任西南局書記。

張浩用共產國際的名義發給四方面軍的指示，全是冒名的。這個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有毛澤東和張浩兩人知道。

張浩的這種作法為解決張國燶的分裂問題起了重大的作用，立了大功，毛澤東十分讚賞張浩。

但潘漢年在向張聞天的彙報中，回答張聞天的詢問時，說他對張浩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感到懷疑。毛得知後，對潘的「直率」很不滿，對潘的遲到，尤其是對潘漢年途經香港時，沒有明顯的理由滯留二個月，更是不以為然。

三、毛澤東說潘漢年「不可信用」

1936年8月，張聞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有關問題，博古也從瓦窯堡前來參加會議。

會議開了三天，專門討論「國共合作抗日」問題。當時除了國民黨駐莫斯科使館武官鄧文儀溝通了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繫，打開了潘漢年、張沖、陳立夫這條談判渠道外，還有另外二條渠道，也正在進行國共談判的聯絡。一條是由宋子文出面，通過宋慶齡的介紹，派董繼吾牧師來陝北，帶來了國民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並帶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復信，第二條是在陳立夫主持下，由曾養甫出面，委託

湛小岑通過翦伯贊、呂振羽的關係，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並由周小舟和曾養甫進行了初步的談判；第二條是湛小岑還通過左恭的關係和中共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繫，由張子華往返於陝北和南京之間，幾次轉達了國共兩黨有關談判合作的意見。

因此，政治局會議上，對這四條渠道做了對比分析。博古認為還是潘漢年這條渠道層次高些，應爭取和陳果夫、陳立夫直接面談。

周恩來說：國民黨駐蘇大使館出面聯絡的這條渠道比較正式，而且王明是讓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官方身份，去同國民黨政府的駐蘇武官鄧文儀談判的，後又因同國民黨組織部的張沖、鐵道部的曾養甫接觸，並與陳果夫也有了間接接觸，所以這條渠道比較現實。

毛澤東說：這條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談判的人選要慎重考慮。

張聞天說：現在陳果夫要的是我們的條件，我們應該重點放在研究條件上，人選問題放在最後研究。

當天休會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潘漢年這個人不知輕重，這麼重要的密電碼放在腦子裡九個月，不積極返回陝北中央根據地，把密碼交給機要處後再去辦別的事，卻先去辦「國共和談」，讓我們在這裡急等，耽誤了大事，這樣的人「不可信用」。

毛還說：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漢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對王明安排的任務比交密電碼給中央還看得重。

周恩來為此和博古溝通人選問題，博古說：「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二天的會上，周恩來表態說：人選還是潘漢年比較合適。理由是在中央蘇區時，幾次談判，潘漢年都談得很成功，何況這次談判是他開的頭，談得也很好，已經有了初步

眉目，我們再換人，對談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最後毛澤東也同意了。

四、張浩與潘漢年不同的結局

1942年3月6日，張浩因病逝世。毛澤東親自為他治喪，也是毛澤東一生唯一的一次親自抬著靈柩送殯，儀式極為隆重。

1949年上海解放。潘漢年首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1954年，發生「高饒事件」。在對饒漱石審查中，發現他於1930年在奉天（今瀋陽）被國民黨逮捕，1931年出獄，這期間有叛黨嫌疑，特別在接管上海前夕，批准任用原國民黨特務胡均鶴參加公安肅反工作。於是認定饒為國民黨在華東的代理人。接著聯繫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誠自首人員上有重大問題，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從而開始追查負責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並表示即將在全國範圍進行一次大規模肅反運動的決心。

1955年4月1日，潘漢年找陳毅談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會見了汪精衛的事情，說明後來長時間沒有向組織上說明的原因，並把一份自我檢討的材料交給陳毅，請他轉呈中央。陳毅安慰他，不要緊張，要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4月2日，陳毅赴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了潘漢年交待的事情，並交上潘漢年寫的材料。毛閱後，提筆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隨即，在當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這是建國後毛澤東直接製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潘案發生後，周恩來指示「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楊青長

(原中央情報部情報科長)立即組織一個小組，在李克農領導下，對潘漢年的政治、歷史、歷年活動進行全面審查。專案組進行了一年多時間的全面調查，翻閱了潘漢年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及同潘漢年有來往的全部人員的相關檔案，審問了有關的在押敵偽人員，經過各方面的反復核實，於1955年4月29日，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他提供了決策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北進的情報等。

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但是，這個事實求是的報告，在當時「左」的思想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並未引起重視。相反，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潘漢年做了「定性」結論。毛說：「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由於毛澤東的「寬容」，潘漢年得以繼續活命。1963年2月3日出獄，在北京公安局的團河勞改農場，被管制生活。1967年3月，謝富治又把他抓回監獄。1975年5月送湖南第三勞改農場安置，1976年1月宣佈結論「無期徒刑」。

潘漢年在監獄中和勞改農場渡過了22年後，1977年4月14日帶著「無期徒刑」的結論病故。

直到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建議復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農同志給中央的報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證。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博古與潘漢年臨別前的一次談話

中央決定派潘漢年去南京繼續與國民黨談判。1936年9月，臨行前，潘漢年去向博古辭行。

博古語重心長地對潘漢年說：現在中央的情況和當年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的情況完全不同。表面上看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手裡，其實不然，權力集中在前委，一切都是前委的毛澤東主席（軍委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軍委副主席）說了算。張聞天名義上是黨中央負責人，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常委罷了。1935年2月我主動交權後，張聞天急著要我派人去莫斯科彙報，就是為了要國際儘快承認這次「轉權」，批准他為「總書記」，好名正言順。我派你和陳雲去莫斯科後，張、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結果這個功勞讓張浩搶了先。你腦子裡帶密電碼，又以談判代表身份回國，走比較安全的路，晚到一、二個月的話，是無可非議的。張浩也曾說過，再等一個月潘漢年就能到來，結果你比他晚回來九個月。在這九個月裡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又聯繫不上，逼得毛澤東又派鄧發去莫斯科，彙報一、四方面軍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說毛能不生氣嗎？

你在向張聞天彙報時，一再說王明交待的任務，要中央把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放在第一位。這種說法不準確，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來的，不是王明。王明不瞭解國內情況，在國外指手劃腳，想指揮國內，毛澤東對這種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之間的

關係，以前，臨時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級，認為他即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副書記，是共產國際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主要領導人，在國內時就是我們的上級，所以，一有問題就請示他，聽從他的指揮。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概念錯了。到陝北後毛澤東明確表示，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是中共中央領導的一個部門，因此它的一切活動，都必須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據需要撤換代表團成員。毛派鄧發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闡明，中共中央有權更換代表團成員，取得季米特洛夫支持。看來王明在蘇聯的時間也不會很長了。

這次你身負重任前往白區和陳果夫談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謹慎從事，大事小事先報告周恩來，批准後再辦。千萬不要獨自行動，自作主張，否則後果難測，小則不被使用，大則禍從天降，千萬注意別出差錯。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後我們兩人少來往，你不論走到哪裡，不論遇到什麼情況，見到什麼人，寫文章談話，……一概不要談到我。毛澤東生性好疑，最近他對周恩來說，你是我的人，這對你今後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頭，這件事的確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潘漢年很關心博古的處境，博古說 我現在還可以，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遵義會議後，打土城毛澤東指揮不當，小看了敵人，打攻擊，結果損失紅軍上千人。一渡赤水後，在扎西休整時軍委二局一科科長曹祥仁告訴我，他破譯了敵人的密電碼，掌握了敵人的行軍路線，出發時間等，於是毛澤東指揮行軍，摔掉尾追的敵人，猶如神助，順利地渡赤水並進行了遵義戰役。

1935年3月4日，中央軍事領導在鴨溪成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這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跨出的第一步。毛澤東任政委後，親自主管一科，直接掌管電臺的電訊往來，以此指揮戰鬥行動，用兜圈子的辦法巧

妙躲過敵人的堵追。

1935年3月10日，中央負責人會議研究攻打鼓新場計劃發生分歧，毛澤東反對這個計劃，但多數同志同意，計劃仍被通過。當晚，毛澤東又做周恩來的工作，終於說服大家，取消了計劃。其後，毛澤東提議，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中央軍事小組，全權指導軍事行動，成為全黨全軍最高的軍事領導核心。於是，「軍事三人組」取代了遵義會議後的「軍事三人團」。這是毛澤東跨出的第二步。

三渡赤水後，部隊指戰員因不瞭解敵人的動向，開始有人對「打腿仗」出現不滿，一些中、高層部隊領導也有意見，反對毛澤東兜圈子，與敵人玩捉迷藏的戰術，使部隊來回走不少冤枉路，林彪還為此給張聞天寫了信，要求更換軍事領導人，提出把毛澤東換下來，讓彭德懷上。

面對這個情況，是我和周恩來兩個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面做工作，和大家解釋，總算把此事平息下去了。從此周恩來開始宣傳毛澤東如何神機妙算，牽著敵人的鼻子跑，把敵人拖跨，使紅軍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另一方面則嚴格控制一科，封鎖曹祥仁破譯密碼之事，使部隊感到毛澤東用兵神奇，毛澤東的威信也逐漸在紅軍中樹立起來。

1935年5月9日，紅軍渡過了金沙江，12日進到會理，「三人組」決定在會理休整一週。同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前階段幹部中，有人對軍事領導不信任，要求改變指揮者，甚至給黨的負責人寫信的右傾機會主義行動。會上毛澤東點名狠批了林彪，他是毛澤東在四年內親手從一名副營長提昇為軍團司令的人。毛說：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麼？土城硬拼，我們吃了虧就要長一智，不和敵人硬頂就得繞點圈子，就得多走點路，這你就受不了啦，就要反對軍事領導人，就要把毛澤東換下去，難道你要軍委聽你指揮，你太自不量力了。毛狠批了林彪，也就把其他軍隊領導幹部震

住了。

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張聞天、朱德和我都發了言，都表態支持了毛澤東。我認為在目前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黨和紅軍內部絕對不能發生分裂，必須上下一心，共渡困難。四渡赤水、過烏江、搶渡金沙江，毛澤東的決策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支持他。

於是在這個會議上，正式明確了毛澤東是軍事小組的負責人。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是林彪推了一把，使毛澤東完成了第二步，成為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人。隨後恢復了中央軍委，毛澤東任軍委主席。

但是能不能率領全國的紅軍，關鍵就在於四方面軍的二個主要領導人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的態度上了。

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決定增補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但張國燾仍不滿，仗著四方面軍的實力，在兩軍統一的行動方向上，堅持創建川康根據地。

會後，張國燾和陳昌浩分別來找我和凱豐（何克全），瞭解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的情況。張國燾說遵義會議決議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我和凱豐都義正嚴詞的拒絕了張國燾的拉攏，告誡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不要搞分裂。同時我還對張國燾的舊軍隊習氣提出了忠告，勸他改掉軍閥作風。

特別是剛到懋功，我就收到李先念轉交的曾中生寫的一封信，並要我保密。曾中生是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中共川陝省委委員，因寫了一份書面報告給中央，反映鄂豫皖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意見，和開了一個活動分子會議，會上批評了張國燾。被張國燾誣衊為「托陳取消派」，從1933年8月起遭到非法逮捕和長期監禁。1935年3月帶著手銬，隨紅四方面軍進軍川西，得知黨中央到了懋功，就寫

信給我（因為他不知道遵義會議的事情，仍認為我是中央負責人），要求調離四方面軍，請中央給他安排工作。我看完信就轉交給了周恩來請他處理（但因周對曾另有看法，當時未處理）。但我總覺得張國燾這個人專制得太過分，怎能這樣對待一個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有功同志呢。所以在與張國燶交談中，我反問張國燶：你對曾中生同志的事準備怎麼辦？人家只是寫報告給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有多大的錯誤嘛，關了兩年還不放。這一下把張國燶惹翻了，氣呼呼地走了。

陳昌浩和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在「中大」時還是個戰壕裡的戰友，過去一直相處甚好。這次也因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了。陳昌浩是搞政治的，是四方面軍總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當時廖承志是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就因為反對張國燶的錯誤，被開除黨籍，從1934年12月關押到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仍在押解中。聽了李先念的「透風」後，我心情很是悲憤。在和陳昌浩談話時，我很氣憤地問他：你作為總政治部主任，難道連自己的秘書長都不救，對張國燶的家長制、軍閥作風就熟視無睹，任聽他這樣橫行霸道下去，你的黨性何在。陳昌浩無言以對，只好告辭。

事後，毛澤東知道了，對周恩來說：博古是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但是張國燶、陳昌浩對我的反感大了。7月18日，政治局又在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會議，張國燶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工作」。最後張國燶的權力之爭，得到了周恩來的讓步，把紅軍「總政委」職讓給了張國燶。還發佈了軍委命令：「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由朱德兼總司令，張國燶任總政委，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

但張國燶仍不滿意，堅持要任軍委主席，由陳昌浩任總政委，徐向前任副總司令。於是8月4日到6日，在毛兒蓋

的沙窩又開了一天政治局會議，最後我決定讓出總政治部主任由陳昌浩兼任。並成立前敵指揮部，徐向前兼任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這樣總算勉強擺平，使張國燾不再爭職位，同意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

為此，8月19日毛澤東又提議開了個政治局常委會，目的是把幾個常委團結到一起。會議開得很短，主要由毛澤東談了如何對待張國燾錯誤的方針問題，接著常委分工，張聞天管組織（李維漢副職），毛澤東管軍事，我負責宣傳，周恩來幫助毛澤東管軍事並兼任一方面軍司令與政委。至此，毛正周副，就明確定下來了。

1935年9月10日，張國燶以紅軍總司令部名義，發電給前敵總指揮部，命令陳昌浩、徐向前率右路軍南下，在大金川北端的黨壩與左路軍會師，再決定去向。前敵總指揮部收到電令後交給了參謀長葉劍英，葉立刻報告了毛澤東，毛意識到萬一中央被四軍和三十軍夾持南下，則今後永遠得聽張國燶擺佈，中央將成為「漢獻帝」了。於是立即在周恩來住處開了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連夜率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此時，陳昌浩看了張國燶的電令後，與徐向前商議了一下，決定找張聞天報告，結果挨了一頓批評。這時陳昌浩決定執行總司令部命令，南下，徐也同意。

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思來想去，不想讓四軍和三十軍走，想把這二支隊伍拉進一方面軍裡，最後下了決心去找徐向前，已是晚上掌燈時分了。毛來到徐向前住的院子，見徐在納涼，毛問徐願意不願意跟一方面軍走，好話說了一籮筐。徐回答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現在方面軍執意北上，四方面軍執意南下，中央政治局解決不了的事，我徐向前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是四方面軍的人，我不能讓四方面軍因為中央領導意見不一致而肢解。你和張主席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分歧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解決，不能來做我的工作，讓四方面軍解體。毛聽了很生氣，氣呼呼

地回來了。我和周恩來在周住處聽消息，毛澤東說，張國燾的山頭好硬，陳昌浩、徐向前都是張國燾的心腹臂膀，鐵了心跟隨張國燾了。他說我是想肢解四方面軍，我倒希望他不會成為第二個黃仲岳。徐向前不走，我們得快走，免得夜長夢多，發生變故，今晚就走。於是在午夜時分，中央機關緊隨三軍團趕往一軍團駐地俄界，向甘南挺進。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在10月2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研究與陝甘邊紅軍會師後，成立蘇維埃政府，組建政權的問題時，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1934年博古沒有殺我，叫我當蘇維埃政府主席，五中全會又提名我當政治局委員，禮尚往來麼，這次成立蘇維埃政府，理應由博古任主席。周恩來拍手贊成。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成立西北中央局和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及中共中央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西北軍委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我被任命為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從這些跡象看，毛澤東今後不會太為難我。

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陝北前往南京。以後博古和潘漢年之間，除了公務，再沒有私交了。

第七章

寧都起義後的季黃冤案

決定西路軍命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李特、黃超遇害

李先念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



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因戰略方向發生分歧，毛澤東主張北上，張國焘要南下，任總指揮的徐向前不僅沒有聽從毛澤東的勸說，還指責毛想肢解四方面軍。當時毛澤東曾對博古、周恩來說：希望徐向前不要成為第二個黃仲岳。這次徐向前沒有聽毛澤東的話，犯下他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

毛澤東這裡提到的黃仲岳，是1931年寧都起義的領導人之一。1932年黃仲岳和另一個領導人季振同因被懷疑反對毛澤東而被判刑，後被秘密處死。這是一起冤案，直到文革之後才平反。

長征後期，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發生的由陳昌浩、徐向前領導的西路軍二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敵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徐向前語）。這次失敗的責任在中共歷史上歷來是算在「張國焘路線」的賬上。直到90年代，曾經自領導西路軍的徐向前、李先念同志才說出了歷史的真相。西路軍當年是奉中央的決定，至始至終都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領導之下的。後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共最新的黨史也正式承認了這一歷史事實。

寧都起義後的季黃冤案

1931年12月14日下午七時，國民黨十六路軍在趙博生（二十六路軍參謀長、共產黨員）、董振堂（七十二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旅長）、黃仲岳（七十四旅第一團團長）的領導下，在江西寧都起義，參加紅軍，震驚了國民黨朝野。

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的主力部隊，季振同是西北軍裡有名的虎將，有一身好武藝，好槍法，曾是馮玉祥的貼身衛隊團團長，後被提昇為馮玉祥的王牌旅手槍旅的旅長。這個旅裝備精良堪稱一流，每個士兵都配置有二個大件，手槍、衝鋒槍、馬刀及五顆手榴彈。馮玉祥視這個旅為「命根子」，愛護有加，對季振同也特別青睞，介紹自己的侄女劉玉芝給季振同為妻。季在手槍旅任職期間，治軍有方，用公道，不問親疏，只重有才，致使許多軍中精英都願意投入他的麾下，黃仲岳就是其中之一。黃為人正直，性格豪爽，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深受士兵愛戴，後季與黃結拜「金蘭」，情同手足，並被委任為手槍旅第一團團長，兩人友愛深厚是不可分割的摯友。

起義的四個旅二個團和總指揮部、師部共一萬八千餘人。1931年12月6日，中央軍委授予「中國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任命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仲岳任十五軍軍長。並任命肖勁光為軍團政委，左權為十五軍政委。隨後，這支部隊參加了漳州戰役。

黃仲岳的紅十五軍，即原國黨二十六路軍的手槍旅，在漳州戰役中，攻小池、打龍岩、戰天岩、圍靖城，英勇頑強，所向披靡。193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漳州城芝山紅樓接見了黃仲岳、左權，毛對黃的豪爽性格十分喜歡，更對手槍旅情有獨鍾。當晚毛與朱德、林彪、王稼祥、劉伯堅商議重編紅一、三、五軍團。4月22日報周恩來批准。4月25日，周恩來、彭德懷、譚震林、葉劍英等來到江口，由朱德主持開了「江口軍委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的提案，把紅五軍團一分為二：十五軍劃歸一軍團，十四軍畫歸三軍團，十三軍和原紅一軍團的紅三軍組成五軍團，季振同仍為五軍團總指揮。

會後朱德找季傳達會議決定，季當即表示不同意這樣

分割紅五軍團，特別是不同意把黃仲岳和十五軍調離紅五軍團，但朱德強調季已經入黨，黨員應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季心裡很不是滋味，心緒不佳，回到指揮部，口出怨言，牢騷滿腹，向政委肖勁光提出，請中央軍委考慮，能否將十一軍與十五軍調換一下。肖勁光報告毛澤東，毛生氣地說「十五軍現在是共產黨的軍隊，不是從前的手槍旅聽由季振同調遣」。季得知後，一時氣話：「這紅五軍團的總指揮我也不想幹了，我請求組織允許我去蘇聯學習」。肖隨即向蘇區中央局發報，報告了季的要求。4月28日接周恩來復電，同意季的出國學習要求，具體行程聽候安排。

正在這時候，在南京的馮玉祥^①派劉驥（原西北軍參謀長）來到中央蘇區會見了劉伯堅（曾任西北軍總政治部主任，現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要求見季振同，把馮玉祥的親筆信給他。劉請示周恩來後，同意劉驥與季振同會晤。劉把馮玉祥的信交給季振同，內容是馮要季隨他一起去華北抗日前線組織一支隊伍，召集舊部，聯合吉鴻昌、方振武等抗日隊伍，一起與日軍作戰，收復失地。季因跟隨馮多年，感情甚篤，何況是抗日大事，不忍拒絕。但季向劉驥表明，自己現在已經參加紅軍，不經蘇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批准，私自離隊是不行的，何況現在中央軍委已批准自己去蘇聯學習，不日就要起程，請馮大帥原諒。劉又找周恩來，周未同意。劉驥無奈，回南京復命。馮玉祥心不死，找到了宋慶齡，宋又託人找到了博古，博古認為這是支持抗日，蘇區中央局理應同意。於5月3日發報給周恩來，讓季振同速來上海到中央組織部報到。

①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馮玉祥積極主張抗日，受到人民擁護，12月在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32年2月蔣介石任命他為內政部長，馮拒絕就職，想重新拉起一支隊伍，到華北前線抗擊日寇。

5月2日，紅五軍團總指揮部由肖勁光主持，為季總指揮去蘇聯學習，開歡送會。3日，季將青鬃馬留給了肖，望遠鏡送給了劉，槍也交了，什麼也沒帶，只帶了一個馬弁，一個保鏢，一個小手提箱，就上路了，打算經瑞金、長汀到汀頭，乘船去上海，再由臨時中央安排去莫斯科。季走後，由董振堂接任紅五軍團總指揮。

可是就在這一天，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調季振同的電報後，任弼時頓感此事不妙，立即與毛澤東通話，毛不同意放季走，認為季對二十六路軍起義後，被紅軍分割很有意見，而且這次分割，事先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他到中央後必定要狀告毛澤東，要是被馮玉祥知道，必然會敗壞紅軍的聲譽，對今後的兵運工作帶來困難。怎麼辦？把肖勁光找來起研究，肖反映在紅五軍團「重編」後，季曾口出怨言，發牢騷，罵毛澤東，還和黃仲岳兩人喝離別酒，抱頭痛哭，並把季交給他的馮玉祥來信也拿出來讓大家看。隨即，毛澤東給國家保衛局的李克農通了電話。

1932年5月5日，中央蘇區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突然駕到正在漳州休整的紅十五軍駐地，將軍長黃仲岳、參謀長肖世俊逮捕了。兩天後，即5月8日，保衛局又在長汀，將季振同逮捕。5月10日，蘇區中央局向臨時中央報告，稱「查季振同、黃仲岳、肖世俊密謀反水，現已被逮捕，不日將公審」。簽名是周恩來。

1932年8月3日，在瑞金葉坪中央政府大廳審訊了「季黃反革命案」，公訴人是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原告是紅五軍團政委肖勁光。開庭後鄧發指控季、黃「參加寧都起義是投機的」、「隱藏著再做軍閥夢，企圖策動部隊投靠馮玉祥，和馮的使者劉驥有勾結」，「對共產黨的領導是陽奉陰違，口出怨言，煽動部隊情緒」……。季、黃再據理辯駁，但臨時最高法庭還是「完全同意」原告和公訴人的起訴書，判決季、黃「死刑」。

判決書送到蘇維埃中央政府負責司法的副主席項英審批時，項英堅決不同意判「死刑」，在判決書上批示「季、黃等均是參加了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現二人雖為此案主謀者，但曾為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應減刑免死，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

這樣，季、黃被監禁，最終還是被秘密殺害了。

蘇區中央局就是這樣對待臨時中央的調令，造成一樁大冤案。

光陰如梭，到了1972年6月，周恩來在批林整風中，談到了季、黃被害之事，他說：五軍團兩個暴動過來的非黨人士季振同、黃仲岳，在寧都起義中起了關鍵作用，肅反時外面有謠傳，說這兩個人不安心，想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我同意將他們逮捕，結果處死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季、黃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中共國民參政員博古（左二）、鄧穎超（左三）、林伯渠（左四）由西安飛抵重慶，熊瑾玎（右一）、錢之光（中戴禮帽者）、邊章伍（左一）到機場歡迎。

決定西路軍命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按照毛澤東的計劃，四方面軍的五個軍被分成兩部分，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三個軍（九軍、五軍、二十軍）在黃河西岸，其中只有一個主力軍三十軍。另外一個主力軍陳再道的四軍及三十一軍留在東岸，1936年11月初，在保安毛澤東住的窯洞裡，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一次會。^②

毛澤東用了個十分簡短的開場白，把陝甘寧根據地面臨的處境，做了通報，毛說：現在我們周圍有蔣介石260個團，所有槍口都瞄準我們，而蔣介石向緩遠抗日前線只調了湯恩伯的八個團，裝裝樣子，蔣介石提出的和談，實質是想收編我們的紅軍。陳立夫向潘漢年提出，紅軍只准保留三千人，師長以上的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按才錄用，這不是明擺著是「假和談真收編」嗎？可見蔣介石不論是「打」，還是「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一心想消滅我們，反共重於抗日。我們怎麼辦？我看兩條，一條是繼續「逼蔣抗日」，文、武兩手交替使用，談判桌上談不攏就武的來一下，告訴彭德懷，抓住機會敲胡宗南一下狠的，另一條是「機動靈活」，敵人用這麼大的陣勢包圍我們，死守硬拼不行，我還是那個老主意，隨時準備脫離這塊地方，跳出去，轉移到外線，到敵人後方去建立抗日根據地。

冬天來了，很大一部分戰士還沒有棉衣。現在一、二、四方面軍加起來十多萬人，陝甘寧邊區缺糧，養不起，吃飯問題火燒眉毛，怎麼解決。部隊武器彈藥不足，有的部隊擴充快，五個戰士平均只有三條半槍，一個營只有兩挺機槍，每人只有五發子彈，這個仗怎麼打，我看解決這些問題，只

② 關於西路軍的詳情，可參看徐向前著《徐向前回憶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7，原立是著《血色黎明——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實》，香港金陵書社出版公司2002。

有一個辦法，轉移到敵後去，撿敵人軟弱地方打開局面，向敵人要，要吃要穿要武器子彈，還可以籌糧籌款搞擴紅，支持抗日，歸根結底一句話，我們要作戰略大修改，原來制定的「寧夏戰役、接通蘇聯」的計劃要改變，要放棄，不向蘇聯伸手，改為向敵人奪取。

打通國際通道，取得蘇聯援助，好是好，但不是一年半載能辦到的事，遠水解決不了近渴，要下決心放棄，把兵力撤回來。你們有什麼高見？

會議一片沉默，幾個人有點吃驚，都不吭氣。

博古說：我提個問題，主席多次說過，國際指示我們要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寧夏戰役正是為了執行這一指示而進行的一場至關重要的戰鬥，現在陳昌浩、徐向前已經拿下景泰地區，攻取寧夏的條件已經成熟。彭德懷的前指在豫旺，那裡有二、四方面軍的四個軍，還有二方面軍主力，隨時可以揮師寧夏。張學良也多次表示願意同我們一道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現在要放棄「寧夏戰役」，豈不是前功盡棄，把河東的彭德懷「前指」撤回，豈不把河西的三個軍孤立在那裡，任敵人宰割嗎？

毛澤東環視了一下參加會議的每個人，然後板起臉說：還有哪位同志會像博古同志這樣想問題的？洛甫同志，你也這樣想嗎！

張聞天急忙回答：先聽大家的，聽大家的。

停了一會，周恩來發言：當初制定寧夏戰役計劃，是為了接通國際路線，而眼前的任務已經不僅僅是這些了，共產黨無法迴避抗日的事實，全國人民在看著我們呢，如果我們把部隊集中在甘北，去實現「寧夏戰役，接通蘇聯」的計劃，即使半年內我們能進入寧夏，能接通蘇聯，但卻離前線越來越遠，全國人民怎樣看我們呢？

主席說我們不要老是只用一個拳頭打人，老是蹲在個地方生蛋，要學會左右開弓，兩個拳頭打人，還要學會利

用腳踢，現在我們一個拳頭是「逼蔣抗日」，另一個拳頭是「跳出去，到敵人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

最近張學良和我們有接觸，我認為張學良是位正人君子，他提議讓我們的部隊退到安定、靖邊一線，為的是向蔣介石證明共產黨確有聯合抗日的誠意，而他也就有了說服蔣介石聯合抗日的強硬理由。至於對我們安全來說，退和不退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因為如果張學良的部隊按兵不動，蔣介石光靠胡宗南、關麟徵這二支部隊，想來「剿滅」我們在河東的一、二、四方面軍的部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為了抗日大局，我已經下令河東部隊撤退了。現在留在河西的部隊，有陳昌浩、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總部和下轄的三個軍、一個騎兵師、一個婦女獨立團，約二萬一千多人。我意見成立西路軍，獨立作戰，任務麼——

毛澤東插話：我看河西部隊有兩個作用，一是繼續打通國際路線，打寧夏兵力不足，可以從甘肅打過去接通新疆，新疆的督辦盛世才正在和蘇聯拉關係，蘇聯已經答應供應他物資，並準備在新疆設領事館，打通新疆關鍵在對付河西走廊的二馬（馬鴻逵、馬步芳），我相信陳昌浩、徐向前的三個軍，對付「二馬」還是有能力的。二是河西部隊可以選擇合適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作為一個釘子釘在河西，看准機會就敲蔣介石一下，使我們在南京的談判增加一個有力的籌碼。這兩個作用可以交替使用，談判緊的時候，蔣介石硬，我們就停下來做出要向甘南進逼的樣子，談判鬆了，蔣介石軟下來，我們就向新疆進軍。

周恩來繼續說：除了西路軍，我們還要組建南路軍和北路軍，南路軍將由一、二方面軍組成，從予明堡前線直插隴東的鎮原、西峰、合水帶，取寧縣、正寧之後，立亥向東嵌進陝西腹地，抽一部分兵力南抵淳化，而主力則橫向洛川、宜君，在韓城、宜川一線，臨黃河而伺機東渡。

北路軍由留在河東的四方面軍（四軍、二十一軍）組

成，先在寧夏的靈武、鹽池一帶待機，等綏遠抗戰事發，即經安邊向橫山、榆林發展，最後集結延長、綏德、清澗一線，準備渡河入晉，東征抗日。若受阻便佔領同浦鐵路，再受阻則出至冀豫晉之交，轉而從直魯豫之交渡黃河，轉這一圈，我們估計大致需要兩年時間。

在這兩年裡，河西的西路軍就孤立無援了，不過應當相信我們的指戰員，相信黨派到那裡的領導同志，向前、昌浩、卓然、傳六、義齋等都是我黨久經考驗的領導人，在西小的那段艱苦的日子裡，他們也都闖過來了，我們都比較瞭解他們，對他們的人品和對黨的忠誠是不會有異議的，所以我們完全相信他們能儘早儘快的開通國際路線，並力爭在河西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



1937年，中共代表博古（左五）、鄧穎超（左一）、劉英（左六），劉群先、蔡樹蕃、任泊生等在西安。

毛澤東說 恩來，應當電詢陳昌浩、徐向前，是否有能力把握通過河西走廊打通國際路線，另外再問問他們必要時，趁黃河封凍，返回河東是否有困難，我們還是要關心他

們的嘛。

最後，毛澤東說：我建議表決吧，把表決結果，通知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政委，行動命令還得由他們兩人簽發，總司令部應該儘快返回保安。

表決順利通過，沒有人再提反對意見。也許有人還有憂慮，但沒有說出來。

毛澤東站起來說了一段話，耐人尋味。毛說：漢高祖劉邦揭竿而起的時候，人馬不過數百，而他也只是項羽手下的一員偏將，但他會利用矛盾，會利用機遇，善於謀略，因此他奪得天下，而項羽只落得烏江自刎，我們現在不也是這樣嗎？一時之強是逞不得的。

這次會議決定成立「西路軍」，而且也決定了「西路軍」的命運。

博古回到住處，忽然想起一年多前，一、四方面軍草地分手的那一天夜裡，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話「不要成為第二個黃仲岳」，不禁不寒而慄。

李特、黃超遇害

1937年11月14日，蘇聯派了一架專機和負責護送的顧問，把王明夫婦、康生夫婦、陳雲、曾生、騰代遠等一行16人護送回國。途經迪化飛機場加油，王明要察看蘇聯援華物資的過境情況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在迪化停留了一週。就在這週裡發生了一件令人髮指的殘忍事件，而且迄今沒有昭雪平反。

事情發生在八路軍在迪化的辦事處下屬的西路軍集訓隊的李特、黃超身上。當時西路軍餘部四百多人，聚集在這裡進行整訓（學習），李特、黃超都是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李特原是西路軍參謀長，黃超原是五軍政治委員。他們

兩人，因對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揮不滿，對西路軍一萬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在了馬賊的刀槍之下，心存義憤，沒有和李先念商量就自作主張，前去蘇聯領事館找王明反映情況。結果康生接見了他們。康生得知他們是狀告毛澤東，理由是：一、既然成立西路軍是去完成共產國際交給的接通蘇聯的任務，就應貫徹始終的去支持西路軍去完成。然而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卻出爾反爾，瞎指揮，命令西路軍走走停停，忽東忽西，任憑敵人圍攻而不准移動。二、為什麼西路軍的指揮權，毛澤東不給西路軍，而是在千里之外遙控西路軍，使西路軍在敵人的槍口下，涮來涮去，像一頭昏了頭的野牛，在河西走廊裡東突西撞，最後被敵人給宰了。兩萬多弟兄死得好慘，沒有人為他們的冤魂說話呀。期望中共駐國際代表團能為我們說句公道話，能向國際執委會反映這件事，毛澤東應該負責任地下臺。

康生聽罷不動聲色，請兩人稍坐，說去請王明。其實他出了房間，立即找到蘇聯專程送王明回國的顧問，說有兩名刺客要暗殺王明，被他哄住了，就在他的房間等待王明。蘇聯顧問聽急了，急忙報告領事，領事與盛世才通了電話，盛當即下令領事館衛兵就地處理。盛世才的處理辦法就是把兩人裝入麻袋裡，然後運回總督辦公室的地下室裡，幾天後就如同活埋一樣，死在麻袋裡了。

李特、黃超失蹤了，八路軍辦事處全力尋找沒有結果。發生刺客事件後，李先念從西路軍中抽出了一個警衛班，由曾任四方面軍總部參謀的張懷禮當班長，帶領八名戰士擔任王明等人的保衛工作。後來張懷禮給王明當了隨身副官，巴方廷給王明當了警衛員，鮮克德給陳雲當了警衛員，其他人分別給康生、騰代遠等當了警衛員。

1937年12月下旬，李先念回到延安後，遇到張懷禮，張告訴李先念：李特、黃超二人是康生殺害的，並講了事情經過。但因為李、黃二人是狀告毛澤東，所以李先念也沒聲張。此事就這樣沉寂下去了。

康生這個人，在莫斯科時一直是王明的副手，對王明是畢恭畢敬，頂禮膜拜，極端崇拜。可是回到延安後就判若兩人，他要「擇木而棲」了。他向軍委毛主席彙報了在迪化果斷處理了對毛不滿，要毛下臺的李、黃二人，並提出現在延安開展的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運動火候不夠，要加強領導，毛澤東聽了很滿意，對康生印象很好，從此刮目相看。

接著毛任命康生為中央社會部部長，並委派康生參加對「張國燾路線」鬥爭的領導小組。

李先念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

延安開展的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主流是好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場運動，使廣大幹部、部隊指戰員更進一步地團結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周圍，為完成抗日救國的新任務而奮鬥。但是缺點也很明顯。一是沒有實事求是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具體分析，也沒有把張國燾個人的錯誤與四方面軍的功過分開。比如西路軍的行動本是中央直接指揮的，卻被說成是「張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而且「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波及面過寬，使一批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受到不應有的傷害。對紅四方面軍英勇鬥爭的歷史，缺乏積極的評價，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使不少四方面軍的幹部心情不舒暢，私下裡有很多不滿的議論，違背了開展運動的初衷。二是沒有認真細緻地做好張國燾本人的思想工作。應該給張國燾說話的機會，誠心誠意地幫助他分析錯誤。黨的主要領導人也應主動檢查在處理川西問題上的方式方法存在著缺點，只有這樣才能「治病救人」；三是沒有真誠地對待四方面軍幹部，沒有一分為的正確看待歷史，分析產生錯誤的主客觀因素，而是一味地上綱上線，甚至把正確的東西也說成是錯誤。比如撤出鄂豫皖的問題。這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

人逼著撤出的，是保存紅軍實力的正確行動，卻被說成是逃跑主義，給中央蘇區的左傾領導推行戰略大轉移，提供了口實，又說四方面軍的幹部只知山頭不知中央，這話打擊面太寬。四方面軍幹部絕大部分是好的，組織觀念很強，對中央是很尊重的，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對黨都是懷有濃厚感情的。這次「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大家的感情。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回到延安。他在同四方面軍的一些戰友、老部下的接觸中，深感問題的嚴重性，他對四方面軍的同志，強調要以大局為重，注重維護黨的團結，同時也認為中央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四方面軍的幹部，對於維護黨的團結是至關重要的。為此，他向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求直接晉見毛澤東。

出乎意料的是毛澤東很快接見了他，而且三言兩語就把李先念心中的氣惱和意見，化解得煙消雲散了。

毛澤東說：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能代表四方面軍，代表西路軍的人，來找我交換意見。把四方面軍、西路軍的幹部、戰士憋在心裡的話都說出來。現在四方面軍是群龍無首，也不是個辦法。張國燾不行了，只能改行做行政工作了。陳昌浩身體不行，去莫斯科治病了。昨天中央辦公廳告訴我，你想來見我，我高興極了。可惜徐向前沒有來，現在你來了很好麼。我一向反對山頭主義，但我也不主張消滅山頭。可是有一條，哪個山頭都必須服從中央指揮，聽從中央調遣。山頭利益必須服從中央利益，一切要以大局為重。這次西路軍在服從中央指揮上是經受住了考驗，用行動證明西路軍確實糾正了四方面軍過草地時，鬧分裂、不聽中央指揮，調頭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

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武裝鬥爭，死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西路軍孤軍奮戰了五個月，犧牲了兩萬多人，代價是大了些。當初你們放棄鄂豫皖根據地，逃跑到川北，一路上不也犧牲了一萬多人嘛。西路軍是為了顧全大局做出了犧牲，而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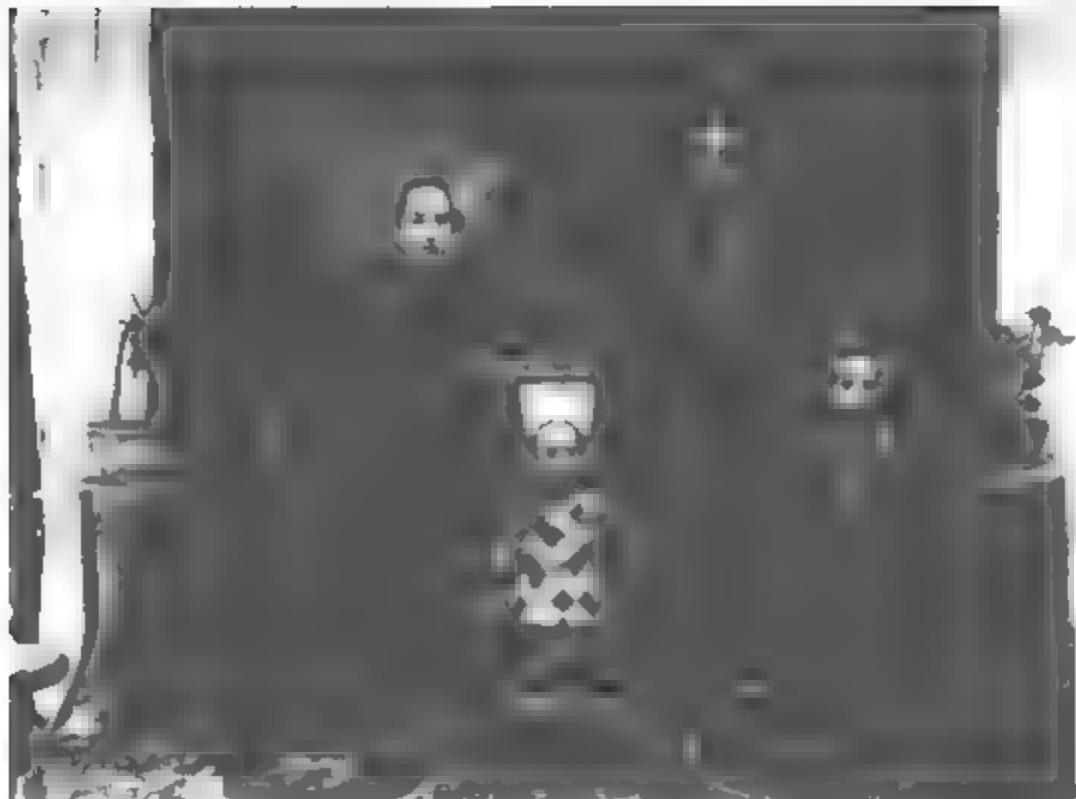
鄂豫皖根據地，逃跑到川北，是為了山頭利益而犧牲的，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李先念不同意毛澤東的「放棄鄂豫皖是山頭利益」的說法，直言不諱地說：主席，關於撤出鄂豫皖的問題，我剛回到延安時就聽有人說，撤出鄂豫皖不對。我當時在紅十師當政委，對當時的情況是比較清楚的。鄂豫皖離蔣介石的大本營南京那麼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所以第四次「圍剿」，蔣介石親自坐鎮武漢，調集重兵，專門對付鄂豫皖紅軍。我們打了幾仗，頂不住，在根據地周圍轉了一大圈，地盤大都喪失了，沒有周旋的餘地。加上那時根據地男女老少都動員去參軍和支前，把田地都荒蕪了，吃成了大問題，所以不得不退出，不退出部隊沒法生存。這是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體決定的，不是一個人主觀決定的。原本我們還想打回去，可是敵人重兵追堵，只好往西走，走一步看一步，這樣才到了川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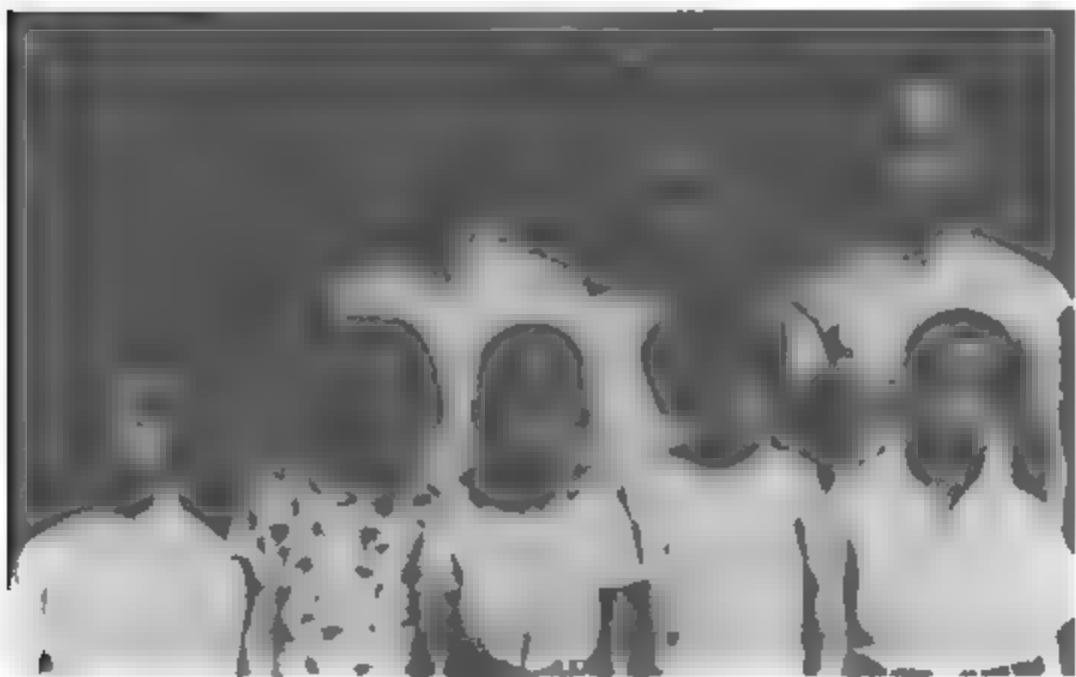
在川北、川西和四川軍閥的鬥爭中，四方面軍有了很大的發展。二河口會師前部隊已擴大到八萬人，是為革命積蓄了力量，不能狹隘地說成是山頭利益。至於張國燾有野心，有領袖慾，想依靠人多勢眾對抗中央，那是他個人的事，與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無關。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戰士是擁護中央的，聽從中央的。

毛澤東聽後表示理解，並說，看來鄂豫皖是不撤不行囉。

接著毛澤東對李先念說：過去的事情讓史學家去評說吧，眼下要緊的是四方面軍這個攤子得有人來收拾。一個是軍隊，一個是地方部隊，我看軍隊就交給徐向前，你負責找徐說一下，我已經跟中央組織部交代了。地方部隊就交給你。看來你還得去鄂豫皖地區，那裡地方部隊發展還挺快，得統一領導。



秦邦憲（博古）和父親秦聲煊、母親朱阿菊、
弟秦邦禮（楊琳）（左一）、妹秦邦范（中）



1939年劉群先赴蘇前在香港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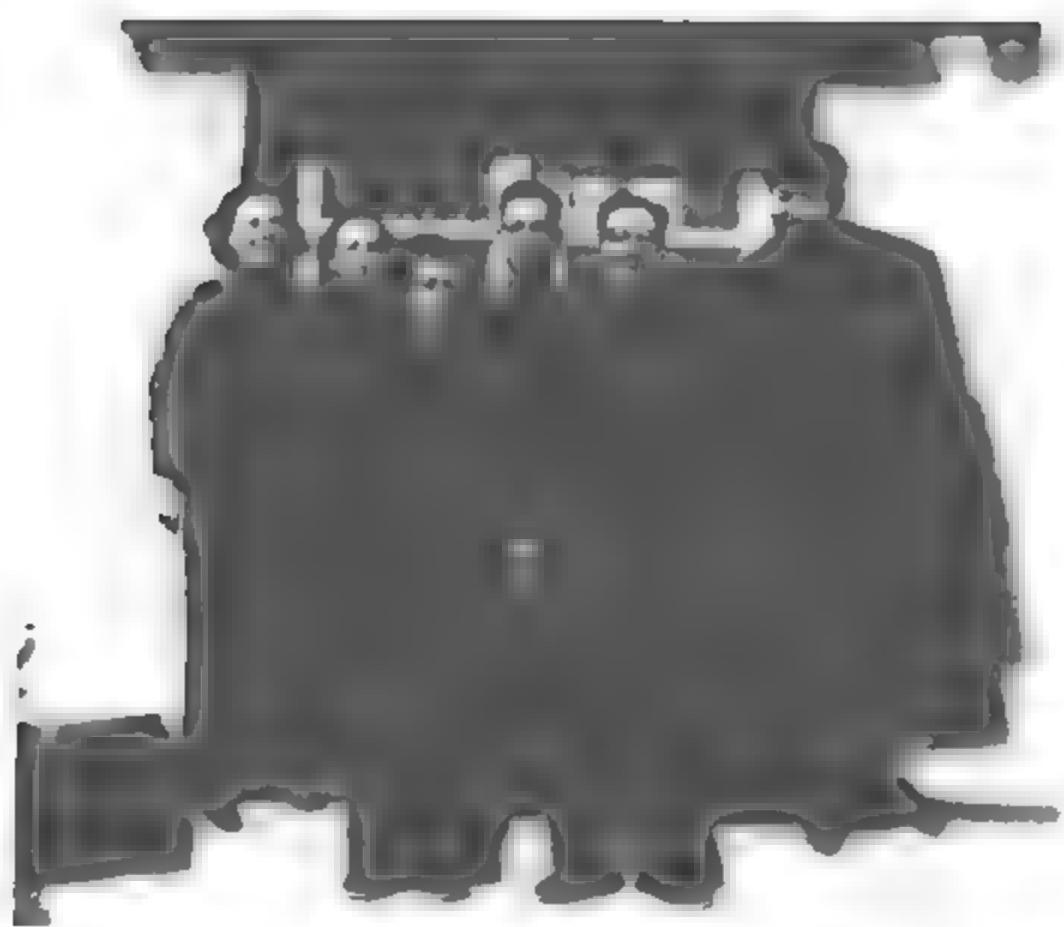
後排右起博古的妹妹秦邦范、夫人劉群先、博古的母親朱阿菊、楊琳的夫人王靜雅，前排左起大秦鋼（阿土，博古的大兒子）、秦文（楊琳的女兒）、秦明（楊琳的兒子）、王家湘（秦邦范的女兒）、秦福銓（本書作者）。



1937年秦邦禮（楊琳）一家在上海
夫人王靜雅、大兒子秦福銓、女兒秦文、小兒子秦明



博古、張越霞和孩子們秦鋼、秦新華、秦鐵 1943年
延安清涼山，這是博古和孩子們唯一的一張照片。



張越震（左一）、蔡邦范（左二）、黃美姻（左三）、楊琳（右二）

一、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

二、秦邦憲（博古）簡介

三、劉群先簡介

四、張越霞簡介

五、秦邦禮（楊琳）簡介

六、潘漢年簡介

七、嚴模簡介

八、有關「故事」來源的說明

附錄一：

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①

（1943年）

一、路線問題

前後兩個時期路線是錯誤的。錯誤所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勝計的。我個人在上面是負著重大責任的，尤其是內戰時期。

我不想推諉責任，但是基本的路線是（共產）國際路線。文件猶在，當可作證。國際為米夫匪幫所盤踞，當時我及全黨，甚至聯共都是不知道的。而七大前的國際是集中的組織，決議指示是必須執行的。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於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至於路線錯誤的性質及內容，前昨兩天會上，我已經說了，不再多贅。

二、宗派問題

如果對宗派瞭解為思想方法生活習慣上相近，互相接近，臭味相投，聲氣相通的一群，這一群在某個時候，曾在

① 本文原見博古延安時期的筆記手稿。

首次公開發表於黎辛、朱鴻召主編，《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學林出版社2005，有兩處人名隱去。

第一次發表於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秦邦憲（博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該書刪去（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兩字在上海時未聽見的，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說過。）一段文字。

此次發表是全文。該文是博古為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風擴大會議準備的發言提綱。

組織上反對另一群（莫斯科及反立三路線），那麼，宗派是有的。如果，對宗派瞭解為陰謀集團，或更甚瞭解為反革命集團，自覺的破壞黨，破壞革命，我認為是沒有的。我認為「米夫宗派」，是這個宗派在思想意識上，內戰時期的路線上，受米夫影響的一群。而絕非是米夫的反革命組織，亦絕非是在私人關係上都與米夫親密的。米夫的思想路線之所以能影響他們，主要還是依靠（共產）國際，通過（共產）國際的指示與決議。我自己如此，多數被疑為教條宗派者亦如此。至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我第一次在上海社會新聞上才看到。宗派的問題實質如比。就我和稼祥、洛甫等人的相互關係上，遵義王、洛堅決反對我。東征時王、我反對洛，亦可佐證。

三、我與米夫關係

米夫是孫大校長，我是學生，只有師生關係。聽說當時米夫宴請一些人吃飯，^②但我決未被邀請一次。回國時，他是東方部的負責者，經過他派我們，但據我記憶所及絕未給我們什麼任務。要我到菲律賓去送一指示（內容不詳），我因英文不好拒絕了。至於為什麼要我們走西歐，我是不知道其緣故的。可能是（1）中東路戰爭後，當時路線不通，（2）菲律賓去。我與米夫關係，僅此而已，決非其他任何關係。回國以後，從未再見米夫一次。

四、我與李德關係

與李德認識是經當時（1932年秋冬）遠東局負責者愛佛爾托介紹，他進入蘇區是遠東局有電，派來當軍事顧問的。愛佛爾托曾是德國調和派領袖，由於這而被捕，甚堅決。1938年在重慶見《評論與新聞》（前名《國際通訊》）

② 手稿上此處兩個字辨認不清，用兩個□代替。

上（共產）國際發動營救運動。至於李德，據恩來回國報告，國際監委給以最後嚴重警告。以後兩人情況不知。李德在中央蘇區越權，我放縱其越權，這是嚴重錯誤，應受黨的處分。但我和他的關係，決無任何其他關係。

五、「篡黨」問題

上海黨中央問題：是王、周決定組織臨時政治局（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兩字在上海時未聽見的，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說過），在我家通知我組織新政治局，因他們要走，後來酒店開會，因盧福坦要做總書記，主要談無總書記問題。「授」「受」雙方在組織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認。

蘇區改組問題：在上海時曾與愛佛爾托商量，進蘇區後如何工作，請示過關於毛主席工作問題。愛云：要儘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線必須貫徹，領導機關不可成討論俱樂部。進蘇區後在葉坪開會時，我曾推弼時負總責，多數推我。我承認中央進蘇區，國際電示後，未請示如何組織，及到中央蘇區時自以為中央過去了，承擔負總責是錯誤的。

五中全會召開是遠東局有電提議，並送來政治決議草案的。五中全會所選的政治局及書記處名單，是經國際批准並有增減的。政治局四人未經中委選舉手續，及中央委員補得太多，是錯誤的。因此，不僅政治路線錯誤的責任上，而且組織手續的不合上，我均應撤中委。

六、與王明及洛甫等關係

我與王明曾在上海一起反對立路線及「中全會」，與稼祥亦善。與洛甫在上海、中央蘇區等一起工作過，與恩來共同工作較長，中（央蘇）區、長征前期、武漢、重慶。與尚昆生活上較接近，工作上則接觸較少，除瓦窯堡信外，私人通信極少。與羅邁在中（央蘇）區才認識，用他做組織局

長是錯的，工作上受了許多損害。總之，與這些人以及任何其他同志除同志及工作關係外，絕無其他關係。彼此向隅或發發牢騷，說說小話有之，任何陰謀絕無。

七、至於國民黨

除 1925 年，當它還是革命的時期，我曾在共產黨佔多數的上海市黨部工作過外，則只有此次奉黨令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外，我始終堅決反對國民黨和它做生死的鬥爭。

這次討論是為弄清路線問題，求得教訓，教育全黨。平心靜氣的討論，徹底的揭發錯誤，實在是必要的。錯誤甚大，惡果甚大，氣憤當難避免，但是如昨天彭真、康生等的提法，我以為是對一個共產黨員的誣衊，是不能忍受的。

這些話，在目前已經造成的空氣中是不入耳的，在個人說法，在重大的錯誤與惡果前，亦是多餘的。但是為辯明是非之計，不能不說。為個人的清白計，不能不說。

八、入黨問題

我是 1925 年 10 月在上海大學時，由顧谷宜介紹，經組織談話，由顧告我已批准，並要我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工作。搬至市黨部後參加第一次會，支書是楊電龍，參加人是張然和，支部是上海市黨部的黨員支部，支部生活是不健全的，會議個把月才開一次。除支部會外，我記得還參加過幾次活動分子會，聽講上海罷工，國民黨中各階級等報告。

九、肅反問題

各蘇區肅反的錯誤，在於政治路線之左，因之發展到使許多幹部遭受摧殘，這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要負責的。也是我要負責的。但是必須堅決說，我及當時中央曾幾次糾正各地的肅反錯誤，絕沒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殺任何人。自我到中

(央蘇)區後，絕未使用保衛機關作黨內鬥爭的工具。中央蘇區後期肅反，在對地主富農是左的，但是絕未用來對於黨內幹部。

十、中央蘇區留人的問題

中央蘇區退出時，由於對形勢，游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的估計不足，至各級仍保存一套架子，由於這，留下了一批幹部：中央局書記項英、組織陳潭秋、宣傳秋白、軍事陳毅、政府何叔衡。其餘江西、曾山書記、福建汪金得、鄂贛劉伯堅，這些幹部以後遭受犧牲，這是我負責的。至於以下的去留決定，均羅邁負責處理。要聲明的即對這批人的處理，並無存心使他們遭受犧牲。但是正確的處理是應該帶出來的。

總之，政治路線的錯誤及由這個路線產生出來的惡果，我要負責的。接受一切從此而應得的政治的組織的結論。但是十多年來，我主觀上是忠實於黨和無產階級的事業的，絕對沒有一點自覺的破壞黨和革命的企圖，絕對與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團沒有任何關係。

附錄二：

秦邦憲（博古）簡介

秦邦憲（博古），字則民（1907~1946）。乳名長林，江蘇無錫人。參加革命後取名博古，並曾用伯虎、卜古等筆名發表文章。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907年6月24日（農曆5月14日）出生於浙江杭州。九歲喪父，家境貧寒。在秦氏公學接受啟蒙教育，後在無錫第二高等小學（現東林小學）學習。早年在無錫、蘇州從事學生運動。先後在《無錫新聞》、《錫報》、《錫鍾》、《無錫評論》等雜誌上發表過大量文章，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1925年9月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習。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秋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曾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幹事。1931年2月任共產主義青年團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31年4月任共青團團中央書記、1931年9月臨危受命任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負總責。193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總書記。1934年10月率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開始戰略大轉移。1935年1月，在遵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根據黨的需要離開了總書記崗位。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軍委委員、總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是中央紅軍長征時黨的核心領導之一。1935年9月，與毛澤東、張聞天一起做出中央紅軍落腳陝北的決策，10月與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一起長征到達陝北。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主席。1936年1月兼任新成立的西北辦事處外交部部長。1936年12月

「西安事變」爆發後，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前往西安，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193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同年6月參加國共兩黨廬山談判，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1938年任中共長江局委員、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在這期間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



2007年紀念博古誕辰百週年，
在江蘇無錫博古故居院內建立的博古雕像。

作、恢復和鞏固南方的黨組織、協助組建新四軍、營救被國民黨羈押的我黨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做出了重要貢獻。1941年後任《解放日報》社社長兼《新華通訊社》、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出版局主任。他是著名的翻譯家，翻譯的主要著作有：《蘇聯共產黨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論一元化歷史觀的發展》等書。校譯了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著作。在介紹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1945年4~6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46年2月作為中共代表團代表，赴重慶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4月8日與王若飛、葉挺、鄧發等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罹難，史稱「四·八」烈士。

博古的人生雖然短暫，卻悲壯與輝煌。五卅運動他熱血沸湯，憤然而起，反帝反軍閥；留學莫斯科，他勤奮學習，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白色恐怖他臨危受命，承擔起領導黨中央的重任；紅軍長征，他以大局為重，服從黨的決議，維護黨中央和紅軍的團結離開了總書記的崗位，堅決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活動做鬥爭；到陝北以後，領導了給劉志丹等同志的平反；西安事變發生，他肩負黨的使命，折衝樽俎，多方協調，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團結抗日局勢的形成；重建南方黨組織和組建新四軍，他彈精竭慮，嘔心瀝血，國共和平談判，他詞鋒銳利，堅持原則，有理、有利、有節進行鬥爭，領導創辦《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他身體力行忘我工作，翻譯馬列經典著作，他通宵達日，廢寢忘食，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的一生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尤其是為黨的新聞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革命思想、高貴品質、獻身精神和光輝業績將永遠銘記在人民的心中！

附錄三：



1928年劉群先在莫斯科

劉群先簡介

劉群先（1907~1941），博古夫人。1907年生，無錫劉潭村人。出生貧農，11歲進無錫協勤鐵工廠老闆家當童養媳，讀過三年書。1924年起，先後進無錫慶豐紡織廠、申新三廠、德興絲廠做工。她為人耿直，敢為工人爭權益，而深受工友們的喜愛與稱讚。1926年5月，她積極參加無錫絲廠女工總同盟罷工。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21日北伐軍抵錫，她任無錫總工會女工部部長，負責絲廠工會工作。同年6月被調往上海工作。不久，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年底參加第四屆世界勞工代表大會，會上結識秦邦憲。

1928年5月與秦邦憲（博古）在莫斯科結婚，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8年5月博古和劉群先在莫斯科的結婚照

1930年劉群先回國，在滬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1933年9月在江西中央蘇區任原職。翌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與鄧穎超、賀子珍等組成婦女隊，歷任紅一方面軍婦女隊隊長，幹部休養連工作組長。到陝北後繼任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她被美國名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譽為「中國傑出的女工領袖」。1937年12月任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副主任兼組織部長。1938年隨秦邦憲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工作，組織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委員會。1939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療。不幸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犧牲。

附錄四：



張越霞簡介

張越霞（1910~1979），浙江省浦江縣浦陽鎮人，博古夫人。曾用名張月霞。農民家庭出身。因家庭生活困難險些被賣做童養媳，後由哥哥供養上學。初級小學畢業後考入浦江縣高級小學，因思想進步，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926年任浦江縣蠶桑講習所教員，參加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大革命失敗後，192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回到家鄉參加黨的活動。1928年下半年到上海中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油印處，擔任油印、文書和內部交通等地下秘密工作。

1931年6月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後由共產黨領導的互濟會保釋出獄。1932年後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幹事。1934年11月再次被捕。在獄中參加絕食鬥爭，對難友和群眾做說服教育工作。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8月由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營救出獄，12月任中共長江局組織幹事。1938年4月至1940年12月任中共廣東

省委委員、省委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至1939年6月），1939年1~7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務委員兼省委秘書長。後調重慶任中共南方局組織部幹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領導下工作。1939年經組織批准和博古結婚，1940年12月隨丈夫博古回到延安，任延安陝北公學幹部處副處長、延安抗大幹部科科長等職。1942年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科科長，參與審查七大代表。1945年4~6月作為大後方代表團成員出席七大。解放戰爭時期，仍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參加保衛延安的鬥爭。後在河北省平山南莊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任土改工作隊負責人。1948年夏赴北平參加地下工作，參與北平和平解放和接管工作。1949年1月至1950年5月任中共北平市（1949年9月改稱北京）第四區區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私營企業局秘書室主任，為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後歷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處長、推銷局副局長、日用雜品局局長、物價局局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曾任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79年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附錄五：



秦邦禮（楊琳）簡介

秦邦禮（乳名松林，字正民），又名楊琳、楊廉安（1908~1968），1908年生於江蘇無錫。八歲喪父，家境貧寒，14歲到錢莊當學徒。1927年隨嚴樸在無錫搞農運，參加革命。1931年經嚴樸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進黨中央特科工作，在陳雲領導下，以公開的商人身份，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建立通往蘇區的秘密交通線。1935年隨陳雲，嚴樸赴莫斯科進東方大學，學習經濟管理，並協助嚴樸整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來往文件。1937年秋遵照陳雲指示，回到上海準備迎接中共代表團回國，後撤銷任務，於年底返回延安，在延安中央黨校教務處工作。1938年受陳雲派遣赴香港協助廖承志、潘漢年工作，開展商業活動，創建「聯和行」（華潤的前身）。1941年冬香港淪陷，按「重辦」指示撤離香港赴重慶，1942年夏初到達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指

示：「以桂為基地，開展商貿，供應邊區物資。」於是返回廣西，在桂林曲江開設商店，採購物資，當年就向重慶送貨六趟，12車。1944年廣西淪陷，撤退到八步，接「重辦」指示「利用合法，積蓄力量，向粵發展，在穗設店。」為此，大批收購桐油運至穗賣，再買輪胎運回梧州賣，以此積累資金，並恢復「聯和行」招牌，在廣州中山路開辦「天隆行」。抗戰勝利，1946年夏「重辦」遷往南京後，令楊琳赴滬接受任務，周恩來指示，返港建立外貿據點。1947年2月回到香港，恢復「聯和進出口公司」。隨著公司的發展，人員的增多，1948年初更名為「華潤公司」，任總經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中央成立香港貿易機構管理委員會，任貿管會主任，兼華潤公司董事長。1952年春回國，任外貿部第一局局長，1954年調任駐印尼商務參贊。1958年回國，任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1959年春國務院成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任總局長兼黨組書記。1960年總局昇格為「委員會」，任副主任，兼黨組書記。

文化大革命時在被隔離審查中，於1968年12月10日去世。醫院鑒定，楊琳的頭上、身上有傷，死於急性心肌梗死。頭上如何有傷，已成不解之謎。

1975年在周恩來，鄧小平直接關心下，外經委為楊琳舉行追悼會，平反昭雪。

附錄六：



潘漢年簡介

潘漢年（1906~1977），1906年1月12日生於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革命軍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28年10月潘漢年根據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傳部領導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第一書記，左翼文化總同盟中共黨組書記，推動左翼文化運動的發展。1931年1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7月參加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6月進入中央蘇區，歷任中宣部中央蘇區宣傳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等。期間，潘漢年先後兩次受黨中央委派，以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代表的身份，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進行談判。1935年遵義會議後，奉中央指派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1936年4月，潘

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從莫斯科起程回國擔任國共談判聯繫人。1937年9月，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上海、香港等地領導對敵地下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和第三書記、上海市副市長。

1955年4月3日被秘密逮捕，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對監禁了八年的潘漢年做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77年含冤病逝。臨終前與愛妻董慧女士軟禁於湖南茶陵洣江茶場（湖南省第三勞改場）。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黨籍，追認他的歷史功績，公開為他恢復名譽。黨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含冤27年的潘漢年終於重見天日！

附錄七：



嚴樸簡介

嚴樸（1898~1949），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烈士。字君實，又名達人，江蘇無錫人，1898年3月生。地主家庭，但他從小善待貧苦農民，仗義疏財。1922年在上海讀書時，常和上海大學的進步青年交往，接受革命思想，創辦《孤星》旬刊，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中共無錫地委秘書，1927年春任無錫總工會總務部長，參與領導無錫的工人運動。同年十月任江蘇省特派員，回無錫組織農民秋收暴動，任無錫縣農民協會委員長，率一萬三千餘人攻打無錫縣城。失敗後，回上海。1928年春，被指派為江蘇省的「六大」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同年秋回上海，先後出任中共江蘇松浦特委常委、中共松江中心縣委書記兼青浦縣委書記、中共浙南特委軍委書記兼紅十二軍政委。1931

年冬調臨時中央機關做地下掩護工作。1933年春到中央蘇區，在陳雲領導下負責邊貿工作，任新泉貿易公司總經理。同年冬福建事變時被派為駐福州商業代表。1934年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國民經濟部副部長。1935年春被派到重慶、宜昌建立秘密交通站，同年秋經上海赴蘇聯學習，入列寧學院，兼任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1938年春畢業回延安，任中央組織部一科科長，八路軍駐西安、重慶辦事處秘書長等職。是「七大」代表。抗戰勝利後，奉命到東北工作，不久因病在哈爾濱住院。1949年6月5日在北平逝世。

附錄八：

有關「故事」來源的說明^①

我 1929 年出生在江蘇無錫，1935 年在上海上小學，1938 年隨父親到香港，進培英中學附小四年級。我記事後認識潘漢年是在 1938 年剛到香港不久，他去北方開會，臨行前來我家看望我祖母，奶奶讓阿士弟弟（博古長子大秦鋼）叫他「叔叔」，我也跟著喊「叔叔」。1941 年香港淪陷，我和母親、奶奶一起搬到廣州灣（湛江）居住，父親前往重慶。抗戰勝利後 1946 年，全家搬到廣州市中山路晏江街居住，我到香港和父親、黃美嫻生活在一起。1946 年夏我考上香港華僑工商學院電機系，來到香港上學，這所學校在九龍沙田，離潘漢年的住所（道亨銀行董事長董仲維的別墅）不遠，我空閑時常去他家玩，吃董慧姨姨做的「布丁」。1947 年夏我和同學一起騎單車去新界玩，在元朗帶聽到不少新界人民抗擊日寇的故事，回來後寫了一篇紀實報告，寄給《華商報》副刊。1948 年夏收到華商報的邀請函，去參加該報主辦的「進步青年讀書班」，我很高興地前去了。一共 12 個青年學生，住在一個大房間，學習生活都在這裡，主要學《中國共產黨黨史》（中央晉察冀中央局編印），以討論為主，當時爭論的比較熱烈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第五次反圍剿的時間跨度」，有同學找來了當年的香港報紙，對遵義會議有詳細的介紹，會上博古在〈總結〉中說：「五次反圍剿開始於 1933 年 9 月，結束

① 作者秦福銓 2008 年 4 月 1 日病逝於北京。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於1934年10月10日紅軍戰略大轉移，歷時13個月。」在同一個會議上張聞天的報告卻說：「第五次反圍剿的標誌是廣昌會戰，開始於1934年4月10日，結束於4月28日，歷時18天。」這兩種說法，到底哪種更符合戰爭規律和客觀公正？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關係，博古認為黨和紅軍是一體的，他說：「共產黨和紅軍不可分割，黨領導紅軍，指揮紅軍，哪裡有黨，哪裡就有紅軍。」張聞天說：「黨和軍隊應該分離，不能粘在一起。黨管政治，紅軍管打仗，黨制定行動方針，紅軍按方針實施，根據這個原則，我建議黨中央搬到香港去，這樣比較安全。」兩種觀點誰更符合戰爭需要，誰更符合中國革命的需要，誰才是正確路線？

這次「讀書班」，辦了兩個星期，最後聽了潘漢年同志的一個報告，題目是〈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報告講得十分精彩，令人鼓舞，使人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從此開始我改口叫他潘老師。

1948年9月初，我和阿土弟弟隨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庭楷五人一起乘蘇聯貨輪阿爾丹號離開香港，經七天七宿航行，到達北朝鮮清津港，然後坐李富春同志帶去的專列直達哈爾濱。有關這趟旅行，我曾寫了一篇短文，刊登在1994年1月的《紅岩》雜誌上。由於當時的思想局限，有兩句話沒有寫出來。一句是章伯鈞說的，他說：「東北的勝利，陳雲是首功，由於大生產取得的豐收成果，使飽肚子的解放軍打敗了餓肚子的蔣家軍。」第二句話是譚平山說的，他說：「毛澤東有一個對付政治異己的法寶叫『群眾專政』，就是動員群眾圍鬥你，翻來覆去批鬥你，讓你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當年張國燾受不了，丟了四方面軍跑去投蔣。延安整風搞成搶救運動，人人過關，群眾鬥群眾。毛澤東自翔是『與人鬥其樂無窮』。我們進去後，一定要處處小心，謹慎說話為

好。」^②

1948年9月中旬到達哈爾濱，陳雲同志安排我去東北老航校工作（參軍搞航空）。為了等航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常乾坤同志，他在雙城開會，會後領我一起回航校，我在哈爾濱住了些日子。在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看望病中的嚴樸同志，聽嚴伯伯講了30年代在「江西蘇區」發生的一些往事，特別是「寧都會議」、「九月軍委會議」、和「八屆五中全會」等，使我印象深刻。

10月1日我到牡丹江三一部隊（老航校）報到，常副校長同意我先去老航校在密山的基地看一看。一路上有幸與劉述芳（方華）同志同行，聽了他在西路軍的故事。

1949年7月老航校撤編，11月11日人民空軍宣告成立，1950年春中央決定在華南成立一個空軍「混成旅」，共四個團，一團是米格～9（噴氣殲擊機團），二團是拉～9（螺旋槳殲擊機團），三團是圖～2（轟炸機團），四團是伊～10（強擊機團）。同時蘇聯在東北進駐了兩個飛行大隊，一個是拉～15，一個是米格～15。

1950年底，又決定組建三個師六個團，我被任命為空五師15團機務主任。10月調到空軍工程部外場處任強擊機參謀，主管伊爾～10機種。

到了1953年，部分伊爾～10已經飛了五千小時，到了大修時間了，當時只有上海龍華以前大修過P～51戰機，於是決定先拆開一架用火車運到上海試修，訓練部派了一位飛行員，修理處派了另一位部件檢修員，外場處派我任總裝檢修員，一個人一起赴上海參加試修。

在上海呆了一個半月，由於工作量不大，休息的日子，我就到武康路潘（漢年）老師、董慧姨姨家裡吃點好的。

^② 關於這次旅行，前些年聽吳學先博士說和我同行的不是李濟深是章漢夫，待查。

潘老師家客人很多，有一次是江西來的客人，向潘老師反映原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時被殺害的人，大部分已經平反糾正，但富田事件二十軍被殺害的幹部迄今沒有平反，受害人的家屬還頂著黑帽子生活。潘老師安慰說「事情得

一步一步來，陳正人同志已經向中央反映了，這些年都過來了，再等一等吧。」客人走後，潘老師氣憤地說：「什麼『AB團』，純屬於虛烏有的肅反，這是根本性的錯誤，卻用『擴大化』來掩蓋一切。」有一次，他看到一本雜誌：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是黨的領導核心……。他看後說：「這個提法不確切，遵義會上的話，會議明確規定，決定紅軍命運的『最終決策者』是周恩來。不過從黎平會議起，周恩來就一直在有意扶持毛澤東上臺執掌軍委大權，直到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才正式坐上。」「關於周恩來扶持毛澤東當領袖的想法，在遵義會議後，他和博古的談話中，已經清楚的告訴了博古。後來博古告訴了我，但並沒有特意強調要保密，在去莫斯科途中我又告訴了陳雲，陳雲說他早有察覺。這些年過去了，周扶毛上臺之事已是路人皆知的事了。」

1957年反「右」後，還有上百萬「右派同情者」、「立場模糊」的「中右」，統統被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我就是其中一個，被轉業下放到北大荒850農場。

我在北大荒一年半，什麼工作都幹過，開荒、種地、挖大排水溝、開拖拉機、上山伐木、場上蓄垛，扛立包……。1959年11月調新疆生產兵團農八師（石河子）。我在農八師工作了32年，直到退休。其中在四七團工作18年，這30多年裡我擔任過技術員、機耕連長、修配廠廠長、柴油機廠副廠長、師機關企整辦主任、體改辦（委）主任、紀委副主任等職務。設計與改裝的農機具有十多項（臺、件），其中設計的粉碎機、打壓機等暢銷南北疆。我從排、連、營、團，一步一個腳印，向檔案裡空軍工程外場處強加在我身上的「不可信用」的評語不斷衝刺，獲得成功。

成年後我和父親有過二次長談，一次長住（一個月）。

一次是 1948 年《華商報》讀書班結業後的第一天，父親問起我讀書班有什麼收益，我把同學們議論的兩個問題告訴他。父親說 30 年代共產黨有兩件大事，一件是長征、一件是西安事變，這兩件事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命運。長征原先叫「戰略大轉移」，這個轉移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個範例，它使中央紅軍從被動的反「圍剿」怪圈中跳了出來，成為主動進攻的一支抗日隊伍。現在寫「長征」，都不寫這段。「長征」發起的歷史，是誰周密設計跳出包圍圈的，而且這段「長征」是按部就班進行的，湘江戰役之前他們是成功的。在處理「西安事變」時，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團長是博古，但現在許多人根本不提這個代表團，只提周恩來一個人的作用，這是不公正的。



左起秦福銓、黃美嫻（楊琳夫人）、
秦摩亞（博古大女兒）、秦新華（博古二女兒）

第二次是 1949 年 7 月，當時我在錦州二航校飛行大隊一中隊工作，一天校部通知我：中央辦公廳來電找我，命我立即去北京，到「中央辦公廳接待處」見父親。校方已經把火車票買好，當天我就乘車趕到北京。一出站就看到父親和母親黃

美嫻在車站出口處接我。接待處是一個四合院，北面有一棟一層小樓。我們就住在小樓上，每天去食堂吃飯，見到接待處賴處長，互相打招呼。在北京三天，除了有一個下午，父親帶我去中南海中央辦公廳面謝楊尚昆主任外，還去過一次王府井，轉了一下，其它時間都在接待處房間裡和父親交談。

我們談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的入黨問題。我認為入黨是個信仰問題，不急，等等看。因為我從小在香港長大，從小學、中學到大學聽到的，看到的，和受的教育，都是和平和博愛，人類要和平相處，用和平制止戰爭，做人要博愛，不殺生，不互鬥，愛是永恆的。可是進了解放區以後，聽到的是列寧說「只要帝國主義還沒有消滅，『戰爭與革命』就始終是時代的主題，不存在所謂的和平年代，存在的只是戰爭與新的戰爭的間隔與準備。」毛澤東說人從娘肚子裡生出來就烙有階級的烙印，階級鬥爭將陪伴一生，戰爭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我們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人類只有消滅資產階級進入世界大同，才有真正的和平。這兩種說法在我腦子裡有衝突。現在是建設新中國的時期，國家正進入國泰民安的時候，該是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發展、自強富國的主題的時候了，我想再等等看。

第二個問題是工作的問題，父親叫我多學些技術，藝多不壓身，我完全同意，回去後要更多的鑽研技術。父親要我搞好人際關係，和為貴。但我說現在每年冬天都搞運動，剛剛平靜下來，新的運動又來了，整天生活在驚恐之中，見人只說三分話，防人之心不可無，我是「怕」字當頭，不敢交友。父親說慢慢地習慣了就好了。我問父親一個問題，伯父犧牲時，毛澤東為四·八烈士的題詞是「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這個「榮」應該是「光榮」、「榮耀」的意思，但博古始終是個「反面教員」，連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總書記，事都不讓提，為什麼？父親說：「原因就是有人『看不起』他，從毛澤東、周恩來起，看人都是哪個方面軍的？是不是連營團師

逐級上來的？打過哪幾個大仗？你伯父就缺這些，他沒有進中央委員會就一步登上黨的總負責人，所以讓人抓住這個把柄做文章，瞧不起他。」我說：「張聞天不也是這樣嗎？」父親說：「是的，張聞天的遭遇還不如博古，他在遵義會議上被選上總書記，但周恩來不承認，結果選舉作廢。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批准為總負責人，始終沒有總書記名份。雖然他活著享受副部級待遇，但是這些年來他一直是坐冷板凳。」

我和父親第三次長談是1952年他從香港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門花市大街上頭條，這個四合院，前院是香港華潤公司駐京辦事處，後院是一幢西式洋房，中間是一個小花園，父親原定是擔任外貿部副部長，但這時發生了神杖輪事件（事情的起因是香港一位親共商人，買了華潤公司從東北運來的豆餅260萬噸，賣給臺灣的兩家公司，一家在基隆，一家在高雄。當時華潤公司有人勸他不要去臺灣冒險，他說我要讓臺灣的牲畜也過年，吃豆餅有什麼不好？蔣介石也講人道嘛。父親知道後去請示方毅，方毅說他要去你勸阻不了他，只能順其自然了。結果這一船豆餅在臺北基隆卸貨十幾天後，又去臺南高雄卸貨，在高雄卸完貨十幾天，準備返香港時，被國民黨扣住，港商的兒子應燕銘是駐輪經理，被抓進監獄，輪船是在香港註冊掛英國旗的，經港英當局和駐臺領館再三交涉後，船被釋放，但人未放。雖然經華潤和海員工會及應燕銘的父親四處奔走，託人相救，但兩年後，應燕銘還是被國民黨殺害了。問題在哪裡呢？神杖輪是華潤公司下屬華夏航運公司的一艘船，常年跑大連和北朝鮮港口，運回東北土特產在香港出售。駐輪經理是貨運賣方的駐船代表，主要負責押貨，減免貨物運輸途中的損失和處理貨物在裝卸船過程中發生的事情，以及組織勞力裝卸，盡可能縮短停港時間，減低運費。駐輪船代表在船上有一間房間，供住宿辦公用，因此房間裡肯定有貨運的記載、收據、票據等，甚至還有書信。因此華潤公司曾經多次提醒應燕銘要及時清

理這些東西，免得在臺灣出錯。但應總認為掛英國旗的外籍船，臺灣不可能貿然侵入。結果高雄的國民黨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非要搜查這個房間，這一搜，抓個正著，應燕銘被以「通共」罪名逮捕）。事情發生後，我父親作為華潤公司董事長，事前考慮不周，是有一定責任的，中組部通知父親「待分配」，等候中央表態。於是父親每天在這幢小洋房裡待命。我每天下班後就去他那裡陪他下象棋，聽他講以往經歷的故事，特別是他講了張國燾的事，我很感興趣。不久，調令下達，因為父親是行政九級幹部，所以任命他為外貿部一局局長（平調）。同時受處分的還有華夏航運公司總經理劉雙恩，黨內記過處分。

一次長住是在 1961 年春天，石河子各團場和醫院需要的氧氣都是到烏魯木齊市灌，增大了成本，浪費了時間，所以機運處想買進一臺製氧機，辦一個小型製氧廠。於是處長想到了我，看能不能買兩臺空軍用過的二手貨，於是派我出差去北京。我回到北京時，父親已搬到二里溝住，任有色金屬進出口公司總經理。那時北京的副食品供應很緊張，父親去人民大會堂開會，中午發了一袋食品，他都捨不得吃，帶回家來，讓我們吃。我和黃美嫻媽媽每天在食堂吃飯，她總是買甲菜給我吃，下班時遇到賣田雞的，她一下子一盆全買回來，我負責做，全家吃了個痛快。有一天父親高興地宣佈，星期天去吃泡饃。原來袁超俊叔叔從主管的國際旅行社下屬的一家餐館裡買了一些牛羊肉出來，星期天在一個做泡饃的師傅那裡招待我們。這是一家歇業的小餐館，樓下是空的，樓上放了一個圓桌，桌子上一大盆熟牛肉，香氣四溢，我們坐下來圍著吃，袁叔叔和父親還喝了一點酒，然後老師傅拿來餅子，大家掰成小塊放在碗裡，過一會，老師傅端上一大鍋滾開的羊肉湯，味道鮮美極了。桌子上放著蔥末、香菜等調味品，我們用勺子盛湯，澆到餅子上，這就是泡饃。父親說：「民以食為

天，一點不假，一個國家「吃」是個大問題。當年陳毅帶了一萬多湘南農軍上了井岡山，就因為沒吃的，又逼著讓他們回湘南，一路上被國民黨和地方武裝殺害了幾千人，黃克誠逃過了這一劫，後來他又投奔了紅二軍團，彭德懷收留了他。所以說農民問題是個頭等重要問題，要發揮農民的積極性，自主的創造性，不能用管理軍隊的辦法去管理農民。反右以後，中國共產黨染上了自欺欺人的毛病，這個病根去不掉，以後還會有更大的事要發生。」

這次我在北京住了近一個月。由於買製氧機需要外匯額度，這就需要通過兵團，二手貨根本沒有，所以沒辦成，只買了幾個氧氣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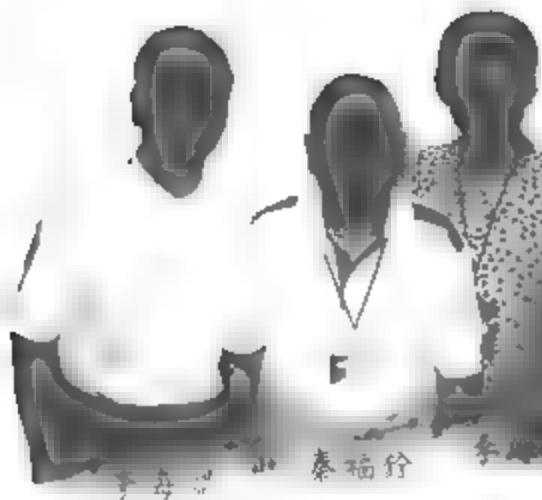
除這幾次長時間的談話或居住外，父親在「文革」開始後不久，曾連續寫過兩封信給我，內容是一、北京天氣不好不要來。二、以前說過的話，不要再提，忘記為好。三、香港的人和事不准提。

我從1948年參軍後一直生活在戰爭的陰影裡，「戰爭與革命」始終是時代的主題，「階級鬥爭」是主旋律，運動一個接一個，壓得你喘不過氣，深挖洞，廣積糧，三線建設等等，林彪一個「一號命令」，「半夜」起來再去挖洞。毛澤東一句話，連隊半夜起來迎接「最新指示」，敲鑼打鼓，折騰半天。基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教導」，人都變麻木了，風聲鶴唳，這「仗」不知道哪天打。毛澤東建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戰時經濟體制」，著眼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戰爭與階級鬥爭」不符合我的信仰，我的理想社會應該是和平、博愛、人與人和睦相處，經濟發展的中心應該是「以人為本」，不斷提高人民的精神和物資需求，解決民生問題。而不是「備戰第一」、「一切為了戰爭」。所以格調不一，我不可能急著「入黨」。

1980年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改革與開放」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和平與發展」是

世界主流國家的宗旨，是世界和平的主軸。改革是改變中國舊的經濟模式，向世界主流國家的經濟模式靠攏，開放是促使中國的經濟很快與世界主流社會的經濟接軌。這是強國富民之道。中國共產黨必需以此作為目標，帶領全體黨員為此奮鬥。要吸納有共同信仰的同志加入黨，一齊奮鬥前進。同時，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與發展」理論是對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顛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不再是基辛格所謂的「世界革命者」，而是要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和負責任者，是成為一支維護國際和平的重要力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1980 年後的面貌。對這樣先進的黨，以人為本，求真務實，紮紮實實地解決民生的問題，科學地發展經濟，我還有什麼理由不積極要求加入呢！終於在 1983 年 8 月我被正式批准為中共黨員。入黨晚嗎？不，鄧小平同志 1980 年提出，發展黨的新思路，我兩年後就加入了這個隊伍。比起那些為昇官、為名利，削尖頭腦往裡鑽的人，要早得多。

「年難留，時易損」，我今年已經 79 歲，快走到人生的盡頭了，把我知道的一些歷史故事寫出來，免得被歷史的灰塵淹沒。由於是從多個人的口中聽來的，故事就是故事，肯定是相當零散的，我做了整理，難免有許多差錯，所以希望不要誤解為黨史，僅供參考。



我的夫人秦吉瑪是博古的小女兒，但我們結婚幾十年很少談論她父親。她出生在莫斯科，1950年才回國，從未見過父親，她對父親的瞭解僅限於黨史課中講述的「博古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2001年，吉瑪的堂哥秦福銓（叔叔楊琳的大兒子）拿來他自己寫的書《往事記憶》手稿四大本，讓我們看看，給他提提意見。

福銓的《往事記憶》記述了多年來他從他父親、潘漢年、嚴樸（嚴慰冰的父親）等聽來的「故事」。很多事是我們過去聞所未聞，其中不少是涉及中共高層的「一手」資料，極具史料價值。吉瑪的哥哥、姐姐看了也都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對研究中共黨史很有參考意義。大家鼓勵福銓進一步完善，爭取公開出版，為歷史保存一份珍貴的資料。

鑑於福銓、大哥、大姐年歲都大了，精力有限，作為家庭中最年輕的成員吉瑪和我「毛遂自薦」，願意協助大堂哥整理文稿。

福銓多年在新疆工作，我們雖是親戚，在此之前卻很少來往。自從我們開始一起整理文稿，彼此

才有瞭解。福銓是秦家年齡最大的孩子。博古去世很早（1946年39歲即去世），他的孩子那時還小，因此知道他的事很少。解放初期，福銓已是20歲的人，長期跟隨叔叔楊琳認識不少黨內外高層人士，自然有條件知道很多事。福銓又是一個有心人，對父輩的歷史很有興趣，特別是當他看到公開的報刊、書本、黨史講有關伯父博古的歷史和他自己聽來的「故事」不一樣時，更激起他的好奇，促使他有意識地收集、記錄下這些聽來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後環境寬鬆了，等他退休了，才有時間完成自己的心願。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去查閱、考證，把這些辛苦積累下來的「故事」聯繫起來，寫出了這本回憶與研究性質的《往事記憶》。

這份手稿的內容來源有二：

一、福銓多年來收集記錄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故事」，這些「故事」涉及面很廣，有的相當完整，有的支離破碎。這些從當事人聽來的故事並不是當時的採訪、記錄，有的還聽多個人講過，都是作者事後回憶整理的。除了重要的故事外，每件事，每句話何時何人所講，他無法明確做出說明。

二、為了把這些故事寫出來，讓別人看懂，必須補充一些資料、背景、時間、地點，為此，福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參考採用了很多公開的資料。然而，福銓到底不是黨史研究者，他把參考來的內容融入自己的文章，但沒有記錄引用的資料出處。要想再補上這一工作，給出註釋，量太大，他已無精力去做。

這樣一份存在先天不足的手稿，作者又是博古的親屬，如何使它儘量真實可信，避免「為親者諱」，使它確有參考價值，我和福銓商量了幾條辦法：

1. 文稿最大量最寶貴的是那些直接從楊琳、潘漢年、嚴樸聽來的「故事」，由福銓負責忠實地記述，不加水分。並在〈前言〉裡盡可能說明來源。

2. 為了客觀、公正，正文中只講述事件過程，不加作者個人的猜想、分析、評論，不加帶有作者情緒的用詞。力求加強正文的史料性，供後來的研究者參考利用。

3. 每章加一段引言，將原稿中作者自己的分析、評論集中到引言，以免讀者誤會是當事人的講述，也表達作者的一些觀點。

4. 書中採用了大量精確到「日」的時間，很多是作者的考證，據他說有的是他推算的。史學界對事件發生的時間經常存有爭議，如果沒有必要，不要寫得太死，可能的話改用「月初」、「下旬」等寬泛的用詞。

5. 提到「博古」的地方，原稿都用「伯父」，現都改用「博古」。

文稿就是這樣由我整理，吉瑪錄入，交福銓審定。最先整理出〈遵義會議前後〉一章，其中周恩來和博古一次重要談話，原稿是以兩人對話的形式展開的，福銓改用他當初筆記的形式重寫這一節，這樣更接近潘漢年的講述，更準確地傳達當事人的原意。就這樣陸續整理出各章，到2005年基本完成。

在整理的過程中，也遇到多處記述不準確的地方。例如潘漢年晚九個月返回，毛澤東對他不滿。原文很強調密電碼的問題，我看到一些文章專門考證中共和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繫的過程，早在潘漢年返回延安前兩個月，延安在獲得大功率電臺後，用張浩帶回來的密電碼給莫斯科發出第一份電報，已和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繫。所以密電碼不是主因，而是毛澤東認為潘漢年和王明、博古關係密切，因而不信任他。

又例如關於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原手稿說陳雲和潘漢年是同時出發，其實已有文章指出陳雲是在6月份長征過了金沙江之後才出發的。又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12人，原稿寫成11人，缺王稼祥。類似這些

問題福銓都同意修改。文中寫到時間、地名、數字（長征中傷亡人數），很多是福銓研究其他資料得來的，是否準確，我們也無法一一訂正。他年紀已老，個別地方可能記不准，出現差錯也再所難免。除了我們發現的，文中很可能還有誤記之處，也希望讀者指正。

在《炎黃春秋》發表〈博古和潘漢年〉一章之後，聽到些意見，我們又對直接引語用的標點符號「」做了修改。

本書主要回憶博古主政時的往事，基本按時間順序安排各章。

此外原稿還有很多涉及毛澤東的故事。對毛澤東的豐功偉業及他的雄才大略黨史早已肯定，但黨史把毛澤東描述成絕對正確、從未失敗的「神」，只寫他「過關斬將」不寫他「走麥城」，有時又把毛澤東做的事，記到別人頭上，不符合歷史真實。延安整風後知情人都不敢公開講，而這也是福銓聽來的故事中涉及較多的。在初稿中這些內容比較分散，我們整理出幾章，編為單獨一篇。但考慮到這些內容或者和博古主政無關，或者已有很多書籍記述，為突出博古主線，此次出版沒有採用。這裡僅列出各章題目：

這幾章是：

第一章〈湘南農民起義軍〉。講述井岡山時期「八月失敗」的前因後果。

第二章〈井岡山第三次反「會剿」〉。

第三章〈肅反擴大化——富田事變〉。肅反擴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歷來扣在李立三路線和王明、博古路線，其實毛澤東才是「始作俑者」。

每章的引言是我和福銓討論，由我執筆寫的，表達我們

① 關於富田事變，可參看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高華〈「肅AB團」事件的歷史考察〉，原載《十一世紀》，1999年8月號。

的一些看法。當初考慮在國內出版，儘量少寫。這些表述並不是對事件和人物全面深入的分析，僅希望起到拋磚引玉或指引文章重點的作用。這次在香港出版，本想做些補充，但福銓已去世，還是保持原貌為好。

〈博古在中央蘇區〉一章還有兩節未整理完成，無法補入了。這裡僅介紹一下兩節的要點：

一節是土地問題及查田運動。黨史為了樹立唯一正確的毛澤東路線，在各方面都按「路線」劃線，一方絕對正確，另一方完全錯誤。在土地政策上為誇大與「左傾教條路線」的對立分歧，忽視雙方在土地革命大方向的一致性，用簡化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對「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代替對土改政策複雜性的分析。忽視毛澤東的土改政策也是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並不是一貫正確。查田運動出現的過火行為有其複雜的原因，本應客觀地分析，然而黨史將其簡單歸結為博古「左傾」中央的錯誤，而直接負責運動的毛澤東卻是永遠正確。這樣的以人劃線的總結並不能實事求是，無法避免以後各革命時期（抗日、解放戰爭、解放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歷次土改中仍然多次出現過火行為。

另一節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指令，博古一般是遵照執行的，甚至自己不同意也執行了（例如處理福建事變），這被認為是教條主義。毛澤東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是有利的就用，就執行，不利的就拖延、迴避，確實是比博古更高明。然而人們忽視一個客觀條件，即1935年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前後的差別。「七大前的國際是集中的組織，決議指示是必須執行的」。共產國際將各國共產黨視為直接領導下的支部，有權直接干預，所以才有米夫操縱六屆四中全會，毛澤東拒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導致他在寧都會議被趕下臺。季米特洛夫主張共產國際不直接領導各國，而是原則指導。沒有這個客觀條件，毛澤東的「靈活」辦法也很難行得通。教條主義的產生原因是復雜

的，並不像毛澤東所說的「言必稱希臘」、「只知照搬外國經驗」那麼簡單，否則我們也不會在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之後，很快又掉進另一個對毛澤東的教條主義，「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

這次出版，增加了幾個附錄，方便讀者瞭解博古、劉群先、張越霞、楊琳、嚴樸、潘漢年。

我曾多次對福銓講：一定要盡可能說明「故事」的來源。或許因此，在他病故前幾個月，他寫出〈秦福銓自傳〉，可惜我當時在美國，回來他已不在世。他兒女交給我一份遺稿，我將其中和故事來源有關的內容抽出，也收入附錄。

《往事記憶》是福銓一直採用的書名，這個名字過於籠統。此次出版，我們將書名改為《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這本書以博古為主線展開，但主要寫土地革命戰爭（蘇維埃運動）時期的事情，也涉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項英、張國燾、朱德等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的活動。

我之所以願意幫福銓整理文稿，重要的一點是覺得他寫的東西可信。這幾年和他一起工作，接觸多了，也有了感情。我很佩服他，他是個對待史料極認真、嚴肅的人。他的記憶力很強，每次見面都滔滔不絕地講很多，而且他的確知道很多事情。2004年《中華兒女》雜誌第一期，發表了一篇文章〈華潤的紅色老闆楊琳之謎〉，就是由秦福銓口述（周燕執筆）。華潤現在的領導對他提供的史料評價說：「把華潤的歷史提早了十年」，在此前，華潤公司員工對公司1948年前的歷史知之甚少。

還有一件事，我也印象深刻。福銓在他的「自傳」中提到：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上總書記，但周恩來不承認，結果選舉作廢。關於這句話的來歷我想在此補充一個細節：2007年6月一天，我和吉瑪去福銓家談修改稿子的事，福

銓忽然對我說：「遵義會議第三天，會議上曾有過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事，我一直沒寫過」。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遵義會議開到最後，張聞天提出博古不適合再當總書記，應該改選。一些人提出選張聞天，而且毛澤東也同意。要表決時，周恩來堅決反對，認為這個會議改選總書記不合適，甚至提出非要選舉，他就退出會議。由於周舉足輕重的地位，毛澤東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建議以後再說。最後會議統一認識，改選這件事保密，不要對外再提。所以會後仍由博古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我聽福銓這麼講，就問他：「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都說是一個月後到『雞鳴三省』才交權的，你為什麼以前一直沒有寫呢？」他說是最近整理筆記才發現的，是聽嚴樸講的，肯定有這事。我當時有點半信半疑，曾勸他別提這事了。福銓沒有再提，也沒有要求我加到文稿中去。

2008年4月我們從美國回來，才知道他已病故。在他寫的自傳上，我又看到了上面那句話。對此我只能這樣理解：福銓是堅信自己記錄的事實的，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不願意讓他知道的「歷史故事」永遠被帶走，他要負責任地讓它傳下去。常言道，「人之將逝，其言也善」，我相信福銓是一個忠實於真實的人，他痛恨那些編造歷史、篡改歷史、信口胡編的行為。他盡力忠實地回憶、記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歷史故事」，只為了還歷史的真面目。

福銓在自傳和前言中多次使用了「故事」一詞，原因是潘漢年當年告訴他一個「小故事」，講述了周恩來和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所以福銓在文章中，把他從長輩們直接聽來的統稱為「歷史故事」。這和一般人理解「故事」就是虛構的完全不同。這是真實的記述。當然，這些故事畢竟不是講述人當時的錄音或記錄，而是後來的回憶，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所以福銓希望讀者將他的故事看作「一家之言」，不要誤解是經官方查證和確認的黨史。這也就是他說的「故事

就是故事」，「不要誤解為黨史」的意思。

這幾年，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旁證，說明 1950 年代福銓聽來的很多故事是真實的。有關西路軍、富田事變、肅反擴大、湘南暴動的農軍，毛澤東假借張浩共產國際代表身份、長征中的兩頂轎子等等事實，近年來在各種回憶、專題研究的書籍已多有披露。我相信，隨著我國檔案法的貫徹，幾十年前 1930~1937 年之間的共產國際文獻的解密，有關這段歷史的會議記錄、中央文件、共產國際的指示、報告的公開，福銓這本回憶中的很多「故事」細節都將會得到印證。

近年來，對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有重新評價。隨著博古傳、博古文集的出版，及博古百週年活動的舉行，人們對博古的功過評價也開始重新認識。但由於博古有近四年的時間曾是中共最高領導，又有黨的歷史決議將其定性為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把他說的一無是處。因此對博古的評價較為困難，它涉及到對共產國際功過的全面評價，以及對毛澤東、周恩來在一些歷史問題上的評價，還涉及到對中共歷史決議的再認識，所以對博古的研究遠未深入，很多還有待更多歷史真相的揭示。

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 年）是中共歷史上豐富多彩的「春秋」時期，加之「正史」對這一段有不少「誤記」，確實大有研究的必要。我們期望那些對此有興趣的，客觀的，嚴肅的歷史工作者有更多研究成果問世。

本書主要章節在 2005 年已完成，我們想爭取在國內出版。聯繫一些雜誌社，多數單位都因文章內容太敏感而回絕。只有《炎黃春秋》的編輯很支持，挑了不太敏感的一章，並做了刪節以〈博古和潘漢年關係的背後〉為題發表在 2006 年 10 月份的雜誌上。不料文章刊出後，遭到某些人的指責，說潘漢年是王明、博古的聯絡員，這是「宗派主義」的表現，是對潘的污蔑。更有人發表長文專門質疑福銓的文

章。致使《炎黃春秋》中止了繼續刊出（為紀念2007年博古百週年，本來想連載的）。因此，在國內是沒有人敢出了，在得到福銓的子女同意後我們決定到香港出版。

《往事記憶》是大堂哥福銓幾十年的心血，把長輩們講的故事保存下來，留傳下去是他一生的心願，更是他去世前幾個月念念不忘的事情。現在他的書出版了，實現了他的遺願，也可告慰他的在天之靈。在福銓生病住院彌留之際，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和他告別，在此也表達我們對福銓大堂哥的懷念之意。

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憲（博古）的百年誕辰，2008年6月26日是秦邦禮（楊琳）的百年誕辰。出版此書以示紀念。

這次在香港出版，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海文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紀坡民先生的幫助，我在此代表作者的家人向他們表達衷心地感謝。

李海淵

2009年2月



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合適做領袖或主帥。……我深信以老毛的才慾，一定能夠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我，拋棄和拋棄和拋棄我，拋棄和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產階級新階級新產階級新

——遵義——遵義十遵義十遵義——遵義做話

張國焘的山頭好硬，陳昌浩、徐向前都是張國焘的心腹臂膀，鐵了心跟隨張國焘了。他說我是想肢解四方面軍，我倒希望他不會成為第二個黃仲岳。

——長征路上毛澤東勸徐向前一起北上，被徐拒絕

事後，毛澤東知道了，對周恩來說：博古是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長征路上博古與張國焘針鋒相對鬥爭

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1934年博古沒有殺我，叫我當蘇維埃政府主席，五中全會又提名我當政治局委員，禮尚往來麼，這次成立蘇維埃政府，理應由博古任主席。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中央政治局研究成立蘇維埃政府

ISBN 978-988-17302-0-6



售價：HK\$88